

# 國際問題研究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17 期） 双月刊 2023 年 9 月 15 日出版

## ■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 1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杨洁勉
- 19 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 朱中博

## ■ 区域与国别

---

- 48 “新华盛顿共识”与美国经济战略的转型 李 巍
- 71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 赵明昊
- 98 美日在东南亚的联手拓展：战略协同与影响限度 项昊宇 鲍志鹏
- 117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 朱海燕

# Table of Contents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YANG Jiemian*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ZHU Zhongbo*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the Transition of US Economic Strategy  
*LI Wei*

US Chip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from a Geo-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ZHAO Minghao*

US-Japan Strategic Synergy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Limitations  
*XIANG Haoyu & BAO Zhipeng*

Japan's Burgeo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NATO and Its Implications  
*ZHU Haiyan*

Abstracts

#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构建 大国关系新格局

□ 杨洁勉

〔提 要〕大国关系格局是当代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国关系，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大国关系相关理论，方向明确地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面对大国关系中反霸和护霸力量之间的根本原则分歧和重大斗争，中国积极发挥历史主动，提高责任意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并坚持以多边主义推进大国关系体制机制建设。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擘划和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理念和实践，正以其先进性、可行性和示范性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选择。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大国关系格局、大国关系原则、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杨洁勉，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5 期 0001-18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sup>[1]</sup>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国家的存在，大国和大国关系格局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大势和发展趋势。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论及和应对国际关系这一重大课题时，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强调要总结大国关系格局的特点，把握其发展规律，并因势利导地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国关系格局的理念创新和理论总结，首先来自当代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和砥砺前行的大国关系实践。他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时深刻地指出：“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深刻体会，对外工作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sup>[1]</sup> 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大国关系上亲力亲为，积极有效地处理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努力提高发展中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和践行大国在全球治理及其体系改革中的责任和担当等，从而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其关于大国关系格局的理念具有站位高、立意深、视野远的时代特点。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睿智，解答了人类社会来自、处于和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提出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方向、原则、战略、路径和政策等。环顾当今世界，中国关于大国关系的理念和实践，显然远在那些民粹主义、选举驱动和地缘博弈思维之上，正以其先进性、可行性和示范性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and 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和应对大国关系时一贯强调“问题导向”。他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自然，大国关系格局是“国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26-427 页。

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研究其基本动因、内在规律、主要议题、规范原则、理念理论和发展方向等。与此同时，还要研究、剖析和应对典型案例，如中美关系、发展中大国崛起、大国和中小国家关系等问题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大国关系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一是指出了大国关系与整体国际关系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把大国关系置于更大的历史框架和时代使命之中，强调潮流、时势、责任、使命和担当等。不言而喻，大国关系虽然是整体国际关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两者毕竟还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国关系的发展只有在体现整体国际关系方向时，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二是处理大国关系言利但也要讲义。中国并不讳言国家外交主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sup>[1]</sup>。中国外交坚持物质本原论，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着力提升国内民生福祉，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做大和分好“蛋糕”。三是在国际上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弘扬基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sup>[2]</sup>摒弃美国独尊、西方优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以邻为壑和丛林法则等过时和错误的言行。四是有目标但分步骤地解决大国关系的主要和重要问题。中国强调要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大目标的同时，根据需求和可能解决当前问题，并为解决长期或未来的问题做好准备。五是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大国关系。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和分步推进。中国根据各类大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有的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有的是防止失控和对立对抗，创造各种条件使大国关系最终走上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道。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我们认识和分析全球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同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国关系的重要论述和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抓住大国关系的实质，在观察、认识、分析和处理大国关系时，推动大国关系新格局朝着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大国关系的 战略思维 and 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国关系，亲自指导中国与各类大国的外交外事工作，不忘初心地坚持根本原则，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创新理论，方向明确地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 （一）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大国关系理念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持续大幅上升，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大国关系”在新形势和新语境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理念，他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1]</sup>而且，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认识和处理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强调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中国还根据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的态势，对当代大国进行了重新定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十国集团成员都是世界和地区大国，应该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sup>[2]</sup>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19 页。

[2]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尤需指出的是，中国在界定大国关系时一再强调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要求增加其代表性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sup>[1]</sup>中国明确和强调发展中大国乃是当代大国的这一坚定立场，客观反映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事实，批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守旧和排外的“大国观”，增加了当代大国中的新生和积极因素，同时也为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 （二）着力当代又着眼未来的大国关系原则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巨变，大国关系面临重大变化和格局性过渡，需要确立和维护与之相适应的原则。值此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美国及其一些盟友倒行逆施，坚持冷战思维，重弹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的老调，试图以其制定的原则和规则“规范”当代国际关系，并维护其一己私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坚持历来行之有效的原则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少新的原则。在总的原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sup>[2]</sup>，“国际上的事需要大家心平气和商量着办”<sup>[3]</sup>。在大国关系的原则方面，他引领性地强调：“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sup>[4]</sup>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各类大国应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分别提出了以下原则。

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

[1]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2日，第2版。

[3]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人民日报》2021年7月6日，第1版。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方愿同俄方以及全世界所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步力量一道，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坚定捍卫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sup>[1]</sup>

中国寻求中美长期和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sup>[2]</sup>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是正确之道的基本原则。

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同维护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欧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可以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合力应对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双方要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努力，加强各自优质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的对接协作。”<sup>[3]</sup>

中国正在与发展中大国共同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例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sup>[4]</sup>又如，“中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担负着共同的发展责任。”<sup>[5]</sup>中国和发展中大国共同努力，力避分裂对抗之危，共创团结合作之机，勇立时代潮头，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三）大国关系原则的交汇和交锋

在当前动荡变革时期，大国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它们的内外背景以及世界观和国际体系观不尽相同，各自处理大国关系的原则存在差异，致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增加了大国关系的复杂性。

---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2年12月31日，第1版。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3]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日，第2版。

[4]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7日，第1版。

[5] 《习近平致函祝贺卢拉就任巴西总统》，《人民日报》2023年1月3日，第1版。



第一，美国及其紧随者英国和日本等在世界观和大国关系原则上的认知具有一致性和趋同性。拜登政府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正步入对共和世界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在此期间，美国面临主要大国竞相塑造新世界秩序及严峻的跨国问题两大挑战。为此，美国要做的就是建立强大、广泛的国际联盟，与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一起对抗那些提供“阴暗愿景”的大国，阻止它们威胁美国的利益，保持美国领导全球的地位。<sup>[1]</sup>

英国苏纳克政府 2023 年 3 月发布的《综合评估更新 2023》同样认为，世界在未来十年面临全球权力分布的变化、国家间针对国际秩序性质的系统性竞争、迅猛的技术变革、不断加剧的跨国挑战等四大挑战。对此，英国提出，应对挑战的最优先事项是与共享价值观的民主盟友进行合作，借助“七国集团”和“五眼联盟”等机制优先在欧洲一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的紧密协调。<sup>[2]</sup>

日本岸田政府在 2023 年 4 月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指出，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权力平衡，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作为应对，日本需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与共享价值观的伙伴的合作。<sup>[3]</sup>

第二，法国、德国等欧洲地区大国群体虽然与美国同属西方，但在世界观及处理大国关系原则上有异于美国，主张在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风险上升背景下追求欧洲的“战略自主”并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

---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March 202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45586/11857435\\_NS\\_IR\\_Refresh\\_2023\\_Supply\\_AllPages\\_Revision\\_7\\_WEB\\_PDF.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45586/11857435_NS_IR_Refresh_2023_Supply_AllPages_Revision_7_WEB_PDF.pdf).

[3] 日本外务省：《令和 5 年版外交青書》，2023 年 5 月 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pdfs/1\\_2\\_1.pdf](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pdfs/1_2_1.pdf)。

欧盟近年来接连发布多份外交、安全、防务等领域的战略报告，将欧盟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从曾经的“规范性力量”转为“地缘政治力量”，并进一步加强自主能力的建设。这些报告强调，俄罗斯“挑战多边主义基础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损害欧洲和全球安全与稳定”；视美国为战略伙伴并接受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强调应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不盲目追随美国政策。<sup>[1]</sup> 在对华立场上，欧盟仍旧延续“制度对手、经济竞争者和多边合作伙伴”的三分法定位。<sup>[2]</sup>

法国马克龙政府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国家战略评估》报告阐述了对中、美、俄三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立场和政策。在对华关系上，法国的认知呈现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去风险”政策降低对华依赖，并在非洲和近东及中东地区平衡中国影响力。另一方面，法国认可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和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在对美关系上，报告承认美国再次成为欧洲安全的主要提供方，但指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转向中国，这导致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不符合法国战略利益的变化。在对俄关系上，法国将俄罗斯的军事扩张视为未来数十年的重大威胁，并指责俄罗斯在强权逻辑和帝国野心影响下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发生对抗。<sup>[3]</sup>

德国朔尔茨政府 2023 年 6 月发布该国在战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了自身战略目标与安全外交政策。该份文件显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对德国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产生了强烈冲击。在论及大国关系时，报

---

[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at the Heart of Europe’s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July 6, 2023,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23-07/SFR-23-beautified-version\\_en\\_0.pdf](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23-07/SFR-23-beautified-version_en_0.pdf); European Council,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March 24,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and-defence-0\\_en](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and-defence-0_en); Clothilde Goujard, “Charles Michel: Europe Warming Up to Macron’s ‘Strategic Autonomy’ Push Away from US,” Politico, April 11,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warming-up-to-macrons-strategic-autonomy-push-says-charles-michel/>.

[2]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at the Heart of Europe’s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3]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Revue nationale stratégique 2022,” novembre 2022, [https://medias.vie-publique.fr/data\\_storage\\_s3/rapport/pdf/287163.pdf](https://medias.vie-publique.fr/data_storage_s3/rapport/pdf/287163.pdf).

告沿用了欧盟对华定位，在强调德国对华政策应保持平衡的同时，指出两国关系中“竞争和对抗的因素在上升”。在对美问题上，德国将深化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视为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之一，并称美国是德国安全的核心保障。而俄罗斯则被认为正有目的地试图破坏欧洲民主社会的稳定，削弱欧盟和北约，是“可预见时间内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sup>[1]</sup>

第三，发展中大国群体在历史上普遍遭受列强侵略和殖民而陷入落后状态，为此极为重视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益，在希望维持大国关系稳定的同时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印度莫迪政府将自身定位为“西南方大国”，一方面追求巩固战略自主地位，另一方面与美西方进行议题式战略合作。在大国外交层面，印度在美俄间进行战略对冲，同时加强与美俄的战略安全关系。俄乌冲突以来，印度总体选择中立立场以维护其战略自主性，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与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国际机制间争取左右逢源。

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设“集体的全球领导力”以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全球多边体制改革，主张发挥东盟在东南亚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在东盟框架内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sup>[2]</sup> 印度尼西亚寻求在大国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它与中国积极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快在基础设施、卫生健康、海洋研究等领域合作。<sup>[3]</sup> 同时，印度尼西亚也主张与美国建立“可持续和稳固的”伙伴关系。

巴西在外交传统上具有全球性和自主性的特征。卢拉政府上台后维持与

---

[1] “Wehrhaft. Resilient. Nachhaltig. Integrierte Sicherheit für Deutschland.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Bundesregierung, 2023, <https://www.nationalesicherheitsstrategie.de/>.

[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Minister Brings the Spirit of Bandung, Raises Global Trust and Solidarity,” September 24, 2023,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5300/berita/at-the-united-nations-foreign-minister-brings-the-spirit-of-bandung-raises-global-trust-and-solidarity>.

[3]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6, 2022,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4169/pidato/joint-statement-between-the-republic-of-indonesia-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美国的良好关系，但强调双边关系是平等和互惠的，追求战略自主性的一面更加突出。针对乌克兰危机，卢拉公开批评北约不断对俄罗斯加压的做法，并指责拜登政府一直在“煽动战争”。<sup>[1]</sup> 卢拉政府还加大对域外大国的外交力度，提升与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及欧盟战略合作的地位，以对冲美国对巴西构成的战略压力。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我们看清大国关系的本质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许多矛盾趋向尖锐化，全球挑战更加纷繁复杂，国际关系中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知因素急剧上升。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sup>[2]</sup>

### （一）大国关系中反霸和护霸斗争的新背景和新重点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主要大国在国际和地区性机制、全球重大议题、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有所加强，为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落实联合国发展议程等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历史总是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互动中前进。例如，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大肆推行地缘博弈和对抗的战略和政策。

当前，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两重性和两面性相当突出。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中流砥柱和先锋骨干，正在努力构建和推进代表时代进步的大国关系。但是，当代大国并非由中国

---

[1] “Brazil’s Lula Meets Ukraine’s Zelenskiy, Discusses Peace,” Reuters, September 2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razils-lula-meet-ukraines-zelenskiy-after-biden-get-together-2023-09-20/>.

[2]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一国组成，大国关系应当而且只能在“应然”和“实然”中取得平衡，并逐步推进。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寻敌联盟达到继续主导大国关系和全球事务的目的，继续维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优势，为此全力打压和围堵中国。

## （二）反霸和护霸思想与行为的原则分歧和重大斗争

美国和发展中大国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和最本质的在于对历史进步和时代趋势的认知和行为分歧。

第一，发展中大国的兴起为大国关系注入了时代进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sup>[1]</sup> 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正在纠正 500 年以来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历史不公。而且，世界力量对比的逆转已经体现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变革上，从二十国集团的升级、金砖国家机制的扩容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诞生，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迈向更加公正合理的趋势不可逆转。在世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变化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日益式微，为此充满了旧时贵族的失落感，也产生了大权旁落的焦虑感。

第二，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次的分歧，需要区别对待。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参与度、代表性和话语权等方面。多数发展中大国要求更多地参与国际问题的决策，增加其在相关机制中的代表性，提高它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2023 年 8 月，习近平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sup>[2]</sup> 美国则推行霸权主义和强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3 日，第 1 版。

[2] 《习近平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3 年 8 月 2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899939.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899939.htm)。

权政治，声称要继续领导世界，企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塑造其他国家和世界秩序。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全球发展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全面性、公正性和合作性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共享发展是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径。”<sup>[1]</sup> 经济科技发展是提升大国关系正能量和削弱负能量的主要杠杆和途径。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搞“小院高墙”和极限制裁，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以此阻止或延缓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国际安全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安全观和军事手段的作用等方面。主要发展中大国倡导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地缘政治热点和难点，主张普遍、综合、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美国等则泛化安全，突出军事，推行代理人战争，实施以盟友为体系、以实力为地位的西方强权安全观。事实上，穷兵黩武的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战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源地。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建章立制和规范规则等方面。近些年来，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遭到破坏，甚至变成美国的竞争工具，其“西方化”甚至“武器化”倾向更加显著。为此，发展中大国强烈要求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构建普惠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金融架构。规则、规范、机制和体制是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对其改革具有深层次和长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sup>[2]</sup>。为此，中国秉持公正合理的原则，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争取在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中把握更多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

[1] 《习近平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7月11日，第1版。

[2]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中国政府网，2021年1月25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



### （三）广大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关系中的新作用

世界上的大国是少数，更多的是中小国家，这其中又以发展中国家居多。在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社会化等新环境下，中小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中小发展中国家增强了在大国关系问题上的主动性。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再被动地接受某些大国的支配，而是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匈牙利在北约和欧盟中坚持其对华对俄的自主立场；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坚持不站队不选边；为寻求摆脱美元霸权，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纷纷采取“去美元化”措施。凡此种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图谋的“地缘博弈”“集团对抗”“美元霸权”等。

中小发展中国家发挥群体性作用。近些年来，各种形式的组织机制不断涌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由中小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国际组织积极开展机制性合作，实现了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地区的对话合作机制，深化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召开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2022年12月）和中国—中亚峰会（2023年5月）。中国和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合作作为大国关系注入了正能量和新动力，促进了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小发展中国家不断对美西方政策理念提出质疑。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3年1月访美期间表示，如果西方被全球南方抛弃，将会沦为少数派，不利于解决政策性问题。<sup>[1]</sup>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023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北非，当然还有亚洲，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可以替代西方的可靠选项。<sup>[2]</sup>

---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Decisions at History’s Turning Point,”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46121.pdf>.

[2] 《欧盟首席外交官：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西方替代者》，参考消息网，2023年9月30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dc92241c0675482d878dbeef77bb000/1/2023-09-30%2019:27?childrenAlias=undefined>。

### 三、中国努力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战略思维，亲自设计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效应对挑战和困难，积极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 （一）发挥历史主动和建设大国关系新格局

中国今天正处在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大国关系新格局作出重要贡献。

在大国关系格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更要改造世界。他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sup>[1]</sup>当前国际形势中的挑战不断增加。在美国的挑动下，大国关系中冷战思维抬头、集团对抗回潮、地缘博弈加剧，甚至发生了北约支持下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为此，中国力推的大国关系新格局旨在实现大国之间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格局决定秩序和体系，建设性和稳定性的大国关系格局有利于当前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并在力量对比、体系机制、思想理论等方面保障“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 （二）在大国关系新格局中国本培元和扶正祛邪

中国在大国关系上主要做的是加法，其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大体思路也是如此。

第一，主动承担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的三个报告彰显了中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60页。



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由此可见，中国使命担当的战略目标和原则方向不断完善，体现了时代性和可行性，充满着建设性和正能量，因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中国努力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成熟坚韧，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稳步推进，为中美关系指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sup>[1]</sup>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和许多大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就任后首次访华，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领导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指出，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政治家有必要为此负起责任。<sup>[2]</sup>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时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队，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大国关系保持稳定。<sup>[3]</sup>巴西总统卢拉在访华时强调，巴西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sup>[4]</sup>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向习近平主席表示，要“进一步促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并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印尼积极支持”。<sup>[5]</sup>

---

[1] 王毅：《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日报》2022年11月8日，第6版。

[2]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人民日报》2022年11月5日，第1版。

[3]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3年4月7日，第1版。

[4]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3年4月15日，第1版。

[5]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人民日报》2023年7月28日，第1版。

第三，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当前，面对多重挑战和困难，中国在大国关系中越发需要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其一，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sup>[1]</sup>其二，敢于反制从而使制裁者不再为所欲为。中国针对美国、英国等在台湾问题上一再挑战中方底线的行径，对有关机构和人员进行制裁，显示了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决心和能力。其三，善于斗争。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正是敢于斗争才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尊严，正是善于斗争才不断赢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sup>[2]</sup>在大国关系方面，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求各国的最大公约数，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变为大变，化危机为转机，在变局中创新局。

### （三）以多边主义推进大国关系的体制机制建设

大国关系千头万绪，双边和多边问题不可胜数。但是，加强多边主义的体制机制建设能达到提纲挈领和纲举目张的成效。

第一，坚持以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sup>[3]</sup>

---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59页。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二，加强具体组织机制的建设。在全球层面，中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周边和地区层面，将大国关系和小多边结合。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澜湄合作等次区域合作加速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中亚成为我国周边首个战略伙伴集群。在双边层面，中国不断深化伙伴关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已同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例如，2023年9月，中国与贝宁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月，中国与委内瑞拉宣布建立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第三，提出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全球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sup>[1]</sup>

## 四、结语

展望未来，动荡变革期的世界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抓住和用好时代赋予的各种机遇，有效应对必将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导致的重大挑战。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我们要进一步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思想理论和政策落到实处，从而促进各类大国走上和平发展的正道，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共同“行天下之大道”。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将继续指导我们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客观认识国情和世情的现状和趋势，把握世界发展规律和阶段任务，科学地确立中国的战略方位和战略任务，在理想和可能中取得综合平衡，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实现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运筹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时还特别强调辩证思维和两手准备。为此，我们既要有时与势在中国一边的定力、底气、决心和信心，还要看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sup>[1]</sup>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全面实践。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在增强实践自觉中提高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以其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责任编辑：肖莹莹】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

□ 朱中博

〔提 要〕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于中华文明 5000 余年厚重积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前景，彰显中国领导人的天下胸怀，体现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使命担当。它以四个“共同倡导”为内涵，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直面文明交流互鉴的突出堵点，指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推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落实到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方方面面。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已经并将继续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强大驱动力。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文明发展规律、文明进步动力

〔作者简介〕朱中博，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5 期 0019-29

当前，人类文明已发展到前所未有新高度，不同文明共生交融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大势。同时，不同文化思潮之间的对撞激荡也愈加激烈，意识形态阵营对抗风险急剧升高。人类文明面临革新进步与停滞倒退两种命运的抉择。在此历史关头，习近平主席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找准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堵点解方，指明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和支撑，高瞻远瞩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缘起

全球文明倡议由中方首先提出不是偶然的。倡议立基于中华文明 5000 余年的厚重积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进步的前景，彰显中国领导人推动中外文明繁荣共进的天下胸怀，体现引领不同文明共生交融潮流的使命担当。

（一）中国是原创型的文明古国，<sup>[1]</sup>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实证研究，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sup>[2]</sup>“文明”的定义有很多种。<sup>[3]</sup>《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sup>[4]</sup>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则认为，文明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sup>[5]</sup>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文明专指古代国家形态的出现，以国家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sup>[6]</sup>在西方，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lis”，意思是公民的、国家的，表示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sup>[7]</sup>总体上说，国际社会认为文明不仅包括精神文明，涉及文化、价值观等形而上层面，还涉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等

---

[1] 《王毅谈“文明古国论坛”形成的三项重要共识》，外交部网站，2017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704/t20170425\\_341050.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704/t20170425_341050.shtml)。

[2]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 年第 14 期，第 5 页。

[3]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花了大量笔墨论述文明术语在西方世界的衍变及其与所有社会科学的关系，参见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56 页。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3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6 页。

[5]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如何“见众生”》，《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6 期，第 50 页。

[6] 《文明探源工程：诠释“何以中国”——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 年 6 月 15 日，第 4 版。

[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3 卷），第 296 页。

器物、制度层面。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且惟一未间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在 5000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大量治乱兴替的经验，引领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特有的文明自信。在历史多数时期，中国都是世界一流强国。秦、汉、隋、唐等王朝先后与古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大食帝国等并存。中国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古文字，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字文化发展，也被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多个专门机构作为官方语言。<sup>[1]</sup> 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诸子“百家争鸣”，诞生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及东亚的精神世界体系，乃至人类政治、社会、法律、教育甚至外交与战略博弈的方式。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第一方阵之中”。<sup>[2]</sup> 西方经济学界比较研究发现，按 1990 年国际元计算，公元 1—1820 年，中国 GDP 一直高于欧洲，公元 1—1000 年更是欧洲 GDP 的 2 倍多。在人均 GDP 方面，公元 1 年中欧基本持平，公元 1000—1300 年中国则高于欧洲，且在随后几个世纪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sup>[3]</sup> 李约瑟也指出，在科技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 3 到 13 世纪之间保持着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同时代欧

---

[1] 作为世界性语言，中文的影响力仍在迅速扩大。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参见《教育这十年 1+1 系列发布会第六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成就》，教育部网站，2022 年 6 月 28 日，<https://hudong.moe.gov.cn/fbh/live/2022/54618/>。

[2]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 年 4 月 2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4/02/content\\_265149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4-04/02/content_2651491.htm)。

[3]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6 页；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前言及正文第 19 页。



洲，在 15 世纪前更是如此。<sup>[1]</sup>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更是推动世界文明格局深刻变革。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sup>[2]</sup>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蔚为壮观。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 处。<sup>[3]</sup>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树立了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共生交融的典范，引领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潮流。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和平、包容、进步的文明基因。历史上，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都曾与中华文明交汇，佛教、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曾进入中华大地并与道教、儒家等和谐相处。其间，不同思想观念有过论争、磨合，但从未有过宗教战争或教派仇杀。

中华文明没有扩张侵略和文明冲突的基因，更多的是兼容并蓄和开放革新的特性。历史上，中华文明借古陆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香料之路、“金银大道”、“万里茶道”等，与其他文明在物产、人才和技术领域互通有无，在文化思想上相互借鉴，留下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往历史佳话。中华文明“走出去”带的是丝绸、茶叶、陶瓷、漆器、铁器、典籍等物品，四大发明、冶金术、养蚕术、中医、种茶、纺织、刺绣等技术技艺，以及仁政王道、科举选官等理念制度，传播的是和平交往善意，没有过十字军东征、西方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屠杀和文明毁灭那样的野蛮行为。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中取长补短、革故鼎新，正是其长期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一大秘诀。

---

[1] 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 页。

[2]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7 页。

[3]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网，2022 年 8 月 24 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383057.htm](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383057.htm)。



##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文明对话包容、交流互鉴的大道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史，“现代化之问”摆到了中华文明面前。无数仁人志士苦寻中国现代化出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不同时期的艰辛探索，终于找到迈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持续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sup>[1]</sup>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文明创举，“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sup>[2]</sup>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时代性、进步性、创新性特征。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将使全球现代化人口翻一番还多。<sup>[3]</sup>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已达18万亿美元、人均GDP达12741美元，<sup>[4]</sup>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未来仍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随着人均GDP迈过2万、3万、4万美元

---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3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8-60页。

[4] 盛来运：《风高浪急彰显韧劲 踔厉奋发再创新绩——〈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评读》，国家统计局网站，2023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sj/d/202302/t20230228\\_1919012.html?jump=true](http://www.stats.gov.cn/sj/d/202302/t20230228_1919012.html?jump=true)。

等门槛，中国经济总量也将突破20万亿、30万亿、40万亿、50万亿美元等大关，这样量级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将是空前的。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既是旨在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的贫富分化弊端，更是着眼解决数千年来来的社会分化痼疾，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过程，也将意味着“人类历史从此进入真正高度文明的时代”。<sup>[1]</sup>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眼克服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各个时期就存在的人与自然的深层矛盾，是对中国和世界负责，也是为大自然万物、人类千秋百代负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传承中华文明和平传统，开辟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新模式”，<sup>[2]</sup> 跳出了西方现代化依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系的窠臼。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开辟文明对话包容、交流互鉴的新路。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显著的现实政策涵义，既有利于中国，也将惠及世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正确处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一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sup>[3]</sup>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要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大国。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sup>[4]</sup> 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3卷），第296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全文）》，《人民日报》2023年5月19日，第3版。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第62-64页。

[4] 《习近平：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中国永做学习大国》，中国政府网，2014年5月23日，[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5/23/content\\_2686031.htm](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5/23/content_2686031.htm)。

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sup>[1]</sup>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sup>[2]</sup> 与此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更多合作伙伴和更大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各方在现代化道路上都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应该同舟共济、团结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寻求优势互补，成为彼此推进现代化的伙伴。

### （三）中国领导人的天下胸怀，彰显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繁荣共进的深邃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sup>[3]</sup> 彰显高度的文明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sup>[4]</sup>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把握文明兴盛的规律和原理，通过借鉴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启示，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大国大党领袖特有的智慧底色。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党的十八大至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安排91次集体学习。其中多次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相关，如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

[1]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网，2022年12月3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2/31/c\\_1129246574.htm](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2/31/c_1129246574.htm)。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国家治理、法治和德治、吏治以及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

习近平主席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认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释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sup>[2]</sup>在新的起点上，习近平主席更加强调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3]</sup>习近平主席对中外文明成果有着浓厚兴趣、深刻理解和独到感悟。这彰显全球文明倡议蕴含的大国大党领袖的天下胸怀和文化底蕴。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阅读是他的爱好和一种生活方式，他通过读书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sup>[4]</sup>他除了大量阅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自青年时代甚至儿童时代还对俄罗斯文化、法国历史、印度文明、英国文学等有着浓厚兴趣，广泛涉猎这些文明的历史、哲学、文化书籍，接触其艺术作品。他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欣赏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文化巨擘、艺术名家的传世作品。借此，感受思想的力量、加深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sup>[5]</sup>参透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精神世界；<sup>[6]</sup>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

---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3 页。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2 年 8 月 24 日，<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47673/48870/index.htm#1>。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 年 2 月 9 日，[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4-02/09/content\\_2581898.htm](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4-02/09/content_2581898.htm)。

[5]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9/content\\_2649512.htm?from=androidqq](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9/content_2649512.htm?from=androidqq)。

[6] 《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4 年 9 月 1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sup>[1]</sup>

习近平主席还尊重和欣赏各种文明成果，开展大量“文明外交”。他出访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sup>[2]</sup>最陶醉的就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sup>[3]</sup>他曾参观考察许多文明古迹，如法国卢浮宫、墨西哥奇琴伊察、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埃及卢克索神庙、新加坡圣淘沙、泰国曼谷玉佛寺、希腊雅典卫城、印度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等。在元首外交中，习近平主席更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经常提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为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讲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故事，共话中外文明优良品质，从文明友好交往史中拉近彼此心灵距离，寻找解决当今挑战的启示。

#### （四）人类文明发展处在关键十字路口，迫切呼唤正确的文明观引领创造文明新辉煌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演进，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sup>[4]</sup>与此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强逆风，世界大分化暗流汹涌。人类既面临再创文明新辉煌的重大机遇，也面临既有文明成果遭侵蚀的严峻挑战。<sup>[5]</sup>这要求

---

[1]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507.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507.htm)。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

[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 10 月 15 日）》，中国政府网，2015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0/14/content\\_294697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5-10/14/content_2946979.htm)。

[4] 《习近平：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4/c\\_129604238.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4/c_129604238.htm)。

[5] 《焕发古老文明新活力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网站，2017 年 4 月 25 日，[http://bbs.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1209\\_679844/201704/t20170425\\_9351215.shtml](http://bbs.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1209_679844/201704/t20170425_9351215.shtml)。

以新的文明观来引导人类廓清认知迷雾，始终走在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人类文明当前已发展到前所未有高度，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大融合持续深化，成为时代基本特征和历史大势。过去30多年来，人类吸取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积极推动全球化潮流，“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sup>[1]</sup>推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根据国际经济学界统计，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公元1年全球GDP不少于0.1万亿美元，1000年约为0.12万亿美元，1870年约为1.1万亿美元，1950年约为5.3万亿美元。<sup>[2]</sup>世界银行统计，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年全球GDP约为33.9万亿美元，2022年约为101万亿美元。<sup>[3]</sup>两千多年来，人类物质文明财富的动态演变可见一斑，而新世纪以来增长规模能如此之大，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空前共生交融的结果。

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放眼未来，全球化依然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并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转型。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给世界大融合赋能。特别是数字化在驱动新一轮全球化加速来临，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人类文明形态。数字经济更是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sup>[4]</sup>也必将成为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强大动能。

与此同时，世界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鼓动文明冲突对抗与世界大分裂的逆流增长，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面临重大新挑战。“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sup>[5]</sup>近年来，国际体系和秩序

---

[1] 《习近平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外交部网站，2023年8月23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8/t20230823\\_11130476.shtml](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8/t20230823_11130476.shtml)。

[2]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第267页。

[3] 《GDP（现价美元）1960—2022》，世界银行中文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World Ban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2,” [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_download/GDP.pdf](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_download/GDP.pdf)。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前言部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5]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中国政府网，2020年12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12/15/content\\_5569594.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12/15/content_5569594.htm)。



深度调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地缘政治热点频发，世界经济低迷，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凸显，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对撞激荡愈加激烈，世界大分化、大撕裂的风险急剧升高。

面对空前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本应通过对话合作，携手应对。然而，个别国家固守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和冷战思维，执迷强权争霸的错误历史观，以维护本国私利、罔顾人类公利的狭隘角色观，极力鼓噪“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动辄对他国遏制打压，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或经济胁迫，建立各种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制造阵营对抗，堆积交流壁垒。人类面临交流与隔阂、互鉴与冲突、包容与排斥、对话与对抗两股理念与力量的交锋，面临文明革新进步与停滞倒退两种命运的抉择，亟需以正确的文明观为遵循，“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sup>[1]</sup>

##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

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涵，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 （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首要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sup>[2]</sup> 这指出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顺应了全球化时代

[1]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8年6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013.htm?agt=78](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013.htm?agt=78)。

[2]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大流动所决定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指明全球文明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和客观现实。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看，人类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sup>[1]</sup>在此过程中，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两河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地中海文明、东南亚文明等曾交相辉映、彼此激荡或传承启迪，汇聚起世界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从当今世界文明格局看，世界上有超过80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文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都是其长期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其独特的集体记忆和精神标志。各国历史文化和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sup>[2]</sup>

尊重文明多样性也是国际主流共识。联合国高度认可文明多样性价值，从安南、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支持文明多样性。<sup>[3]</sup>2001年联合国大会则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21日设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1972年以来，联合国共制定七项文化公约，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奠定坚实基础。<sup>[4]</sup>特别是2001年联合国大会接连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

[2]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年1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1/25/content\\_5582475.htm?ivk\\_sa=1023197a](https://www.gov.cn/xinwen/2021-01/25/content_5582475.htm?ivk_sa=1023197a)；《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外交部网站，2014年6月29日，[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hpgc\\_675103/201406/t20140629\\_7953842.shtml](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hpgc_675103/201406/t20140629_7953842.shtml)。

[3] 毛瑞鹏：《与联合国携手推动全球文明对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https://www.sis.org.cn/sp/14763.jhtml>。

[4] 《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cultural-diversity-day/>；相关7项文化公约，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bytopic/culture>。



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均强调尊重和促进多样性。其中，《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则强调，所有文明均须颂扬人类的大同与多异。《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则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sup>[1]</sup>

坚持新文明观，意味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面对文明多样性现实，应怎么看怎么办？有一种态度是恐慌、无视或排斥，随之推行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妄图抹杀文明多样性，搞文明独霸。中国的答案是树立新文明观，<sup>[2]</sup>即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为什么要坚持新文明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章程》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sup>[3]</sup>据统计，世界上89%的冲突发生在文化间对话较少的国家；四分之三的冲突与文化层面有关。<sup>[4]</sup>古特雷斯也指出，当今世界，反犹太主义、反穆斯林、迫害基督徒、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等邪恶势力正进一步加剧。<sup>[5]</sup>这些问题产生的一大原因是错误的文明观作祟，一些国家或群体在文明互动的认识论实践论上走极端。人类文明多样性及随之而来的差异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

---

[1] 三份文件均可在联合国网站关于公约与宣言之文化条目中找到全文及其他相关信息，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bytopic/culture>。

[2]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就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并提出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坚持的三点原则，对中国的文明观进行了深刻阐释。此后，他又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等过程中进一步阐释和丰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内涵。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至此“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正式出现。

[3] 《和平文化宣言》，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53-243>。

[4] 《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

[5] 《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第九届全球论坛：多样性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联合国网站，2022年11月2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11/1112717>。

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sup>[1]</sup>

平等是文明互动的首要前提。不同文明各有千秋，都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虽有差异，但无高下优劣或“中心—边缘”之分。不同文明都有不足，没有绝对的尽善尽美。各文明应是平等而非等级制的，“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人为地制造文明冲突，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只能加剧文明间的隔阂，使世界陷入分裂与对抗”。<sup>[2]</sup>

互鉴是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要坚持美人之美、互学互鉴，对其他文明保持应有敬意，虚心领略其他文明的真谛和奥妙，博采众长。换言之，通过交流互鉴对其他文明进行学习、消化、转化进而推动自身文明的革新进步，才是文明互动的现实意义。互鉴是互学互鉴，“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sup>[3]</sup>

对话是文明共处的黄金法则。不同文明难免因历史、地域、思维方式等差异产生分歧。但差异不意味着冲突，相反，可以成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的纽带。不同文明要以对话为桥梁，超越纷争，寻找共识，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要把多样化化为彼此优势互补、扩大交流合作的动力。历史和现实表明，文明对话交流比较顺畅的时期，往往是冲突、战乱得到有效抑制的时期。<sup>[4]</sup>

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根本要求。它意味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对其他文

---

[1]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全文）》。

[2]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年9月27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838/index.htm?eqid=c2058afe0002521300000002644744f2>。

[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19年5月15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ivk\\_sa=1024320u](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ivk_sa=1024320u)。

[4] 王毅：《焕发古老文明新活力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网站，2017年4月25日，[http://bbs.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1209\\_679844/201704/t20170425\\_9351215.shtml](http://bbs.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1209_679844/201704/t20170425_9351215.shtml)。

明加以开放接纳，而非仇视排斥。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停滞倒退。中华文明及其他文明的发展史都表明，越是包容开放，文明越是兴盛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 13 个经济体实现 25 年多的高速增长，其共同特征就是采取开放政策。<sup>[1]</sup>文明包容还意味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打破有形无形的壁垒和隔阂；意味着相互成就，而非相互拆台；意味着视彼此发展为机遇而非威胁，不能只许自己发展，而阻挠破坏他国发展，“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sup>[2]</sup>

## （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关键准则

文明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这是一体两面的。文明多样性强调的是文明差异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则突出的是文明共同性、价值共通性。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sup>[3]</sup>这针对的是破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发展进步的两大现实堵点而言。

第一，针对的是强求绝对的文明共同性的理论和实践，打着文明共同性的幌子，鼓吹“普世价值”，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使自身文明“一统天下”。冷战结束后，个别国家认为“历史终结”，在全球大肆推广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暴露西方发展模式弊端，经济衰退、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在西方愈演愈烈，其鼓吹的“民有、民治、民享”成为空谈。此后，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西方治理模式愈加失灵，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内部

---

[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3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gov.cn/ldhd/2013-10/08/content\\_2501676.htm](https://www.gov.cn/ldhd/2013-10/08/content_2501676.htm)。

[2]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3]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也饱受质疑。其不仅不能解决自身问题，反而造成大量国际问题。特别是个别国家打着“普世价值”旗号，对外实施新干涉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或军事入侵，煽动“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乃至所谓的“民主改造”，造成世界多地长期动荡。

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尊重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及对价值实现路径的不同探索。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合不合适，要由本国人民自己评判，“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样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sup>[1]</sup>民主、自由等价值，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sup>[2]</sup>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应该求同存异，而不应该强求一律。

第二，针对的是突出绝对价值差异性的理论和实践，即无视共同性、只讲差异性或者说只承认“小圈子”的价值共同性、否认全人类价值的共通性，进而搞价值观二元对立和阵营对抗。“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sup>[3]</sup>这早已被冷战史证明。但个别国家依然陶醉于冷战“历史经验”，习惯用阵营对抗的战略工具，通过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伪叙事，逼迫他国选边站队，构筑军事同盟，推动军事集团扩张，人为把世界推向分裂对抗。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求摒弃冷战思维和价值观偏见，跳出零和博弈陷阱，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凝聚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

---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政府网，2022年2月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05/content\\_567216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05/content_5672161.htm)。

[2]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5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55.htm)。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32.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32.htm)。

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sup>[1]</sup> 携手做大人类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sup>[2]</sup>

### （三）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深层动力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sup>[3]</sup>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4]</sup> 这指出了文明发展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触及一种文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

重视文明传承，意味着敬畏、继承并从古老文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智慧启迪。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各民族历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也是今天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sup>[5]</sup> 各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各自攻坚克难的精神支柱。<sup>[6]</sup> 重视文明传承，最基本的是要尊重、认同、保护并传承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以之为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之基，而不是采取鄙夷、批判乃至破坏的姿态，不能让文明中断、湮灭，成为民族的罪人。

文明传承还意味着古为今用，对历史文化秉持学习借鉴的态度，用之帮助认识和改造世界。当前，各国都面临持续推进现代化的任务，需充分挖掘包括文物和文化遗产在内的自身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把跨越时空概念、

---

[1]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全文）》。

[2]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3]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共产党员网，2014年10月13日，<https://news.12371.cn/2014/10/13/ARTI1413196364304826.shtml>。

[4]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5] 《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中国政府网，2023年2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38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388.htm)。

[6] 《王毅部长在文明古国论坛外长非正式会晤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7年9月26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zyjh\\_682456/201709/t20170926\\_9385136.shtml](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zyjh_682456/201709/t20170926_9385136.shtml)。

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人文品质和文化精神发扬起来，为各自治国理政提供动力和助益”。<sup>[1]</sup>当然，古为今用，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而非食古不化，要辩证取舍，“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sup>[2]</sup>

重视文明创新，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造文明新辉煌。文明传承，不是守旧复古，而是推陈出新，实现文明永续发展。“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3]</sup>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之与当代文化、各国现代化进程相协调，为各国推进现代化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和智慧动力，包括让文物古迹、历史典籍及其他文化遗产都“活起来”。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sup>[4]</sup>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要求应时处变，守正创新，意味着“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sup>[5]</sup>要避免抱残守缺，敢于自我革命，特别是围绕各国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解放思想，推进科技进步创新，推动体制机制革新，“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sup>[6]</sup>

---

[1] 《焕发古老文明新活力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政府网，2014年10月13日，[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3] 中国文联党组：《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文艺高峰的行动指南》，《求是》2023年第14期，第55页。

[4] 《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全文）》，外交部网站，2019年6月15日，[http://www1.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dqzzyos\\_673581/yzxhxz\\_673597/zyjh\\_673607/201906/t20190615\\_7627684.shtml](http://www1.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dqzzyos_673581/yzxhxz_673597/zyjh_673607/201906/t20190615_7627684.shtml)。

[5]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6]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 （四）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基础支撑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sup>[1]</sup>人文交流合作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工程。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sup>[2]</sup>这彰显了全球文明倡议的人民性。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要落实到交流内容与合作渠道上。要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坚持双多边并行、官民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领域并进，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要不断丰富交流内容，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对象，围绕治国理政、经贸投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卫生、旅游旅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遗产保护、减贫脱贫、生态保护、军事演练、人道救援及全球治理等开展对话交流。要激发各国公共部门、私营机构、民间社会的责任意识，<sup>[3]</sup>支持商界、学界、媒体、智库、文艺团体等各行各业，全方位开展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sup>[4]</sup>

要拓展合作渠道，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地方交流对话机制、立法机构交流对话机制、友好城市论坛，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设立国家文化中心，实施旅游促进计划、留学生互派项目，举办友好年、文化交流年、语言年、创新伙伴年、青年友好交流年、民间友好论坛、媒体合作论坛、工商界论坛等活动，共建联合大学、互译文化艺术作品，开展人员培训、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医疗援助等行动。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还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

---

[1]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3] 刘建超：《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合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联部网站，2023年4月1日，[https://www.idcpc.org.cn/bzhd/mtzf/202304/t20230401\\_151600.html](https://www.idcpc.org.cn/bzhd/mtzf/202304/t20230401_151600.html)。

[4]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4年9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2/c\\_1112464703.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2/c_1112464703.htm)。

明发展进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sup>[1]</sup>不同国家、民族交流合作持续拓展深化，离不开强大的民意支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础就越牢固、越广泛。”<sup>[2]</sup>青年是国家间友好合作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更要强化青年友好交流，引导青年群体传承并拓展彼此友好合作关系。

加强人文交流还要求通过旅游旅行、留学培训、参观访问等人员往来，促进互学互鉴。通过置身不同文明国度和面对面交流，各国人民更容易破除偏见误解，更好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现状、发展历程、文明魅力，相互取长补短。“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秀，启发自己的思维。”<sup>[3]</sup>加强人文交流，还要求广开进贤之路、纳天下英才，推动国际人才交流合作，“这种交流有利于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sup>[4]</sup>

### 三、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国实践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落实到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具体方面，包括落实到特有的跨文明对话渠道上去。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已经并将继续为推进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强大驱动力。

---

[1]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

[2]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全文）》。

[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4] 《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强调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中国文明网，2014年5月28日，[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jp/xjbjh/201405/t20140528\\_1970563.shtml?COLLCC=1534063817&](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jp/xjbjh/201405/t20140528_1970563.shtml?COLLCC=1534063817&)。



### （一）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累了良好基础

文明包括精神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等非文化内涵。文明交流不止是文化交流，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当前，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深度交融、关系空前紧密。

第一，政治上，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持续拓展，中外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展开。中国建交国总数已达 182 个，与各方保持密集高层沟通与战略对话。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113 对，同世界上 6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sup>[1]</sup>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 600 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sup>[2]</sup> 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机制合作，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等机制，与许多国家推动双边命运共同体及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建设，推动网络空间、核安全、人类卫生健康、安全等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sup>[3]</sup>

第二，经济上，中国与世界形成深度相互依存格局，中外物质文明交流互动日益紧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 11.3% 增长到

---

[1] 《二十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实录》，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0 月 20 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jbxw\\_new/202210/t20221020\\_10788846.shtml](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jbxw_new/202210/t20221020_10788846.shtml)。

[2]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jnzghflhghfxw/202110/t20211022\\_9609378.shtml](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jnzghflhghfxw/202110/t20211022_9609378.shtml)。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第 4-5 页。

18.5%，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30%，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贸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sup>[1]</sup>中国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超22万亿美元。<sup>[2]</sup>未来1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超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sup>[3]</sup>中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初步建立以周边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协定网络，2022年与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额达14.25万亿元人民币，占外贸总额34%；<sup>[4]</sup>利用外资规模自2017年以来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二，4万多家对外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89个国家（地区）。<sup>[5]</sup>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余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3%，<sup>[6]</sup>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球化背景下，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的中外深度相互依存，成为践行全

---

[1] 参见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22年9月13日，[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9/t20220913\\_1888196.html](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9/t20220913_1888196.html)；《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一场记者招待会 介绍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网，2022年10月17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0/17/content\\_5719029.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10/17/content_5719029.htm)。

[2] 国家发改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求是网，2022年6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6/01/c\\_1128695883.htm](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6/01/c_1128695883.htm)；《习近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商务部网站，2021年11月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ldrhd/202111/20211103214590.shtml>；《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20年11月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4/content\\_5557392.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4/content_5557392.htm)。

[3]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外交部网站，2022年11月17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7\\_10977217.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7_10977217.shtml)。

[4] 《高标准建设自贸区网络》，中国政府网，2023年4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18/content\\_5751925.htm?eqid=fe26e5230000789a0000000664803fc1](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18/content_5751925.htm?eqid=fe26e5230000789a0000000664803fc1)。

[5] 《疫情后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公布，逆全球化趋势持续，中国排名上升至第39位》，上观新闻，2022年11月6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46908.html>。

[6] 《1月1日起，中国对102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关税连降，开放红利加快释放》，中国政府网，2023年1月1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0/content\\_573594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0/content_5735949.htm)。

球文明倡议的必要物质条件。

第三，中外互联互通与人员往来日益频密，人与心“相通”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社会基础。中国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海运通达全球。2021年，平均每天约6.9万多艘次船舶进出港，飞机起降2.68万架次。中国与1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开通国际航线895条。<sup>[1]</sup>改革开放至2018年，内地居民出境13.8亿人次，2019出境超1.69亿人次；1978—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56.06万人，<sup>[2]</sup>海外侨胞逾6000万人。<sup>[3]</sup>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1万多名外国留学人员在华学习。<sup>[4]</sup>中国与152个国家缔结互免签证协定。<sup>[5]</sup>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中外人员往来会愈加便利，中外人员大交流的局面将持续恢复和拓展。

## （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现有机制平台，为搭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外人文特别是文化交流事业蓬勃发展，有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sup>[6]</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人文交流已形成元首外交引领、高级别机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新时代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进展与成效举行发布会》，中国网，2022年6月10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259869.htm](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259869.htm)。

[2] 《护照“含金量”极大提升、走出“国门”越来越方便——专访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中国政府网，2019年9月25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09/25/content\\_5433164.htm](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09/25/content_5433164.htm)；《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2020年2月2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2/28/content\\_548436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2/28/content_5484361.htm)；《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教育部网站，2020年12月14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3] 《聚侨心汇侨力 习近平这样谈“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2019年9月27日，<http://www.gqb.gov.cn/news/2019/0927/46984.shtml>。

[4]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教育部网站，2019年4月12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5] 《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定一览表》，中国领事服务网，2023年2月22日，[http://cs.mfa.gov.cn/zlbg/tyxy\\_660627/202110/t20211029\\_10403855.shtml](http://cs.mfa.gov.cn/zlbg/tyxy_660627/202110/t20211029_10403855.shtml)。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年12月21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7-12/21/content\\_5249241.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17-12/21/content_5249241.htm)。

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国内国外统筹、中央地方联动、官方民间并举的多元互动新格局。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前，习近平主席出访42次，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在国内接待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181次，以视频方式出席重大外事活动78起，<sup>[1]</sup>为推动中外“心相通”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中国搭建全覆盖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尼、南非、德国、日本等世界上主要国家或组织建立人文交流机制。<sup>[2]</sup>

中国与157个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建立41个双多边文旅合作机制，<sup>[3]</sup>在93个国家派驻文化和旅游机构，推动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等16个多边交流合作机制和25个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驻外旅游办事处总数分别达到45个和20个。<sup>[4]</sup>中国与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建设23个鲁班工坊。<sup>[5]</sup>中国还同140多个国家建立了2900多对友好城市关系。<sup>[6]</sup>

中国积极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16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关系持续发展。<sup>[7]</sup>截至2019年7月，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同4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防务磋商对话机制54项。<sup>[8]</sup>中国向160多个发展中国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新时代外交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网，2022年9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441442.htm](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441442.htm)。

[2] 达巍、周武华：《人文交流：开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新空间》，《神州学人》2022年第5期，第11-16页。

[3] 《旅游合作民相亲 文化交流心相通》，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22年10月14日，[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xy20d/9676/202210/t20221014\\_936459.htm](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xy20d/9676/202210/t20221014_936459.htm)。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5] 《我国教育开放总体布局不断优化 超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央视网，2022年9月20日，<https://news.cctv.com/2022/09/20/ARTIVIAIUP4JOXYqL3vqga9R220920.shtml?spm=C94212.P4YnMod9m2uD.ENPMkVwfnaiV.4>。

[6] 林松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人民日报》2023年6月21日，第9版。

[7] 《文字实录》，科学技术部网站，2022年6月6日，[https://www.most.gov.cn/xwzx/twzb/fbh22060601/twzwbwzsl/202206/t20220606\\_180945.html](https://www.most.gov.cn/xwzx/twzb/fbh22060601/twzwbwzsl/202206/t20220606_180945.html)。

[8]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年7月24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132/41134/Document/1660318/1660318.htm>。

家提供各类援助，实施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共培训各类人员 40 多万人次。<sup>[1]</sup>

中国积极参与一系列双多边文明对话平台与机制建设，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做了有效铺垫。特别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等机构重大倡议、计划和议程，为全球人文治理、文化治理做贡献，习近平主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思想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得到广泛认同。<sup>[2]</sup>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总量居世界首位。<sup>[3]</sup> 中国于 2007 年加入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该联盟成立于 2005 年，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倡导建立，“是不同文化间对话、理解与合作的首要平台”。<sup>[4]</sup> 联合国设有不同文明联盟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并已召开九届全球论坛。该联盟相关活动得到中方积极参与。

中方积极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2019 年，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 47 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千余名代表参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平台。<sup>[5]</sup> 中国与希腊、埃及、伊拉克、意大利、伊朗、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和印度等 10 大文明古国，自 2015 年发起举办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迄今举办七届会议。10 个国家分别代表中国、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罗马、波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和印度河文明。<sup>[6]</sup>

此外，中国倡议举办或参与的中阿文明对话暨去极端化圆桌会议、中法

---

[1] 《携手推动发展合作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王毅国务委员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成就展”开幕式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1 年 4 月 26 日，[http://ne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zyjh\\_682456/202104/t20210426\\_9183966.shtml](http://ne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zyjh_682456/202104/t20210426_9183966.shtml)。

[2] 《第十三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情况》，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49/twwd/202209/t20220920\\_663141.htm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49/twwd/202209/t20220920_663141.html)。

[3]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4] 参见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网站，<https://www.unaoc.org/who-we-are/brochure/>。

[5]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6] 《文明古国论坛在雅典召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7 年 4 月 24 日，<https://sputn iknews.cn/20170424/1022438538.html>。

文明对话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世界汉学家大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上海合作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等活动，也有力推动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各方并致力于使用新技术、新媒体构建新平台新机制，丰富文明交流手段，尤其是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领域搭建了众多交流共享平台，<sup>[1]</sup>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注入强大动力。

### （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既有典范与标志性平台，为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提供持续动能

上海合作组织及“上海精神”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典范。“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指导成员国关系的准则，核心内涵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其中，“尊重多样文明”作为“上海精神”的重要内涵，指导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各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媒体、广播电视、人力资源培训、古迹修复和考古、体育等领域广泛合作，打造青年交流营、妇女论坛、民间友好论坛、传统医学论坛、国际医学创新合作论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友好城市论坛、地方领导人会晤等品牌活动或项目，夯实了该组织长远发展的民意基础。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树立了不同文明国家友好合作、包容互鉴的典范。正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宝贵经验基础上，习近平主席2018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也恰是由于“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上海精神”的感召力，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共建“一带一路”及“丝路精神”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全方位实践平台。古丝绸之路为亚欧大陆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思想观念大碰撞、

---

[1] 胡正荣：《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人民日报》2022年9月7日，第9版。



多元文化大交融作出巨大贡献，<sup>[1]</sup> 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sup>[2]</sup> 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实践和“丝路精神”启示，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 年来，中国与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重点，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建设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与 152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sup>[3]</sup> 贯穿欧亚、连接亚太和欧洲经济圈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成型，大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极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共赢。2013 年到 2022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货贸额从 1.04 万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 2700 亿美元。<sup>[4]</sup> 世界银行专门发布“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可使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 2.8% 至 9.7%、全球贸易增加 1.7% 至 6.2%、全球实际收入增加 0.7% 至 2.9%。<sup>[5]</sup> 共建“一带一路”更推动共建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推动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援外、联合考古等领域合作，促进政党、青年、社会组织、智库、妇女、地方交流，初步形成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明共荣发展态势，<sup>[6]</sup> 开辟出一条“文明之路”。

---

[1] 习近平：《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中国军网，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www.81.cn/2017zt/2017-05/14/content\\_7600768.htm?from=singlemessage](http://www.81.cn/2017zt/2017-05/14/content_7600768.htm?from=singlemessage)。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7 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23 年 7 月 23 日，[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shgqhy/202307/t20230723\\_1358616.html](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shgqhy/202307/t20230723_1358616.html)。

[4] 章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网站，2023 年 4 月 7 日，[http://karachi.china-consulate.gov.cn/xwdt/202304/t20230407\\_11055931.htm](http://karachi.china-consulate.gov.cn/xwdt/202304/t20230407_11055931.htm)。

[5] 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2019 年，<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第 5 页。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中国政府网，2019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2/content\\_5385144.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2/content_5385144.htm)。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金砖精神”为全球文明交流提供“最佳实践”。扩员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全球比重26.46%，人口占41.87%。2021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约24.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近25%。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50%，<sup>[1]</sup>已成为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自2006年开启合作进程以来，金砖国家已培育出互尊互谅、平等相待、团结互助、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金砖精神。<sup>[2]</sup>这一精神也被浓缩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八字内涵。金砖国家尊重彼此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当前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推动金砖国家经济、政治和人文交流合作“三轮驱动”，“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佳实践”。<sup>[3]</sup>“金砖精神”得到广泛国际认同，20多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举行，决定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六国加入金砖。这将进一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效推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 四、结语

全球文明倡议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直面文明交流互鉴的突出堵点，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形成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理念体系。其一经提出，就引发国际社会积极反响。截至2023年9月21日，全球文明倡议已写入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加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全文）》，人大重阳网，2022年6月21日，[http://rdcy.ruc.edu.cn/zw/jszy/rdcy/grzl\\_rdcy/266e277885bd492f99a6606cb9c0b269.htm](http://rdcy.ruc.edu.cn/zw/jszy/rdcy/grzl_rdcy/266e277885bd492f99a6606cb9c0b269.htm)；《人大重阳报告：十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翻倍》，中国网，2022年6月23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2-06/23/content\\_78286459.htm](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2-06/23/content_78286459.htm)。

[2]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全文）》，中国政府网，2017年9月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04/content\\_5222643.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04/content_5222643.htm)。

[3]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19年11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15/content\\_545219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15/content_5452195.htm)。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刚果共和国、巴勒斯坦、洪都拉斯、所罗门群岛、阿尔及利亚、格鲁尼亚、圭亚那、贝宁、委内瑞拉、柬埔寨、赞比亚等国政府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第四届中阿政党对话会落实全球文明倡议银川宣言》、中非领导人对话会联合声明，并获得古巴、南非、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毛里塔尼亚、布隆迪等国政府、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等赞赏支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之一，也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sup>[1]</sup>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sup>[2]</sup> 全球文明倡议正是文明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提供的一大国际公共产品。其顺应文明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趋势，必将引领世界文明大交流、大发展、大融合潮流，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迈向新高度。

【责任编辑：李静】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外交部网站，2023年6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jtb\\_673085/zfxgk\\_674865/zcfg/fl/202306/t20230628\\_11105189.shtml](https://www.mfa.gov.cn/wjtb_673085/zfxgk_674865/zcfg/fl/202306/t20230628_11105189.shtml)。

[2]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 “新华盛顿共识”与 美国经济战略的转型\*

□ 李 巍

〔提 要〕自由主义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思想的根基和内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基于各种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叛力量一直在孕育，但受制于既有思想的强大惯性，这种反叛力量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行动指南和最终的政策方案。直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巨大变革力量才开始凝聚成强大的执政共识，并转化为现实的操作方案，美国的决策精英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新华盛顿共识”。新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美国要大力动用国家权力工具，从内政（产业政策）和外交（经济外交）两个方向入手，全面复兴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和技术创新能力，以服务大国战略竞争的目的。这是美国经济战略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力度的转型，即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美国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既打破了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立国的传统神话，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进都带来重大影响。

〔关键词〕国家主义、新华盛顿共识、产业政策、经济外交、经济战略

〔作者简介〕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F1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5期 0048-23

\* 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3—2025年度明德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4XNJ006）的资助。感谢我的博士生邹玥对本文研究的贡献。

2023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力》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并且首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为美国未来的经济战略规划提供了思想基础。<sup>[1]</sup>由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官来对外宣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本就释放出不同寻常的信号。不仅如此，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以及拜登总统本人也先后就美国的经济战略发表了多次重要演讲。这些演讲所呈现的一些基本思想，代表了美国战略精英界基于美国国内利益结构和社会思潮嬗变所形成的一些重大执政共识。它不仅勾勒出美国未来宏观经济战略的基本走向，也展现了美国正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力度的经济理念和战略实践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 一、美国经济思想的两大传统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以杰斐逊自由主义思想为根基而立国。<sup>[2]</sup>自由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信奉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小政府大市场”。<sup>[3]</sup>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它

---

[1]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2]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3] 当代经济自由主义最主要的阐述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被认为是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而闻名的“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的两大思想竞争对手——经济国家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都陷入了相对低潮，再加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无敌”的超强实力地位，两者共同促成了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到来，整个世界几乎都洋溢在经济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欢乐海洋”之中。<sup>[1]</sup>

但是，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历程进行抽丝剥茧，会发现美国经济思想的光谱上实际上存在“一明一暗”两条并行的线索，分别为“杰斐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根据这两条思想线索在19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发展演进和所受到的外在影响，它们又可被称之为“不列颠传统”（Britain Tradition）与“德意志传统”（German Tradition）。<sup>[2]</sup>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先发国家，在19世纪最早拥抱了经济自由主义，诞生了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德国作为19世纪末期崛起的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在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更多地强调国家干预，其工业化进程更多受到国家主义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影响。<sup>[3]</sup>英国和德国作为欧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在19世纪分别孕育了西方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它们直接影响了作为思想“晚熟儿”的美国经济实践，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经济思想演变的两个关键的源头。

通常而言，杰斐逊主义或者说不列颠传统在美国更引人注目，而汉密尔顿主义或者说德意志传统在美国的影响却常被低估甚至忽视。这与自由主义思想更便于进行理论提炼和叙事传播而国家主义更长于操作实践有很大关系。

---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16, 1989, pp.3-18; G. John Ikenberry, “The Liberal Sources of American Unipolarity,” in Ikenberry, Mastanduno, and Wohlfor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16-251.

[2] 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更多是受到来自英国的古典重商主义的影响，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意志经济思想更多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及之后对美国产生影响。对于汉密尔顿思想的来源，可以参见罗恩·彻诺：《汉密尔顿传》，张向玲、高翔、何皓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对于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思想，参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美国被打上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标签，自由主义被认为是美国成功的唯一思想武器，这导致了我们对美国经济思想内核的误读。

在美国的经济思想史中，杰斐逊的放任自由主义传统作为“明线”确实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政府不过多地干涉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而是实行最低限度的政治控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宏观经济制度结构，美国因此还被认为是比较政治经济学（CPE）意义上的“弱国家”（weak state）类型。<sup>[1]</sup> 在19世纪的美国，除了财政部，美国基本上没有太多管制经济的联邦政府机构。<sup>[2]</sup> 作为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建立更为强大和集权的联邦政府，由这个政府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sup>[3]</sup> 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国家应以保护性关税、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发展，强调联邦政府应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sup>[4]</sup> 但是在杰斐逊主义的强大影响下，该报告最终被国会否决。不仅如此，汉密尔顿一手推动创立的美国国家银行在第二次到期之后也没有得到国会的续约批准。总之，汉密尔顿的经济理念没有成为美国的主导思想，在与杰斐逊的思想竞争中败下阵来，美国在19世纪总体上进入了一个杰斐逊所主张的放任自由的经济时代。

尽管如此，作为“暗线”的汉密尔顿主义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并非销声匿迹。在19世纪中期的洲际铁路计划中，俄亥俄州、马里兰州等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土地出让在推动铁路建设和沿线产业发展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而成为美国最早成功实践的产业政策，只不过这种政策实践的推动者

---

[1] Stephen D. Krasner, “U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ravel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1, No.4, 1977, pp.635-671.

[2] 1789年，美国首届联邦政府正式运行，当时只有三个行政部门，分别是外交事务部、财政部和战争部，分管外交、经济和军事事务，后来外交事务部改名为国务院，监管国家档案和联邦各州的通讯文件等事务。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3] Richard Morris,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57.

[4]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Manufactures,” December 5, 1791, [https://constitution.org/2-Authors/ah/rpt\\_manufactures.pdf](https://constitution.org/2-Authors/ah/rpt_manufactures.pdf).

主要是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sup>[1]</sup>20 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和城市化的推进带来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化，同时随着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走出孤立主义，积极扮演国际领导角色，以杰斐逊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虚弱的“国会政府”已然力不从心，无法应对美国当时所面临的诸多内外挑战。<sup>[2]</sup>在此背景下，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兴起，要求增强和扩张联邦政府的行政能力，提高技术专家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作用。<sup>[3]</sup>在这一时期，劳工部、商务部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等一系列政府经济机构先后建立起来，美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自立宪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轮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sup>[4]</sup>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对美国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再次构成严重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后，通过“新政”急剧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职能，行政部门首次大规模介入了美国的国内经济活动，美国进入到一个“大政府”的时代。<sup>[5]</sup>可以说，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到后来的新政运动，美国完成了经济理念的第一次重大转型，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复活，它在经济学教科书上被概括为凯恩斯主义。

思想竞争的钟摆永远不会在某一个端点长期静止。20 世纪 70 年代，在滞胀危机的压力下，美国保守主义（经典自由主义）重新崛起。1981 年，里根在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说到：“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所在。”<sup>[6]</sup>

---

[1] 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 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2 页；刘露馨：《重塑“利维坦”——大国竞争与美国式发展型国家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0 期，第 80-81 页。

[5] Harold G. Vatter and John F. Walker, *The Rise of Big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6] 这句话的英文原文为“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参见 <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ronald-reagan/reagan-quotes-speeches/inaugural-address-2/>。

这句话后来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信条。经过“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政策革命，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声名狼藉，以倡导解除管制、自由市场、削弱福利体系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成为美国压倒性的经济理念，它不仅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主导思想，而且还成功改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最后被智库经济学者提炼为十条金科玉律作为政策操作的药方，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借助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模范效应向全球快速推广。<sup>[1]</sup>

随后，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的崩溃以及东亚模式的困境进一步抬升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吸引力；而由华尔街的金融力量和硅谷的技术力量所联合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关贸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之后进入了新的高潮，这也提升了自由主义的魅力。<sup>[2]</sup>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极力进行自由市场的叙事，这让世人遗忘了美国的汉密尔顿主义，强化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面。<sup>[3]</sup>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基于各种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社会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叛力量开始大规模孕育。这种环境的变化主要源自两方面，一是对内方面，美国国内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不平等，广大的中下阶层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中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福利；相反，美国的金融集团和技术精英攫取了经济全球化中的绝大部分收益，这加剧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分裂和政党政治的极化。<sup>[4]</sup>二是对外方面，美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美国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所制

---

[1]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Charles Go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28, No.5, 2000, pp.789-804.

[2] 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3]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马丁·吉伦斯：《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力》，孟天广、郭凤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周紫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定的对华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将中国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反而给美国培育了一个强劲的综合竞争性对手。<sup>[1]</sup> 这导致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困扰。<sup>[2]</sup> 这两方面的变化和挑战在美国国内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学术反思和政策辩论，本质上是200多年前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辩论的再现。<sup>[3]</sup>

受制于自由主义的强大惯性和路径依赖，以及美国连续两任总统政治领导能力的匮乏，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反叛力量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行动指南和最终的政策方案。直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巨大变革力量才开始凝聚成强大的执政共识，并转化为现实的操作方案，美国的决策者将其概括为“新华盛顿共识”。这是美国经济战略思想和实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力度的转型，即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美国正在快速“找回”被遗忘了40多年的汉密尔顿主义。

## 二、“新华盛顿共识”的形成

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是这股“找回”汉密尔顿主义思想浪潮的重要体现。<sup>[4]</sup> 这篇演讲分别阐述了美国面临的四大严峻挑战，以及拜登政府正在为之采取的五大行动步骤。沙利文指出，二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破裂，美国应联同盟伴达成“新华盛顿共识”，并在此基

---

[1]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November 30,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news/speeches/2022/11/remarks-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us-competitiveness-and-china>.

[2] Gideon Rose, “The Fourth Foun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1, 2019, pp.10-21; Michael J. Boyle, “The Coming Illiberal Era,” *Survival*, Vol.58, No.2, 2016, pp.35-6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 2016年，笔者和唐世平教授观察到美国国内的这场辩论，并进行了初步分析，参见李巍、唐世平：《美国在反思，中国须谨慎》，《世界知识》2016年第12期，第42-43页。

[4]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基础上重建一个“服务于我们的工薪阶层、产业发展、气候变化、国家安全以及世界最贫穷和脆弱国家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无独有偶，在沙利文发表演讲一周前的4月20日，财政部长耶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专门就中美经济关系的发表了演讲。<sup>[1]</sup>而此前的2022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就美国的竞争力与中国挑战发表了演讲。<sup>[2]</sup>2023年6月28日，拜登在芝加哥首次就“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进行了系统阐述。<sup>[3]</sup>这四份演讲是理解美国新经济战略的关键文献，它们所表达的核心思想高度一致，这表明美国执政精英在调整美国内外经济战略方面确实已经形成了比较坚定的“共识”。

“新共识”突出强调了美国所面临的四大挑战，从而导致美国难以继续坚守传统的以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旧共识”。第一，美国的产业基础正在被掏空。沙利文认为，“旧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假定(assumption)都是错误的，它们分别是“市场总是有效地分配资源”以及“任何经济增长不分产业类型都是好的”。而沙利文所呼吁的“新共识”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流，以及美国产业结构的过度金融化，重创了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暴露了美国在产业结构和供应链上的巨大缺陷。

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新共识”聚焦于中国所带来的地缘挑战，并以此批评“旧共识”的另外一个假定，即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变得更加和平和具有合作性。正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宣称中国的加入将使美国人变得富有，并能帮助中国走向更

---

[1]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on the U.S.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425>.

[2]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3]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Bidenomics,” June 2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6/28/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bidenomics-chicago-il/>.



加开放和自由。<sup>[1]</sup> 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快速提升，中国已经逐渐由伙伴与合作者转变为美国领导地位的重大威胁与竞争者。雷蒙多在之前的演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对华经济接触并没有推动中国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sup>[2]</sup>

第三，气候变化危机加剧清洁能源转型的压力。“新共识”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气候变化问题简单当做一个生态环境问题来处理，而是认为应该将经济发展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融合一起，美国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投资战略来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同时实现气候目标和就业目标。

第四，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加剧，威胁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旧共识”在经济发展的收益分配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信仰，那就是“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认为市场驱动财富创造最终会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分享，而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的政府公共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不利于财富创造。但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表明，建立在“旧共识”基础上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政策不仅没有惠及工薪阶层，反而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财富通过市场机制由上向下“涓滴”的现象并没有发生，这恶化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助长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进而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sup>[3]</sup>

可以说，“新共识”系统批判了“旧共识”的相关经济理念和政策主张，尤为强调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称其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强调美国及其盟伴要合力应对地缘政治特别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将国家安全和中产阶级福祉置于优先地位，不能因为经济效率而忽略

---

[1] 对于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背后的假设和期望的分析，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e Failures of the ‘Failure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2, No.2, Summer 2019, pp.99-114.

[2]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3] 拜登在 2023 年 6 月 28 日的演讲中，对“涓滴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认为其带来了“美国的失败”，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失败”，剥夺了美国人民的“体面、骄傲和希望”。拜登强调，“拜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投资自下而上的重建更有活力的美国中产阶级。参见“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Bidenomics”。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新共识”也展现出美国战略精英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悲观态度，称经济一体化并未带来全球和平与合作，反而危及了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为应对“新共识”所呈现的四大挑战，沙利文阐述了拜登政府将或正在采取五个行动步骤。第一，利用“现代美国产业战略”培育国内产业生态进而奠定新的产业基础。“新共识”认为，仅靠私人投资无法充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抱负，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增加有目标的公共投资来动员私营部门投资，以支持有战略性意义的关键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将成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柱。第二，加强与盟伴的合作，与其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有韧性的、先进的和有包容性的技术工业基础，美国的经济战略议程高度需要盟友和伙伴的支持，美国不能自行其是特立独行。第三，超越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着眼于时代核心挑战的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新共识”认为，当今需要解决的全球经济问题不仅限于降低关税，还在于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增长、增加就业、打击腐败等多个方面，因此需要与盟伴建立起“超越传统自由贸易的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第四，向新兴经济体调动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以革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同时致力于解决“脆弱国家”面临的债务困扰。第五，采用“小院高墙”策略保护美国的基础技术，以确保未来的技术服务于所谓“民主国家”和美国的安全，这一策略将通过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等手段加以实现。

沙利文与雷蒙多、耶伦以及拜登本人的一系列演讲所描绘的“新华盛顿共识”，是对美国过去一直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深刻反思和调整，它将经济政策与安全议程相结合，标志着美国治国理政的重大理念调整和行动转变，必然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新共识”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释放了三点重要信号。第一，中美是战略竞争关系而不再是之前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将在经济上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新共识”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战略的全面终结。但值得注意的是，耶伦、沙利文和雷蒙多三位拜登政府的最主要成员在讲话中均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

全面的经济脱钩，并期望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健康安全、债务纾解等全球挑战上进行合作。第二，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在于产业和科技。沙利文在其演讲中指出，中国对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支持正在“侵蚀美国的产业基础和科技竞争力”。“新共识”呼吁美国对关键产业领域增强政府投资，应对中国挑战。第三，为在产业与科技方面“竞赢”中国，美国需要同时动用国内与国际力量。一方面通过增加国内公共投资提升自身在产业和创新方面的实力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盟友和伙伴的技术和产业协作，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合作网络，同时联合盟伴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阻止中国的技术赶超。

总之，“新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美国要摒弃“旧共识”对自由市场的过度迷信和美好期许，而是决心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从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联盟两个方面，全面复兴美国国内的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以达到在国际上“竞赢”战略对手、在国内重建强大中产阶级的战略目标。它既是对美国未来内外经济政策所提供的宏观指南，也是对过去两年多来，拜登政府既有实践的一个总结。

### 三、拜登政府的行动方案：国内产业政策

经过长时间的矛盾堆积和特朗普的一系列“庸医乱治”，2020年的美国可谓内外交困、乱象丛生，呈现出浓重的大国衰败症状。拜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选美国总统，为了“治愈美国”，他组建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内阁团队。基于这个团队所形成的“新共识”，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对美国国内社会稳定性和国际经济竞争力造成了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制造业被大量离岸外包不仅破坏了美国本土的产业生态系统，危及技术创新能力，削弱军工基础，而且导致中产阶级的大规模溃败，国内社会结构严重分化，进而动摇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sup>[1]</sup>因此，复兴美国的

---

[1] 加里·皮萨诺、威利·史：《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机械工业出版社战略与规划研究所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制造业，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就成为拜登政府的头号使命。

长期以来，受“旧共识”的影响，美国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一直存在对产业政策的敌视，<sup>[1]</sup>认为它违背了公平市场的原则，其对《中国制造 2025》的尖锐批评就是明证。<sup>[2]</sup>其实，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已经意识到美国制造业衰落所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后果，并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sup>[3]</sup>但由于“旧共识”所形成的观念束缚，两任政府都没有公然采取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产业政策来扶植本土制造业的发展；<sup>[4]</sup>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外交还在致力于推动以“3T”（TPP、TTIP、TiSA）为代表的所谓高水平自由贸易谈判，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外交在用关税手段粗暴打击竞争对手的同时，却和大部分盟伴交恶。这两任政府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产业复兴方略。

为了对抗自由主义的强大惯性，实现产业战略目标，拜登政府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政治动员。具体而言，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鼓吹需要集中国内资源推动特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更加有效地展开对华产业竞争；以环境保护为由，鼓吹需要通过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来应对气候变化；以国内发展为由，鼓吹需要通过制造业回流复兴美国中产阶级；以增强创新为由，鼓吹通

---

[1] 对于产业政策成效的最新研究综述，参见 Réka Juhász, Nathan Lane and Dani Rodrik,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August 2023, [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sites/scholar.harvard.edu/files/dani-rodrik/files/the\\_new\\_economics\\_of\\_ip.pdf](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sites/scholar.harvard.edu/files/dani-rodrik/files/the_new_economics_of_ip.pdf)。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门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美国过去五十年的产业政策成效进行了分析，参见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Euijin Jung, “Scoring 50 years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1970–2020,” November 2021,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scoring-50-years-us-industrial-policy-1970-2020>。

[2] 2021年11月，戴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门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演讲，继续尖锐批评中国的“2025计划”，认为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零和竞争。参见“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utlining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October 4, 2021,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1/october/remarks-prepared-delivery-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ing-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

[3] 2012年，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先进制造战略》；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A National Strategy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February,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iam\\_advancedmanufacturing\\_strategicplan\\_2012.pdf](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iam_advancedmanufacturing_strategicplan_2012.pdf); “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October,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8/10/Advanced-Manufacturing-Strategic-Plan-2018.pdf>。

[4] 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27–154页。

过增加政府投资来维持美国的技术引领地位。经过艰难的国内政治博弈，拜登政府最终以“在岸生产”（onshoring）为目标的国内产业政策，配合以“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为核心的产业外交，推动实现了近四十年来美国经济战略实践的最重大转型。<sup>[1]</sup>

为推行新产业战略，拜登政府在国内发起了“投资美国议程”（Investing in America Agenda），大兴产业政策立法以推动产业复兴，旨在扭转过去十年来的离岸外包的趋势，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新的高薪工作机会。<sup>[2]</sup>2020 年 8 月，尚未入阁的戴琪（Katherine Tai）在美国进步中心的一个讨论发言中指出，特朗普采取的对华关税战旨在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措施；但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更具“进攻性”的策略，即让美国自身的产业和工人“更具有竞争力”，并建议利用补贴等激励措施帮助美国的产业发展，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sup>[3]</sup>拜登政府利用 2022 年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处于优势的有利局面，以雷霆之势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简称基建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简称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这三大关键法案，旨在推动美国国内的基建建设，改善投资的硬件环境，同时半导体和新能源两大关键产业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

最先在国会通过的是基建法案。基础设施的薄弱和老化是美国广受诟病的短板，这抬高了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特朗普在 2017 年 11 月访问中国之后，经过两相对比，他高呼修复美国基建刻不容缓，并将基建发展与国家安全相挂钩，但是致力于大幅减税的特朗普政府根本无力对基建展开任何有效的公共投资。<sup>[4]</sup>特朗普找准了问题，却开不出药方。拜登政府则首先以基建为突

---

[1] 李巍：《友岸外包：拜登政府产业外交新思想》，《文化纵横》2022 年第 5 期，第 8-11 页。

[2] “Invest in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invest/?utm\\_source=invest.gov](https://www.whitehouse.gov/invest/?utm_source=invest.gov).

[3] Yuka Hayashi and Andrew Restuccia, “Biden to Name Katherine Tai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December 9,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to-name-katherine-tai-u-s-trade-representative-11607552856>.

[4]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8, 2017, <https://gw.usmission.gov/remarks-president-trump-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破口，开启了美国加大国内公共投资的序幕。

根据基建法案，美国将在未来 8 年内投入 1.2 万亿美元，包括在五年内新增 5500 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改善能源结构，并拉动经济增长。法案涉及的主要投资包括以下三大领域：一是在传统基建领域，投资约 2600 亿美元用于维修和升级公路、桥梁、铁路、机场和港口航道等交通运输系统；二是在基础民生领域，帮助低收入家庭接入互联网，并确保供水、供电和互联网服务的稳定性；三是在新能源领域，投资超过 650 亿美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电动汽车充电器网络。<sup>[1]</sup>

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它是改善产业生态环境的基础性条件，完成基建的投资立法只是拜登“投资美国议程”的第一步。随后，拜登政府紧锣密鼓地开始对其认定的战略性产业提供实际支持。商务部长雷蒙多是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和执行的主导者。她在专门针对中国经济挑战的演讲中指出，未来十年，有三大产业和技术家族对于美国至关重要：一是与计算和数字相关的技术，包括微电子、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其中核心是芯片；二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三是清洁能源技术，核心是电动汽车。<sup>[2]</sup>为此，美国的产业政策需要采取切实行动保卫美国在这三个领域的技术领导地位。

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总体上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不过拜登政府在 2022 年 9 月仍然发起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以期通过增加投资、加强生物科学教育和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确保美国在生物经济这一占全球制造业 1/3 产值的巨大产业领域的技术领导地位。<sup>[3]</sup>相比之下，在另外两大遭遇中国挑战更为严重的产业，拜登政府选择通过更加正式的国会立法来推动其产业发展。雷蒙多和沙利文的演讲均重点强调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

---

[1]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November 15, 201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3684/text>.

[2]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3]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to Launch a National Biotechnology and Bio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9/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to-launch-a-national-biotechnology-and-biomanufacturing-initiative/>.



在过去数十年里的迅速衰退，其中雷蒙多指出，“美国在 1990 年的芯片制造份额占世界的 37%，而今天下降到 12%”。<sup>[1]</sup> 而拜登在演讲中则公开表达了对美国丧失电动汽车领导权的忧虑，称“中国在这场竞赛中领先”，美国必须加快发展电动汽车行业，“我们不能让他们赢”。<sup>[2]</sup> 半导体和新能源成为中美产业竞争的“主战场”。<sup>[3]</sup>

芯片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立法。该法案投资 2800 亿美元用于提高美国的芯片制造、基础科学和技术转化能力，其中 527 亿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半导体产业。该法案要求设立五大基金，用于资助芯片制造、相关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法案还设置了“护栏条款”，即在中国或其他不友好国家开展先进制程半导体制造业务的企业将无法获得法案补贴。<sup>[4]</sup>

《通胀削减法案》则计划在未来十年内，筹集约 7370 亿美元的资金，用以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并降低赤字和通货膨胀水平。事实上，该法案主要聚焦于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的投资，其意义远大于缓解短期的通胀问题。根据法案细则，其所募集的资金中约有 3690 亿美元将用于加强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其最具有产业支持性质的内容就是在生产端和消费端两个方面大力支持清洁能源产业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发展。具体而言，在消费端，法案计划通过个人税收减免、消费补贴等途径，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节能设备、屋顶太阳能装置等清洁能源产品；同时，法案还大力支持政府通过公共采购促进零排放车辆的使用，并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在

---

[1]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The CHIPS Act and a long-term Vision for America’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speeches/2023/02/remarks-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chips-act-and-long-term-vision>.

[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 Future Made in America,” May 1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5/18/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future-made-in-america/>.

[3] 关于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全球竞争的最新研究，参见李巍、邹玥、竺彩华：《电动汽车革命：大国产业竞争“新赛道”》，《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4 期，第 93-117 页；李巍、李珣译：《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外交评论》2022 年第 1 期，第 22-58 页。

[4] “Commerce Department Outlines 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Guardrails for CHIPS for America Incentives Program,” March 21,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3/commerce-department-outlines-proposed-national-security-guardrails>.



生产端，法案计划提供超过 600 亿美元，通过生产税抵免、投资税收抵免、提供贷款等方式，支持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关键矿物的生产、改造和研发。此外，法案还对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附加了限制，以确保电动汽车所使用的关键矿产和电池组件来自美国的盟伴国家，并促使电动汽车组装环节回流北美。<sup>[1]</sup>

这三个法案是拜登政府在经济立法上的重大胜利，也构成了美国产业战略在国内政策层面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通过加强政府投资改善国内生产环境，推动所谓在岸生产、复兴本土制造业，以加强其国际经济竞争力，因此也被耶伦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投资”。<sup>[2]</sup>为了配合上述三大立法的落实，拜登政府还发起了“投资美国之旅”（Investing in America Tour）活动。2023 年 4 月和 7 月，拜登和哈里斯及相关内阁成员发起了两轮投资美国之旅的行程，足迹遍布亚利桑那、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超过 20 个州，旨在加速动员各州公私部门的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强化美国制造能力。<sup>[3]</sup>

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鼓励和刺激之下，美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回流态势。特别在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以台积电（TSMC）、英特尔、三星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在美国的投资。2022 年 12 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晶圆厂举行了盛大的移机典礼，拜登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称美国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正在帮助其建立和加强该领域供应链，并高调宣称“美国制造业又回来了”。<sup>[4]</sup>该工厂也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外来投资项目，

---

[1] “Summary of the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vestments in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summary\\_of\\_the\\_energy\\_security\\_and\\_climate\\_change\\_investments\\_in\\_the\\_inflation\\_reduction\\_act\\_of\\_2022.pdf](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summary_of_the_energy_security_and_climate_change_investments_in_the_inflation_reduction_act_of_2022.pdf).

[2]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at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 October 24, 2022,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045>.

[3] “President Biden to Lead Investing in America Blitz Highlighting Investments, Jobs, and Manufacturing Boom Driven by Biden Economic Agenda,” June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1/president-biden-to-lead-investing-in-america-blitz-highlighting-investments-jobs-and-manufacturing-boom-driven-by-biden-economic-agenda/>.

[4]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Creating Good-Paying Jobs,”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2/06/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n-manufacturing-and-creating-good-paying-jobs/>.

总投资高达 400 亿美元。2023 年 4 月，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发布了研究报告，对该公司十年来追踪研究美国制造业回流情况进行了总结，报告称，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趋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十年前的愿景，发展到目前非常成熟的现实。<sup>[1]</sup>

尽管如此，断言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已经取得成功仍然为时尚早。自工业革命以来的 200 余年间，对于“去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实现“再工业化”，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制造业回流特别是本土产业生态的重新培植，需要长期的努力，它不是短期内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而美国的选举政治和政党对立天然决定了美国难以执行一以贯之的长期战略。不仅如此，美国国内的“工匠文化”已经遭遇了系统性破坏，工程师队伍相当匮乏，而且财政悬崖更是如“堰塞湖”般始终悬挂在美国执政当局的上空，这些因素都会给拜登政府的产业复兴抱负投下巨大的阴影。但不可否认的是，拜登的产业回流政策已经开始产生全球影响。受其激励，欧洲、日本等多国都先后出台了各自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政策，这必然会加剧国际产业竞争的零和性。

#### 四、拜登政府的行动方案：国际经济外交

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国家，这意味着它在推行经济战略的时候，除了国内政策工具之外，还有着他国所难以比拟的外交资源。“新共识”的重要思想内核之一就是联合美国的盟伴构建一个有“韧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因此，与具有浓厚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特质的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上任伊始就高度重视经济外交对于推进产业战略议程的重要作用，其本质就是利用政府外交力量干预和塑造国际市场，形成对美国有利的外部市场环境。<sup>[2]</sup>

---

[1] Patrick Van den Bossche et al., “America is Ready for Reshoring. Are You?,” <https://info.kearney.com/5/7484/uploads/america-is-ready-for-reshoring-are-you.pdf>.

[2] 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通常不使用“经济外交”这一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国家干预色彩，不符合美国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的身份定位，它在欧洲和日本更受欢迎。但通观拜登政府的外交活动，围绕经济事务展开的外交或者说外交活动中的经济内容占很大比重。对于拜登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讨论参见李巍：《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2 年第 12 期，第 43-47 页。

在全球层面，美国的经济外交主要围绕供应链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安全和技术出口管制四个方面展开。在供应链外交方面，美国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与供应链相关的全球会议，即2021年11月拜登亲自召集的全球供应链韧性峰会，以及2022年7月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主持的供应链部长级论坛。两次会议都是美国为构建供应链联盟所进行的外交努力，体现出美国领导全球供应链重塑的雄心。<sup>[1]</sup>

在基建外交方面，美国推动七国集团（G7）在2022年的峰会上，正式宣布启动所谓“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PGII的前身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表面标榜助力发达国家投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实则是为制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宣布美国未来五年内将为PGII筹集2000亿美元，并争取与G7其他国家共同筹集6000亿美元用于全球基建投资。<sup>[2]</sup>

在矿产资源外交方面，近年来美国通过多边平台大力联合盟友及矿产资源丰裕的国家塑造所谓“可控的”矿产供应链。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关键矿产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矿产逐渐替代石油等传统能源成为大国资源竞争的焦点。<sup>[3]</sup>2022年6月，美国在加拿大牵头建立了矿产领域的“金属北约”，即“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该组织由美国联合其盟友建立，并在成立之初邀请阿根廷、巴西、刚果（金）等关键矿产丰裕的国家参与，意在借此

---

[1] 全球供应链韧性峰会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参加，成员均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国家；部长级论坛有18个经济体参加，新增了巴西与法国。相比之下，部长级论坛进一步推进了供应链的实质性合作，各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通过落实透明、多样、安全和可持续的四项原则，维护供应链的长期弹性与稳定。相关研究，参见李巍、王丽：《拜登政府“供应链韧性”战略探析》，《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第1-24页。

[2]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Formally Launch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June 2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6/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formally-launch-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3] Sophia Kalantzakos, “The Race for Critical Minerals in An Era of Geopolitical Realignment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5, No.3, 2020, pp.1-16.

建立更加符合其利益的供应链体系以与中国竞争。<sup>[1]</sup>2023 年 3 月，美欧就组建“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Buyers’ Club for Materials）启动第一步谈判，并计划之后将更多国家囊括其中，以助其与盟友合作采购用于清洁能源的关键矿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sup>[2]</sup>

在技术外交方面，美国积极构筑对华技术出口特别是半导体产业领域中的统一管制战线。最初，拜登政府试图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这一特殊联盟覆盖设计、制造等半导体产业链各环节，旨在拉拢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具有半导体先进制造能力的经济体，并通过构建“小院高墙”将中国排除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虽然日本对加入该联盟的态度较为积极，但韩国等由于对中国半导体市场依存度较高，心存较大顾虑，该联盟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美国以半导体制造设备为突破口，联合荷兰和日本建立了出口管制联盟。2023 年 1 月，在沙利文的主导下，美日荷三方就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该协议旨将把美国于 2022 年 10 月单边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到荷兰和日本的企业，包括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日本大型光学仪器制造商尼康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巨头东京电子等，以全面阻止中国建立自己的芯片生产能力。<sup>[3]</sup>

在区域层面，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在印太地区、大西洋地区、美洲地区和太平洋岛国多管齐下、全面布局，构建起一系列由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印太方向，“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拜登政府推出的最主要的对华经济竞争的制度工具。2022 年 5 月，美国联合 11 个印太地区国家在东京宣布启动该框架，并确定其四个关键支柱为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

---

[1] MSP 成立后，加拿大率先响应，在 2022 年 11 月初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家中国企业退出对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对于美国的矿产外交，参见 Bentley Allan, “Friendshoring Critical Minerals: What Could the U.S. and Its Partners Produce?,” May 3,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5/03/friendshoring-critical-minerals-what-could-u.s.-and-its-partners-produce-pub-89659>.

[2] Andrew Duchren, “U.S., EU to Start Trade Negotiations on Minerals,” March 8, 2023,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eu-to-start-trade-negotiations-on-minerals-f5f58d7a>.

[3] Alex W. Palmer, “‘An Act of War’: Inside America’s Silicon Blockade Against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7/12/magazine/semiconductor-chips-us-china.html>.

经济和公平经济。随后太平洋岛国斐济加入，IPEF 已有 14 个成员国。IPEF 旨在联合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它填补了美国印太战略中经济合作机制缺失这一空白，表明美国希望通过“制度性回归”重塑区域经济秩序和复兴区域经济领导力的意向。<sup>[1]</sup>

在欧洲方向，2021 年 6 月，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美欧峰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在某种程度上，TTC 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了此前因美欧分歧而不了了之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但突出了技术合作的内容。首次部长级会议就推进投资审查、多边出口管制、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规则、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应对“非市场经济体”带来的挑战等五个方面达成合作共识。截至 2023 年 6 月，TTC 已累计召开四次部长级会议，成为美欧产业和技术合作的主要制度平台。

在美洲方向，2022 年 6 月，在洛杉矶举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上，拜登宣布启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倡议，涵盖投资、清洁能源、供应链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内容。

在太平洋岛国方向，美国在 2022 年 6 月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联手启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PBP），全面加强五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外交和经济存在。<sup>[2]</sup> 此举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针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所发起的制衡措施。

在双边层面，美国加快打造日本、韩国、印度和英国这四大经济外交战略支点国家，构建起牢固的双边经济、产业与技术联盟网络。美日方面，

---

[1] 相关研究参见李巍、赵菩：《“印太经济框架”：过程、内容与应对》，《东亚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 19-40 页；赵菩：《从 TPP 到 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3 期，第 46-61 页。

[2] “Statement by Australia, Japan,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 June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4/statement-by-australia-japan-new-zealand-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n-the-establishment-of-the-partners-in-the-blue-pacific-pbp/>.

2022 年 7 月，首届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EPCC）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标志着美日经济版的“2+2”机制正式建立，两国政府间经济合作关系全面升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透露，美日双方已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半导体研发机构，以保障重要部件的安全供应。2023 年 3 月，美国与日本达成关键矿产协议，意在使其满足《通胀削减法案》补贴条款对关键矿产来源地的要求，以吸引日本新能源汽车企业赴美投资。

美韩方面，两国发起了一个由国家安全顾问牵头的“下一代关键和新兴技术对话”，全面加强双方在经济安全及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协作。<sup>[1]</sup> 2021 年和 2022 年两国总统实现了互访，推动韩国跨国公司成为这轮投资美国本土的主力军，美国与韩国以半导体和新能源为核心的供应链合作已初具雏形。<sup>[2]</sup> 2023 年 5 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再次访美进一步巩固美韩经济合作。随着美韩同盟不断加固，美国或将在科技领域进一步强化与韩国的政策协调，借东亚盟友之力加强对华技术竞争。

美英方面，2023 年 6 月，在英国首相苏纳克访美之际，两国签署了《大西洋宣言：21 世纪美英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该宣言及其行动计划构成了美英各领域新型创新伙伴关系的基础，并将在两国间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安全框架。<sup>[3]</sup> 根据其内容，美英将就“关键和新兴技术”“经济安全、技术保护与供应链”“包容与负责任的数字化转型”“清洁能源经济”“国防、卫生和太空”五大支柱展开合作。此前的 2022 年 10 月，美国与英国双方宣布启动美英技术和数据全面对话，围绕数据、关键和新兴技术、安全且有弹性的

---

[1] “FACT SHEET: Republic of Korea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2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fact-sheet-republic-of-korea-state-visit-to-the-united-states/>.

[2] 2021 年 5 月，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访美，此行直接促成韩国企业宣布计划在美增加超过 300 亿美元的半导体和电动汽车投资。2022 年 5 月，拜登回访韩国。此行期间，现代汽车再次确认了至少 110 亿美元的赴美投资计划；此后不久，三星也宣布了高达 2000 亿美元的赴美投资计划。

[3] “The Atlantic Declaration: A Framework for a Twenty-First Century U.S.-UK Economic Partnership,” June 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08/the-atlantic-declaration-a-framework-for-a-twenty-first-century-u-s-uk-economic-partnership/>.



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交流。通过这一机制，美英得以利用双方技术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合作。

美印方面，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升温，印度正在成为美国实施“友岸外包”战略的重要目的国。2023年1月，沙利文与印度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首次会议，共商美印在创新生态系统、国防工业与技术等六大领域的合作。同年6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访美，两国在先进技术、国防、清洁能源转型、航天航空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成果。<sup>[1]</sup>

综上所述，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经济外交是拜登政府推行其产业战略的重要新内容，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面都推出了诸多新的产业与科技合作倡议，构建了一个异常严密的经济联盟网络。这个网络除了服务于美国和盟伴之间的经济合作之外，其主要意图就是削弱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拜登政府的经济联盟外交助长经济要素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武器，逼迫多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严重干扰了全球市场的正常运行，与美国一贯标榜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这必将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混乱，引发国际规则竞争与冲突，从而与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渐行渐远。

但另一方面，尽管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看似紧锣密鼓、声势浩大，但有多少政策举措能够最终实质性落地，还存在诸多变数。回顾历史，美国的不少外交倡议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场不了了之。美国的经济外交旨在联合盟伴共同遏制中国，但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遏制中国不仅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会使他们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因此不会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不少国家难以心甘情愿搭上美国的“战车”，只是在美国的胁迫和利诱之下“逢场作戏”。在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相对下降的新阶段，挑战来源的多元性、美国与盟伴之间的利益分歧等因素，都将进一步抬高美

---

[1] 这是莫迪2014年就任总理以来第6次访问美国，也是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外，拜登任内第3位享受国事访问礼遇的外国领袖。“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June 2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

国弥合盟伴分歧的成本，从而使美国再次陷入霸权“过度扩张”的陷阱。

## 五、结语

基于华盛顿执政精英所形成的“新共识”，拜登政府正在通过三大产业政策法案增加公共投资，鼓励制造业回流，努力修复美国产业生态系统，提升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更有竞争力的中产阶级；同时大力展开经济外交，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产业和科技合作，以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进而打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这些内政外交举措都是对“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的摒弃，是利用国家力量来干预市场，以实现“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因此，从本质上讲，“新华盛顿共识”代表着经济国家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大规模回归。

美国战略精英提出和践行的“新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美国经济战略大转型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严重挑战，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安全，中国都将面临更为险峻的外部环境。但也应看到，拜登政府企图通过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外交来强行改变市场格局犹如逆水行舟，毕竟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企业以追求利润为宗旨，未必会完全遵照政府指挥而违背市场规律。同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人才储备和产业集群等方面积累了巨大的优势。这些优势对于全球商业力量而言，已然形成一种强大的“磁场效应”，会对拜登政府经济竞争战略构成强大的对冲之势。中国需要通过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加强构建最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网络，来化解美国施加的经济竞争压力。

【责任编辑：宁国辉】

#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sup>\*</sup>

□ 赵明昊

〔提 要〕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关键词〕地缘技术、中美关系、现代产业战略、芯片联盟

〔作者简介〕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5 期 0071-27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17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国科技发展变局及对华科技竞争研究”（立项编号：22JJD810006）、复旦大学咨政研究支持计划的成果。

随着大国竞争的不断深化，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之外，从地缘技术视角审视国际关系越发重要。<sup>[1]</sup> 芯片，又被称为半导体或集成电路，是计算机、医疗设备、汽车以及先进武器等技术产品不可或缺的部件，也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研发的基础。进入数字时代，芯片安全日益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sup>[2]</sup> 近年来，美国对华展开的“贸易战”和“科技冷战”将芯片作为重中之重，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因素进一步增强了芯片问题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地缘技术视角出发，探究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对华遏压态势及其面临的限制性因素。

## 一、地缘技术与美国对华战略遏压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命题。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深入互动使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成为新的分析框架。<sup>[3]</sup> 近年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并推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国际经贸机制之间的制衡、“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供应链重塑等问题对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越发明显。<sup>[4]</sup> 地缘技术（geo-technology）视角则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意涵。

第一，技术水平是影响不同国家力量对比的关键变量，技术因素在一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技术水平的高下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

---

[1] Andrew Kennedy and Darren Lim, “The Innovation Imperative: Technology and US-China Rival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3, 2018, pp.553-572.

[2] Antonio Varas, Raj Varadarajan, Jimmy Goodrich, and Falan Yinug,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April 2021, pp.5-8.

[3] Geoffrey Gertz and Miles M. Evers, “Goeconomic Competition: Will State Capitalism W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 No.2, 2020, pp.117-136.

[4]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1, 2019, pp.42-79.

实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也是与发展模式、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的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从世界历史的长视角看，技术进步为大国崛起、军事和战争模式变革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进而深刻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大国竞争也常常是重大技术变迁的催化剂。<sup>[1]</sup> 当今时代，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在此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技术因素对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大国围绕“创新力”（innovation power）的竞争越发激烈。<sup>[2]</sup> 基于应对大国竞争的考量，很多国家还设法减少在技术方面对竞争对手的依赖，增强自身的技术自主性。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对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的未来而言，技术至为重要……未来十年，关键和新兴技术将会重组经济、带来军事变革并重塑世界。”<sup>[3]</sup> 为了增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技术因素的把控力，拜登政府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职位，并在国务院设立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旨在回应技术因素在大国竞争中不断提升的重要性。

第二，高技术企业等行为体对大国战略博弈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深度融合在大国技术竞争中更为突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拔尖的跨国企业拥有“超级权力”，深刻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sup>[4]</sup> 欧亚集团创始人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技术企业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玩家”，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体系相比，“技术之极”（technopolar）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技术企业可以“决定国家如何投射经济和军事力量、塑造未来的就业并重新界定社会契

---

[1] 黄琪轩：《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第89-96页。

[2] Eric Schmidt, "Innovation Power: Why Technology Will Define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102, No.2, 2023, pp.38-44.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32-33.

[4] 蔡翠红：《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研究》，《人民论坛》2019年第34期，第34-37页。

约”，构建大国博弈所依赖的全球环境。<sup>[1]</sup>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言，谷歌、英特尔、特斯拉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相关的科技和产业协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过总统科技顾问理事会、国会创设的“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制，技术专家和高技术企业负责人为美国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政策建言和实际支持。<sup>[2]</sup>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提供的“星链”服务、星球实验室公司（Planet Labs）提供的卫星图像情报等成为影响乌克兰战局的关键因素，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推动世界军事进入智能化作战的新时期。<sup>[3]</sup>为确保长期占据超强技术优势，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增加政府对研发活动和高技术产业的投入，推动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重塑，加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协作，大力打造针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sup>[4]</sup>

第三，与技术因素高度相关的联盟或阵营构建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技术之争与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竞争紧密联结。为强化针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注重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技术联盟，力图加大情报共享，并在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增进政策协调，以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目标。这类技术联盟还具有推动联合融资、共同研发的功能，其目标是提供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选择”，

---

[1] Ian Bremmer, “The Technopolar Moment: How Digital Powers Will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100, No.6, 2021, pp.112-128.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 July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nsc/briefing-room/2021/07/13/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at-the-national-security-commiss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global-emerging-technology-summit>.

[3] Sylvia Pfeifer, “Ukraine War Puts Spotlight on Tech-led Defence Companies,” *Financial Times*, May 10, 2023.

[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削弱竞争对手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此外，技术联盟注重应对国际技术标准、新兴技术治理、科研伦理等方面的大国竞争，如增强西方国家对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组织的控制力，确保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符合所谓民主价值观。<sup>[1]</sup>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技术之争越发呈现“跨域竞争”的特征，即供应链、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因素与技术竞争深度捆绑，如拜登政府在“民主峰会”框架下设立的“出口管制和人权倡议”。<sup>[2]</sup>此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地缘政治机制也越来越多地被嵌入技术竞争的功能，美国试图将技术因素尤其是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作为地缘政治阵营构建的粘合剂，以应对“数字威权主义”“经济胁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等为驱动力，打造所谓“民主技术联盟”。<sup>[3]</sup>

近年来，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全力实施竞争性对华战略，宣扬美中较量迎来“决定性十年”。<sup>[4]</sup>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sup>[5]</sup>前助理国务卿帮办、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战略界人士认为，技术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挑战结合在一起，已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焦点。<sup>[6]</sup>在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拜登政府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紧迫感日益增强。2022年9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全

---

[1] 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9期，第12-15页。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xport Controls and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Code of Conduct Released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March 30, 2023, <https://www.state.gov/export-controls-and-human-rights-initiative-code-of-conduct-released-at-the-summit-for-democracy>.

[3] Anders Rasmussen, “Building a Democratic High-Tech Alliance,”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9,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emocratic-technology-alliance-global-digital-rules-by-anders-fogh-rasmussen-2021-03>.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23-25.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6] Peter Cowhey and Susan Shirk, “The Danger of Exaggerating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wes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8, 2021.

球新兴技术峰会”（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相关活动发表的演讲中称，美国仅保持领先是不够的，需要尽可能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技术差距。<sup>[1]</sup>这一讲话体现了美国对华技术竞争战略思维的重要转变，预示美方将为中国的研发活动制造更多阻力，甚至会设法“推回”中国业已取得的技术进步。<sup>[2]</sup>

在美国对华技术竞争中，推进芯片遏压是其核心方向与关键战线。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科技冷战”成效有限。这让美国方面认识到，不可能也没有足够能力在所有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限制，对华需展开多层次科技竞争，聚焦人工智能、5G、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必争必赢”技术，而这首先需确保在芯片方面实现“必赢”。<sup>[3]</sup>

实际上，美国在芯片领域拥有较大优势。芯片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军工创新综合体”的产物，至今绝大部分芯片核心知识产权仍为美国所掌控。<sup>[4]</sup>芯片产业大致分为设计、制造、测试和封装三大部分。由于芯片制造需要耗费大量土地、水资源等成本，同时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美国逐渐将芯片制造外包给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但在芯片设计、芯片技术核心知识产权、芯片制造设备关键零部件方面，美国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短板主要在芯片制造环节。相关研究显示，从产业总体状况看，截至2020年，美国企业在全球芯片市场的占有率高达47%，韩国为19%，日本和欧洲各为10%，中国台湾地区为6%，中国大陆则为5%。<sup>[5]</sup>

---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16/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at-the-special-competitive-studies-project-global-emerging-technologies-summit>.

[2] Rishi Iyengar, “Biden Short-Circuits China,”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8, 2022.

[3] Arthur Herman, “Biden, Semiconductors, and America’s Future,” *Forbes*,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thurherman/2021/02/17/biden-semiconductors-and-americas-future>.

[4] 乔纳森·格鲁伯、西蒙·约翰逊：《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穆凤良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60-69页。

[5] George Calhoun, “The U.S. Still Dominates in Semiconductors; China Is Vulnerable,” *Forbes*, October 11,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georgecalhoun/2021/10/11/the-us-still-dominates-in-semiconductors-china-is-vulnerable-pt-2>.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芯片技术和产业方面的短板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芯片制造设备和零部件、先进芯片产品、芯片特殊材料等严重依赖进口，而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芯粒硅基集成工具、芯片异质集成工具等方面也远未做到自主可控，“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sup>[1]</sup>

即便中美在芯片领域的实力对比有很强的不对称性，美方仍高度担心中国在芯片技术和产业方面的进展威胁其优势地位，并进而影响其他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中美博弈。2022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中国凭借其技术实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和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确保自身处于全球创新的前沿，而芯片则在大国技术竞争中处于“原点”（ground-zero）地位。<sup>[2]</sup>在雷蒙多等拜登政府高官看来，美国国内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严重不足，在芯片领域的国家安全脆弱性非常显著，一旦芯片断供，美国不仅要陷入经济衰退，甚至连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军事装备也无法生产。根据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的评估，美国90%的先进芯片需从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尤其是5纳米及以下的高端芯片基本完全依赖台积电和三星公司。<sup>[3]</sup>与此同时，美方担心中国大陆对先进芯片研发的持续投入将对美国在芯片领域的技术优势构成长期性挑战。<sup>[4]</sup>在2022年7月致国会两党领袖的联名信中，雷蒙多与国防部长奥斯汀明确表示，芯片问题不仅是大国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基础，也与军事安全领域的较量息息相

---

[1] 李国杰、孙凝晖：《探索我国信息技术体系的自立自强之路》，《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1期，第3-4页。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November 30,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news/speeches/2022/11/remarks-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us-competitiveness-and-china>.

[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ssessment of th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Supporting the U.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dustry,”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Assessment-Critical-Supply-Chains-Supporting-US-ICT-Industry.pdf>.

[4] The 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关。他们强调，2014 年以来中国已在芯片行业投入 1500 亿美元，到 2030 年预计将拥有全球近 25% 的芯片产能，美国必须更加有力地对抗来自中国的竞争。<sup>[1]</sup> 此外，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高度重视芯片问题，并将其与台湾问题、“经济胁迫”等捆绑，为其炒作“中国威胁”提供说辞。<sup>[2]</sup> 为推动《芯片和科学法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强调了应对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称“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项法案，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创新者的地位。”<sup>[3]</sup>

## 二、美国对华芯片遏压的国内部署

在布鲁金斯学会前主席约翰·艾伦（John Allen）看来，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不是关于哪一种或某几种技术，而是聚焦“技术堆层”（technology stack）的比拼。技术竞争与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技术规范的确立等紧密相关，需要对“创新生态系统”不断进行完善。<sup>[4]</sup> 这在芯片领域有着集中体现：芯片既基于国家的技术实力，也涉及制造业的先进技艺，芯片产业的发展还离不开基础设施、人才等方面的持续投入。2022 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这一法案为美国在国内推动对华芯片遏压提供了重要政策框架，也是美国产业政策进入新时代的标志。<sup>[5]</sup> 拜登政府注重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能力提升之间的融合，将对

---

[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Secretary Raimondo and Defense Secretary Austin Stress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 to Pass Domestic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Bill in Letter to Congress,” July 13,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7/commerce-secretary-raimondo-and-defense-secretary-austin-stress>.

[2] Michaela D. Platzer, Karen M. Sutter, and John F. Sargent Jr., “Semiconductors: U.S. Industr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Federal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6, 2020, <https://sgp.fas.org/crs/misc/R46581.pdf>.

[3] Jacob Fromer, “Senate ‘Test Vote’ Shows Support for Bill Providing \$52 Billion to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o Out-Compete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0, 2022.

[4] John Allen, “To Outpace China on Technology, the US Needs a ‘Full-Stack’ Strategy,” *The Hill*, March 1, 2021.

[5] Jeanne Whalen, “A New Era of Industrial Policy Kicks Off with Signing of the Chips Act,”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2022.

华芯片遏压与打造先进芯片产业集群、强化美国供应链韧性、加大芯片技术人才培养、为美国中产阶级提供就业岗位等政策目标并行推进。

第一，美国政府通过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力图为美国的芯片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扶持。<sup>[1]</sup>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批评其他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宣称政府提供产业补贴的做法会造成不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如今，为了实现对“竞而胜之”的目标，美国显著加大政府力量对经济和产业的干预力度，推进所谓“现代产业战略”。一些保守派政治人士如共和党籍参议员杨（Todd Young）、卢比奥（Marco Rubio）认为，只是追求市场效率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面对与中国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美国需要放弃针对产业政策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以应对“中国制造 2025”等带来的挑战，减少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sup>[2]</sup>2023 年 4 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美国寻求以“新华盛顿共识”重振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通过在先进芯片等领域实施“现代产业战略”提升美国竞争力，以“适应一个由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定义的新环境”。<sup>[3]</sup>

美国政府力图通过直接拨款、税收抵免等多种方式，为相关芯片企业提供支持，大幅提升国内先进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设立由商务部管理的芯片产业支持基金，相关芯片企业可通过竞争性程序申请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联邦政府将针对芯片研发和制造投入 527 亿美元，并借此产生“乘数效应”，刺激来自私营部门的更多投资。建设一

---

[1] Karen Kornbluh and Julia Tréhu, *The Ne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f Technology*, German Marshall Fund, March 2023, pp.8-10.

[2] “Sen. Todd Young 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Rebuilding American Capitalism,” June 28, 2023, <https://americancompass.org/sen-todd-young-on-industrial-policy-and-rebuilding-american-capitalism>; Marco Rubio,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Rise of China,” December 10, 2019,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5922cc54-2966-48a1-8e88-f7b51bbeca06/D0E7312935012E45F20C67A3450DDAFD.ndu-china-industrial-policy.pdf](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5922cc54-2966-48a1-8e88-f7b51bbeca06/D0E7312935012E45F20C67A3450DDAFD.ndu-china-industrial-policy.pdf).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座 5 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工厂，需要 150 亿~200 亿美元的投资。<sup>[1]</sup> 考虑到芯片产业的巨大投入，美国政府拟为相关芯片公司提供其资本支出的 5%~15%，以撬动 2000 亿~4000 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sup>[2]</sup> 由于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芯片产业本身具有广阔盈利前景，这为美国政府在芯片领域构建更为紧密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提供了有利条件。麦肯锡咨询公司预估，2030 年前全球芯片产业营收的年均增长率为 6%~8%，年营收规模有望达到 1 万亿美元。<sup>[3]</sup> 在美国政府加大扶持的背景下，很多美国企业都在加大对芯片产业的投入，如美光科技宣布投资 400 亿美元用于芯片制造；高通将为晶圆代工企业格芯公司（Global Foundries）扩建提供 42 亿美元资金，并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将美国本土芯片产量提高 50%。<sup>[4]</sup>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实施产业补贴方面设置了严格的国家安全“护栏”，禁止接受补贴的芯片公司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特定国家”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开展商业活动。<sup>[5]</sup>

第二，美国政府力图打造芯片全产业链生态和先进芯片产业集群，并在此过程中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在美国发明，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制造”的目标。美国对华芯片遏压与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的核心政策考量密

---

[1]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Make a Semiconductor Fab?,” August 16, 2022, <https://www.csfusion.org/semiconductor/how-much-does-it-cost-to-make-a-semiconductor-fab>.

[2] Chris Anstey, “US Goes on the Offensive in Its China Tech War,” Bloomberg, August 13,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newsletters/2022-08-13/us-goes-on-offense-in-china-tech-war-new-economy-saturday>.

[3] Ondrej Burkacky, Julia Dragon, and Nikolaus Lehmann, “The Semiconductor Decade: A Trillion-Dollar Industry,” April 1, 2022,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semiconductors/our-insights/the-semiconductor-decade-a-trillion-dollar-industry>.

[4]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

[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Department Outlines 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Guardrails for CHIPS for America Incentives Program,” March 21,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3/commerce-department-outlines-proposed-national-security-guardrails>.



切相关，试图通过调整美国的“创新地理”和“技术产业地理”，为与中国的长期竞争提供重要支撑，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美国广大中产阶级民众提供薪酬良好的就业岗位。<sup>[1]</sup> 发展芯片产业是美国促进制造业回流、打造面向未来的产业新优势系列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电动汽车、绿色能源、生物制造等拜登政府高度关注的技术产业密切相关。<sup>[2]</sup> 美国试图推动形成覆盖国内多地区的芯片产业集群。台积电公司在亚利桑那州、三星公司在得克萨斯州、英特尔公司在俄亥俄州、美光科技公司在纽约州分别推进系列芯片产业项目，有助于分散供应链和国家安全风险，提升相关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营造更具活力的竞争环境。<sup>[3]</sup> 雷蒙多表示，希望在2030年前形成多个先进芯片产业集群，除了芯片制造，美国政府还将支持发展先进的芯片封装设施、构建强大的供应商生态系统、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使美国成为融合“技术领导地位、供应多元性和韧性”的全球最佳芯片产业基地。<sup>[4]</sup>

为持续提升美国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实力，拜登政府着力完善“创新生态系统”，为解决芯片产业面临的研发挑战提供有力支撑。<sup>[5]</sup> 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投入110亿美元设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该中心致力于成为政府、企业、教育机构、投资者等多元力量开展密切合作的平台，促

---

[1] Julie Lawhorn and Marcy Gallo, “Reg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ubs: An Overview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0,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925>; Aurelia Glass and Karla Walter, “How Biden’s American-Style Industrial Policy Will Create Quality Job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October 27, 2022,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how-bidens-american-style-industrial-policy-will-create-quality-jobs>.

[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3] William Inboden and Adam Klein, “Judge the CHIPS Act as Defense Policy, Not Industrial Policy,” *The Hill*, March 20, 2022.

[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The CHIPS Act and a Long-Term Vision for America’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speeches/2023/02/remarks-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chips-act-and-long-term-vision>.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32-33; The White House, “The Biden-Harris Economic Blueprint,” September 2022, pp.24-26.

进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精密设备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交叉融合，确保美国引领先进芯片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利用。据统计，一款先进芯片从设计理念转化为市场产品的成本高达约 5 亿美元，而私营风险投资机构难以提供足够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试图发挥协调作用，通过建立共享实验室等方式帮助芯片企业节省研发和商业化方面的支出。<sup>[1]</sup>2023 年 4 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的愿景与战略》文件，提出该中心将促进芯片前沿技术的联合研发，加快相关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为美国的芯片技术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持。<sup>[2]</sup>

第三，美国政府强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政策手段，要求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社会性力量配合政府实施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打压华为、中兴、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通过“实体清单”“中国涉军企业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等机制限制美国企业对华出口芯片产品或开展其他商业和投资活动。此外，美方还通过所谓“中国专项行动”，以司法方式压制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中方在芯片等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奉行“小院高墙”策略，继续加码对华技术封堵，扩大制裁范围，升级打压力度。据统计，2021 年 1 月以来，有 200 多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被纳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长江存储、中科寒武纪、上海微电子等芯片领域的重要企业。2022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前所未有的芯片出口管制规定，大幅扩大受限制芯片产品和制造设备的范围，明确要求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不得为中国芯片产业提供任何支持，这一规定适用于在华开展业务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芯片企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C. Allen）等专家认为，此举试图阻滞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冻结中国芯片自主研发进程，

---

[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The CHIPS Act and a Long-Term Vision for America’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February 23, 2023.

[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严重破坏全球芯片产业的创新循环。<sup>[1]</sup>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一牧山浩石 (Hosuk Lee-Makiyama) 认为, 这一出口管制措施背离了美国的“动态比例” (sliding scale) 原则 (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关键技术领先他国一到两代), 力图尽可能扩大美国的领先地位, 不仅针对中国, 也有抢夺欧洲在光刻机等方面技术和市场优势的用意。<sup>[2]</sup>

上述新规的出台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对华芯片遏压策略的分水岭, 美国竭力打造的“硅幕”使技术冷战进一步升级为产品、设备、原材料、人员“四位一体”的打压, 旨在增加中国推动先进芯片研发制造的难度。<sup>[3]</sup> 为满足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要求, 英伟达等美国芯片企业调降了相关产品的技术性能, 以获取对华出口许可, 比如专供中国市场的 A800 图形处理单元 (GPU) 处理器。然而, 由于担心中方利用“芯片堆叠”等方式解决先进芯片不足的问题, 继续推进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 美国商务部计划进一步强化其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对华出口管制规则, 这将加大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对华出口芯片产品和相关设备的难度。<sup>[4]</sup> 美国政府还在考虑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用户提供云服务, 以避免中方利用云服务规避美国对先进芯片的出口禁令。<sup>[5]</sup>

此外, 美国政府试图从投资角度打压中国的芯片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近年来, 美国财政部主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机制加大了针对中国背景在美并购活动的国家安全审查。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统计, 中

---

[1] Alex W. Palmer, “‘An Act of War’: Inside America’s Silicon Blockade Against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23; Akiko Fujita, “Why US Tech Controls on China Could End Up Hurting American Semiconductors,” Yahoo Finance, October 23, 2022,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why-us-tech-controls-on-china-could-end-up-hurting-american-semiconductors-193354968.html>.

[2] Hosuk Lee-Makiyama and Robin Baker, “US Chips War Hits Allies but Likely Misses Long Term Chinese Strategic Target,” *East Asia Forum*, December 11, 2022,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2/11/us-chips-war-hits-allies-but-likely-misses-long-term-chinese-strategic-target>.

[3] Gregory C. Allen, “China’s New Strategy for Waging the Microchip Tech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3,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new-strategy-waging-microchip-tech-war>.

[4] Demetri Sevastopulo, “US Weighs Tougher Restrictions on AI Chip Exports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June 29, 2023.

[5] Asa Fitch, Yuka Hayashi and John D. McKinnon, “U.S. Considers New Curbs on AI Chip Exports to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7, 2023.

国在美并购活动占比仅为 4%，但涉华审查案件却占委员会审查案件总数的 15%。<sup>[1]</sup>在芯片领域，委员会已直接否决或迫使中方取消多起交易。<sup>[2]</sup>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推动构建海外投资审查机制，即限制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华投资，尤其是在芯片、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美国将资本市场“武器化”的做法，人为阻碍创新要素的正常流动，迫使一些西方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分拆在华业务等方式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芯片领域的商业合作关系构成严重负面影响。

### 三、美国构建遏华“芯片联盟”

为推进针对中国的芯片遏压，美国政府除在本土强化芯片技术和产能，也在与盟国和伙伴协作构建“芯片联盟”，力图从地缘技术角度对华实施外部制衡。“芯片联盟”旨在融合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力量，助力美国增强自身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芯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推动各方政策协调，促进“芯片联盟”成员的情报共享和芯片联合研发。借助其在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设备及其核心零部件、电子设计自动化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美国试图迫使盟友在对华芯片遏压方面向其靠拢，增强对全球芯片产业上中下游的把控力，打造排斥中国的先进芯片创新链和产业链。

第一，注重在政府层面深化各方协调，加大各类双边、小多边机制的联动，增强盟友对美国政府遏华举措的支持与配合。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以亚洲地区为重点。美方认为其在原材料、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领域对亚洲地区依赖度过高，尤其缺乏制造先进制程芯片的能力，在存储器芯片和逻辑

---

[1] Martin Chorzempa, “The United States Scrutinizes Investments Involving China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nited-states-scrutinizes-investments-involving-china-more-any-other-country>.

[2] Michaela D. Platzer, Karen M. Sutter and John F. Sargent Jr., “Semiconductors: U.S. Industr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Federal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6, 2020, <https://sgp.fas.org/crs/misc/R46581.pdf>.

辑芯片领域高度依赖从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进口。<sup>[1]</sup> 美国希望通过“芯片联盟”推动亚洲地区的先进芯片产业链向其国内转移，抑制美国和盟友芯片企业与中国大陆的商业关系。美国力图整合韩国、中国台湾的芯片制造优势以及日本的特殊材料、零部件和设备优势，增强对华技术封堵，在芯片设计、材料制造、封装测试等领域扩大“芯片联盟”的对华优势。<sup>[2]</sup>

在双边层面，美国与日本建立“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以实现两国高度协同，并促使日本在“芯片联盟”的其他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美日设立包括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和经济产业省等部门，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等机构在内的联合工作组，在研发、生产等方面明确任务分工，着力提升芯片等战略产品的供应链安全。<sup>[3]</sup> 此外，美国与韩国宣布构建“战略经济与技术伙伴关系”，通过高级经济对话、部长级供应链和商业对话等机制，深化在芯片供应链和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sup>[4]</sup>

在增进双边经济安全与芯片政策协调的同时，美国还通过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等平台推动多边合作。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主办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视频会议，决定在四边机制框架下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同年9月，四边机制决定在该工作组框架下实施“芯片供应链倡议”，提高芯片供应链的共同韧性，构建“多元且有竞争性的市场”。<sup>[5]</sup>

---

[1] Akhil Thadani and Gregory C. Allen, “Mapping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30,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apping-semiconductor-supply-chain-critical-role-indo-pacific-region>.

[2] Jae Chang, “The United States Looks to Form Semiconductor Alliance with Indo-Pacific Partners,” June 1, 2022, <https://asiamattersforamerica.org/articles/the-united-states-looks-to-form-semiconductor-alliance-with-indo-pacific-partners>.

[3] “Japan and U.S. Industry Chiefs Agree to Boost Semiconductor Cooperation,” *Japan Times*, May 27, 2023.

[4]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Chris Park, “Anticipating a U.S.-South Korea Semiconductor Allia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19, 2022, <https://www.cfr.org/blog/anticipating-us-south-korea-semiconductor-alliance>.

[5]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

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成的“芯片四方”则是美国“芯片联盟”布局的重中之重。美国试图推动各方达成芯片合作基本原则，涉及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投资审查、科技交流、保护商业秘密等方面。通过该机制，美国旨在建立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推进芯片供应链参与者有关库存、需求和交付动态、中间采购商和最终用户的信息共享，尽早发现供应链中断问题，加强各方政府机构和企业间接触，为美国把控全球芯片供应链体系提供数据和信息基础。<sup>[1]</sup> 美国力图拓展“芯片四方”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联动，借此促进日韩等与东南亚国家提升芯片合作水平，增强芯片供应链的透明度、安全性和可持续性。<sup>[2]</sup> 考虑到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等欧洲机构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拜登政府主要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机制加强跨大西洋协调。与此同时，美国越发注重促进“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方向的联动，推动欧盟、德国、英国、荷兰及其相关机构深化与“芯片四方”成员的沟通协作，进而实现“芯片四方”与美欧芯片合作机制的串联。<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试图将部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芯片联盟”。比如，东南亚国家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占有突出地位，在全球芯片测试和封装市场中占有高达 27% 的份额，其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8 年增至约 411 亿美元。<sup>[4]</sup>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芯片供应链预警系统，未来将通过“印太经

---

[1] Ralph Jennings, “US-led Semiconductor Alliance Setting Up ‘Early Warning System’ to Protect Supply Chains, Taiwan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7, 2023.

[2] Emily Benson, Japhet Quitzon, and William Alan Reinsch, “Securing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s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30,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curing-semiconductor-supply-chain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prosperity>.

[3] Paul Timmers, “How Europe Aims to Achieve Strategic Autonomy for Semiconductors,” August 9,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europe-aims-to-achieve-strategic-autonomy-for-semiconductors>; Gregory C. Allen and Emily Benson, “Clues to the U.S.-Dutch-Japanese Semiconductor Export Controls Deal Are Hiding in Plain Sight,” March 1,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lues-us-dutch-japanese-semiconductor-export-controls-deal-are-hiding-plain-sight>;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Republic of Korea Digital Partnership: Strengthening Our Economic Resilience,” June 3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3607](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3607).

[4] Alex Chen, “Importance of Southeast Asi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ighlighted by COVID-19,” *Digitimes*, January 10, 2022, <https://www.digitimes.com/news/a20211221PD218/semiconductor-industry-southeast-asia-supply-chain.html>.



济框架”等机制进一步将东南亚纳入其主导的“芯片联盟”。马来西亚因其在芯片测试和封装领域的积累和潜力，成为拜登政府的重点拉拢对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多次访问马来西亚，美国英特尔公司则宣布投入 71 亿美元在该国建立芯片封装工厂。<sup>[1]</sup> 此外，美国还支持印度成为全球芯片供应链的新枢纽。2022 年 5 月，美印宣布共同发起“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双方在芯片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美国芯片企业美光、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承诺斥资 30 多亿美元在印度建造组装和测试工厂、创新和商业化中心，芯片合作成为美印战略科技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撑。<sup>[2]</sup>

第二，重视发挥企业和相关商业组织力量，促进美国和盟友芯片企业之间的相互投融资，借此重构全球芯片产业链布局。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既需盟友在政府层面的合作，也离不开企业等私营部门的深度配合。美国希望协调“芯片联盟”各方的芯片产业政策，利用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促进各方企业间相互投资与商业合作。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统计，2021 年营收超过 100 亿美元的 17 家芯片公司中，英特尔、三星电子、台积电等位居前列，中国大陆最大芯片企业中芯国际的世界排名仅为第 25 位。由此可见，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芯片企业拥有较强的总体实力。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由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地 60 多家企业组成的“在美半导体联盟”（The 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 Coalition），这类机制在美国对华芯片遏压中扮演重要角色。<sup>[3]</sup> 围绕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拜登政府与芯片企业进行持续深入沟通，推动企业更好配合美国官方的遏华举措。

---

[1] “Intel Plans US\$7 Billion Chip Plant in Malaysia, Expanding Presence in Asia amid Semiconductor Shorta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6, 2021;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9.

[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Republic of India Official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June 2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fact-sheet-republic-of-india-official-state-visit-to-the-united-states>.

[3] “SIAC Letter to Congressional Leaders Urging Swift Enactment of Competitiveness Legislation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Incentives,” March 31, 2022, <https://www.chipsiname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SIAC-Letter-to-Congressional-Leaders-Urging-Swift-Enactment-of-Competitiveness-Legislation-Including-Semiconductor-Incentives.pdf>.

美国商务部要求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全球主要芯片企业向其提供包含客户敏感信息的商业数据，以增强美国对芯片供应链与贸易合作网络的把控。<sup>[1]</sup>此外，拜登政府还通过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主导的“芯片供应链倡议”、“芯片四方”等机制，就应对芯片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展开频密的政企协商。<sup>[2]</sup>

美国试图通过各类“芯片联盟”机制，打造地域多元化、“去中国化”的芯片产业合作框架，构建各方互联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盟友在先进芯片产业的互补性投资，在全球芯片产品市场提供针对中国企业的“替代性选择”。美国政府推动美国的英特尔、应用材料、美光科技，日本的东京电子、东芝、瑞萨（Renesas），韩国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等企业深化合作，构建稳定可靠的芯片供应链体系，减少各方对中国大陆产能和市场的依赖。<sup>[3]</sup>美光科技投资约 70 亿美元在日本广岛建设新工厂，计划于 2024 年投产，还着手扩大其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产能。大金工业、昭和电工等日本企业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增加投资，确保光刻胶（感光材料）、芯片特种气体（氟化氢）等芯片特殊材料的供应链稳定。韩国企业在 10 纳米及以下芯片领域占有高达全球 37% 的产能，特别是在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领域拥有全球约 70% 的市场占有率。拜登于 2022 年 5 月访问韩国时，将三星电子公司作为首访地，以彰显芯片企业在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中的重要性。美方还力促 SK 海力士等韩国企

---

[1] Debby Wu, “World’s Top Chipmakers Provide Data to U.S. as Deadline Arrives,” Bloomberg, November 7,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1-07/tsmc-withholds-customer-specific-data-in-answering-u-s-request>.

[2] Pranay Kotasthane, “The Quad Makes the First Siliconpolitik Move,” October 5, 2021, <https://www.isas.nus.edu.sg/papers/the-quad-makes-the-first-siliconpolitik-move>; Christian Davies, Song Jung-a, Kana Inagaki and Richard Waters, “US Struggles to Mobilise Its East Asian ‘Chip 4’ Allianc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3, 2022.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fact-sheet-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 Yoshiaki Takayama,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s in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25, 2021, [https://www.jiia.or.jp/en/strategic\\_comment/2021/10/2021-06.html](https://www.jiia.or.jp/en/strategic_comment/2021/10/2021-06.html); Pranay Kotasthane, Glenn Downey and Stephen Ezell, “Three Ideas for Four Countries Hunting for Chips: What the Quad Must Do to Build a Resilient Semiconductor Chain,” *Times of India*, May 24, 2022.

业在美投建芯片工厂和研发中心。<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着力推动中国台湾地区相关企业在芯片供应链重塑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据统计，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产品占全球 10 纳米以下芯片产量的 92%。作为全球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台积电不仅在美国投资设厂，还成为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支持的对象。<sup>[2]</sup> 美国政府推动台积电加快在亚利桑那州的 5 纳米以下芯片工厂建设，力图在 2025 年之前实现量产，确保美国军事工业和国家安全部门的芯片需求，如保障 F-35 战斗机的生产。<sup>[3]</sup> 日本政府为台积电提供 40 多亿美元的产业补贴，支持台积电与索尼公司在熊本县设立合资公司，建设月产能 4.5 万片 12 英寸晶圆的晶圆厂，力争在 2024 年底前投产。日本索尼、丰田和三菱等公司也考虑参投台积电在日本的芯片代工厂。<sup>[4]</sup>

第三，促进各方出口管制、商业执法、投资审查等政策举措的一体化，强化美国主导的芯片产业和创新生态。通过“芯片四方”等机制，美国试图推进构建更严密有效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针对芯片元器件、设备、材料、软件等制定一体化的出口管制规则，尤其是增强“芯片联盟”各方在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ECAD）软件、金刚石和氧化镓等方面对华出口管制的共识。<sup>[5]</sup> 美国希望日本、韩国等盟友采纳其“实体清单”等方式，

---

[1] Troy Stangarone, “The Role of South Korea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Strategy,” April 13, 2023,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role-of-south-korea-in-the-u-s-semiconductor-supply-chain-strategy>; “Joe Biden Visits Samsung Semiconductor Plant on First Trip to Asia,” CNBC News, May 20, 2022, <https://www.cnbc.com/video/2022/05/20/joe-biden-visits-samsung-semiconductor-plant-on-first-trip-to-asia.html>.

[2] “Japan Allocates \$5.2Bn to Fund Chip Plants by TSMC and Others,” Nikkei Asia, November 23, 2021,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Tech/Semiconductors/Japan-allocates-5.2bn-to-fund-chip-plants-by-TSMC-and-others>.

[3] Sujai Shivakumar and Charles Wessner, “Semiconductors and National Defense: What Are the Stakes?,” June 8,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miconductors-and-national-defense-what-are-stakes>.

[4] 《日本巨额补贴台积电会有果实吗？》，日经中文网，2022年6月29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economic-policy/49000-2022-06-29-05-01-00.html>。

[5] Stephen Ezell, *An Allied Approach to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September 2020, pp.31-38.

由其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国务院下设的出口管制和边境安全项目等提供培训，完善“芯片联盟”各方的出口管制体制，就先进芯片和设备等出口许可政策进行协同，建立“共同许可证”等制度，围绕涉及中国实体的“推定否决”（presumption of denial）情况加大信息共享。<sup>[1]</sup>美国尤为关注部分国家和地区企业试图通过改变相关产品的技术构成和参数，减少“美国成分”，以规避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希望利用“芯片联盟”约束各方，避免中国大陆方面利用出口管制漏洞。一些盟友已选择跟进美国对华芯片限制举措。2023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等国的新出口管制规则，涉及23种芯片设备和产品。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覆盖面较为广泛，有可能影响中国国内中低端芯片的生产。<sup>[2]</sup>

美国意图借助“芯片联盟”加强各方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中国大陆方面有关芯片所谓知识产权侵犯、经济间谍、商业秘密盗窃、使用盗版EDA软件等行为。美国还试图推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投资审查政策方面进一步向其要求靠拢。拜登政府围绕构建海外投资审查机制与日本、欧盟等展开协商，希望盟友采取更严格措施限制本国（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华投资，共享中国大陆敏感投资机构和个人等情报。美国力图增强“芯片四方”成员与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联动，搭建更广泛的多边投资审查机制，防止敏感和先进芯片技术以投融资方式流向中国大陆。美国咨询机构荣鼎集团和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近年来欧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实体的并购活动施加了更大阻力。<sup>[3]</sup>此外，拜登政府还希望通过“芯片联盟”机制，推动芯片研发专业人才和高技能工人流向美国，特别是吸纳中国台湾地区、

---

[1] Patsy Widakuswara, “US, Japan, South Korea Launch Forum to Cut Off Chips to China,” VOA, February 28, 2023, <https://www.voanews.com/a/us-japan-south-korea-launch-forum-to-cut-off-chips-to-china-/6984483.html>.

[2] Qianer Liu, Kana Inagaki and Anna Gross, “China Fears Japan’s Chipmaking Curbs Go Further Than US Restrictions,” *Financial Times*, May 23, 2023.

[3] Gabriele Manca, “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Is Changing,” June 3,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6/chinese-investment-in-europe-is-changing>.

韩国的芯片技术人才，为他们在美国工作提供签证便利等优惠待遇。<sup>[1]</sup>

美国试图通过“芯片联盟”推进各方修改政府采购相关规则，开展可信芯片产品和技术的认证，借助美国国防部负责的“可信赖工厂”（Trusted Foundry）计划等机制，确保“芯片联盟”成员的企业在芯片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sup>[2]</sup>美国希望在“芯片联盟”成员之间开发更安全的计算架构，规范芯片技术标准开放性流程，以推动形成新的芯片生态系统，增强各方芯片技术生态互操作性，进一步控制芯片创新要素在“芯片联盟”内部的流动。比如，支持英特尔、高通、三星、台积电等企业成立小芯片互连（UCIe）标准联盟，通过开源设计实现芯片互连标准化，从而降低成本，推动构建更广泛的芯片验证生态系统。美国“芯片联盟”各方开展联合投资，共同建立先进芯片联合研发中心，研制2纳米以下芯片等先进产品，旨在拉大中国与“芯片联盟”之间的技术代差。此外，为延伸“芯片联盟”影响力，美国政府试图将其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科技竞争紧密联系，以“芯片联盟”带动相关领域技术联盟的运行和拓展，强化对华芯片施压的系统性。芯片产业发展需要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无人驾驶等新兴技术的支撑，美国希望将“芯片联盟”与相关领域的技术联盟衔接，如5G领域的“民主十国”（D10）俱乐部、6G领域的“下一代移动网络联盟”（Next G Alliance）、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美国还推动“芯片联盟”向数字金融等领域延伸，在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新格局的框架下不断增强“芯片联盟”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行动力。<sup>[3]</sup>

---

[1] Eric Schmidt, “To Compete with China on Tech, America Needs to Fix Its Immigration System,” *Foreign Affairs*, May 16,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ric-schmidt-compete-china-tech-america-needs-fix-its-immigration-system>.

[2] Stephen Ezell, *An Allied Approach to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September 2020, pp.28-30.

[3] 唐新华：《“芯片四方联盟”加速西方“技术联盟”构建》，《科技中国》2022年第5期，第98页。

#### 四、美国对华芯片遏压的局限

在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较量，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sup>[1]</sup>然而，由于芯片的技术和产业特性，以及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存在诸多局限性因素。<sup>[2]</sup>

第一，美国在芯片领域的“现代产业战略”面临政治因素影响、制造业成本较高、技术人才缺乏等考验。美国国内有不少声音质疑拜登政府提出的“现代产业战略”，反对政府对芯片产业的过度干预，担心盲目补贴反而带来市场扭曲、产能过剩、贸易争端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有观点认为，“现代产业战略”实际上由政府代替市场来挑选“赢家”和“输家”，政府对芯片产业的补贴不仅会导致浪费，还可能造成破坏性后果。<sup>[3]</sup>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人批评说，美国政府在使用芯片基金方面存在漏洞，相关企业并不一定会在美国国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类补贴等于变相增加大公司的福利；由于英特尔等企业已决定扩大在美产能，预计到 2024 年美国芯片制造产业将获得约 800 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因此并不需要政府补贴。<sup>[4]</sup>芯片补贴在美国国内的流向、区域创新中心的确立等难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涉及美国国会议员的选区利益分配以及行政部门与产业界之间的关系，美国芯片产业的内部博弈料将更为激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穆罗 (Mark

---

[1] Alex W. Palmer, “‘An Act of War’: Inside America’s Silicon Blockade Against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23.

[2]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Taking Stock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July 13, 2021,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taking-stock-of-chinas-semiconductor-industry>.

[3] Fareed Zakaria, “We Now Have a Biden Doctrine. It Makes Me Nervou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5, 2023.

[4] Chris Stein, “How Bernie Sanders and Conservatives United Against US Semiconductor Bill,” *The Guardian*, July 31, 2022.



Muro) 认为, 美国产业战略能否持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sup>[1]</sup> 此外, 由于用工、建筑等方面的成本较高以及环境政策等方面的约束, 在美国发展芯片制造业面临很多挑战。<sup>[2]</sup>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 在美国建立芯片工厂的成本要比在中国台湾地区高出 50%。芯片制造的成本最终会增加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成本, 令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损。<sup>[3]</sup> 美国还面临缺少芯片领域高技能人才的困境。2030 年前, 美国芯片公司对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高达 30 万人。<sup>[4]</sup>

第二, 严苛的芯片出口管制等政策对美国芯片产业的长期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芯片行业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方之间深度的相互依赖。<sup>[5]</sup> 长期以来, 美国在芯片领域的领先地位建立在全球需求之上, 尤其是中国对芯片产品的需求占全球产量 75% 左右。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考量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美国遏华举措势将对自身利益造成反噬, 包括美国企业自身营收下降、市场份额被挤占、研发投入减少等。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估算, 若美国完全禁止芯片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 美国企业将损失 18% 的全球市场份额和 37% 的营业收入。若他国企业成功规避美国相关管制措施, 美国芯片企业还面临被日韩等竞争对手夺走市场份额的风险, 这将导致美国的管制

---

[1] Timothy Aepfel, "Insight: Chips, EVs Power Biden's Big Bet on America's Industrial Policy," Reuters, February 24, 2023,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us/us-manufacturers-see-big-boost-government-subsidies-tax-breaks-2023-02-23>.

[2] Katy Bartlett, Ondrej Burkacky, Loraine Li, Rutger Vrijen, and Bill Wiseman, "Semiconductor Fabs: Construction Challe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7, 2023,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industrials-and-electronics/our-insights/semiconductor-fabs-construction-challenges-in-the-united-states>.

[3] Tim Mullaney, "How Manufacturing Chips in the US Could Make Smartphones More Expensive," CNBC, March 9,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3/09/why-manufacturing-chips-in-us-may-make-smartphones-more-expensive.html>.

[4] Eric Schmidt, "To Compete with China on Tech, America Needs to Fix Its Immigration System," Foreign Affairs, May 16,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ric-schmidt-compete-china-tech-america-needs-fix-its-immigration-system>.

[5] Antonio Varas, Raj Varadarajan, Jimmy Goodrich, and Falan Yinug,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April 2021, pp.9-25.

政策效果适得其反。<sup>[1]</sup> 英伟达公司首席财务官克雷斯 (Colette Kress) 表示, 鉴于中国约占英伟达相关产品营收的 20%~25%, 限制对华出口将导致英伟达等美国企业永久失去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市场参与竞争的机会。若进一步收紧芯片出口管制新规, 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策略将失去可信度。<sup>[2]</sup>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会长诺伊弗 (John Neuffer) 表示, 不断升级的管制措施对美国该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构成了重大风险。诺伊弗称,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我们的企业必须在那里开展业务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和创新, 并保持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的地位”, 呼吁采取“保护国家安全但不对芯片行业造成无意且持久损害并能够避免未来冲突升级的解决方案。”<sup>[3]</sup>

第三, 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损害盟友利益。美国在芯片领域的“长臂管辖”对盟友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芯片联盟”迫使相关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美国要求盟友采取违背其短期经济利益的行动, 以换取某种模糊的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有利用“中国挑战”在芯片领域与盟友争夺领先地位的考量。<sup>[4]</sup>

在对华芯片合作方面, 美国对欧洲、日本、韩国等企业的限制引发不满, 美国与盟友在涉华政策上的分歧仍复杂难解。<sup>[5]</sup> 作为芯片制造设备领域的巨头, 荷兰阿斯麦公司是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政策的焦点。<sup>[6]</sup> 据统计, 2021 年由

---

[1] Akiko Fujita, “Why US Tech Controls on China Could End Up Hurting American Semiconductors.”

[2] Demetri Sevastopulo, “US Weighs Tougher Restrictions on AI Chip Exports to China.”

[3] Ana Swanson, “One Reason the U.S. Can’t Quit China? Chip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0, 2023.

[4] Nicholas Gordon, “Biden’s Efforts to Starve China of Chip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Global Trade,” *Fortune*, December 17, 2022, <https://fortune.com/2022/12/17/semiconductor-exports-free-trade-subsidies-china-ban-biden-morris-chang-tsmc>.

[5] Hideki Tomoshige, “Key Differences Remain between U.S. and Japanese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May 25, 2023, <https://www.csis.org/blogs/perspectives-innovation/key-differences-remain-between-us-and-japanese-advanced-semiconductor>.

[6] Matt Hamblen, “U.S. Wants Dutch to Ban ASML from Selling Chip Gear to China,” July 6, 2022, <https://www.fierceelectronics.com/sensors/us-wants-dutch-ban-asml-selling-chip-gear-china-0>.

中资或外资控股的中国客户为该公司贡献了约 15% 的总收入。<sup>[1]</sup> 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温宁克 (Peter Wennink) 表示, 出口管制是解决国家安全关切的一种工具, 但就芯片领域而言, 过度使用出口管制工具将削弱全球芯片制造能力, 加剧供应链短缺问题。荷兰首相吕特则呼吁欧盟制定自己的对华政策, 而不是盲从于美国。荷兰外贸大臣施赖纳马赫尔 (Liesje Schreinemacher) 表示, 美国不能在出口管制方面专断独行, 不应指望荷兰照搬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sup>[2]</sup> 2023 年 6 月, 荷兰政府发布了有关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新规, 主要针对最先进的沉积设备和浸润式光刻系统, 并非所有浸润式深紫外线 (DUV) 光刻系统。<sup>[3]</sup> 其他欧洲国家对美国在出口管制等方面的“越权” (overreach) 行为也存在不满和担忧, 希望寻求中间路线, 维持与中国的合作。<sup>[4]</sup> 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实施新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为三星、台积电等芯片企业提供一年豁免期。该项豁免将于 2023 年 10 月到期, 但拜登政府有意延长豁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这表明全球芯片产业链高度一体化的特性使排除中国困难重重, 美国盟友对华商业合作需求仍然巨大。<sup>[5]</sup>

此外, 拜登政府出台的旨在支持本国芯片产业的政策具有保护主义色彩, 扰乱全球芯片产业链, 对盟友的长期经济利益造成冲击。为抗衡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的不利影响, 法国、德国、韩国等都在推出政府补贴、

---

[1] Cagan Koc, Eric Martin and Jenny Leonard, “Netherlands Plans Curbs on China Tech Exports In Deal with U.S.,” Bloomberg, December 7,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2-07/us-led-curbs-on-china-tech-to-tighten-as-dutch-plan-new-controls>.

[2] Cagan Koc and Debby Wu, “Dutch Minister Says US Can’t Dictate Approach to China Exports,” Bloomberg, November 18,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1-18/dutch-minister-says-us-can-t-dictate-approach-to-china-exports>.

[3] 倪雨晴:《荷兰发布半导体设备出口新规 光刻机巨头 ASML 回应》,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3 年 7 月 1 日,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701/herald/6c9210f38096348e5215121228bbe216.html>.

[4] Daniel Ten Kate and Samy Adghimi, “Europe Reasserts Middle Path on China, Pushing Back on Biden,” Bloomberg, November 19,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1-19/europe-reasserts-middle-path-on-china-pushing-back-on-biden>.

[5] Yuka Hayashi, “U.S. to Allow South Korean, Taiwan Chip Makers to Keep Operations i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2023.

税收抵免等激励措施，留住和吸引相关芯片企业。<sup>[1]</sup> 美国与盟友之间围绕芯片产业战略的竞争值得关注。

第四，美国遏华举措被认为只能放慢而不能完全阻止中国的发展，对华芯片打压可能适得其反。<sup>[2]</sup> 科技产业研究机构“技术洞见”（Tech Insights）的专家认为，过去几年中芯国际已将其生产技术在原有的 14 纳米技术基础上提升两代，成功交付 7 纳米芯片，这一进展令人质疑美国政策的有效性。<sup>[3]</sup> 一些西方调查机构认为，中国企业和专业人员正研究不使用或使用较少先进芯片实现最先进人工智能性能的技术，并尝试通过结合不同类型芯片减少对美国硬件和技术的依赖。相关研究若取得成功，中国科技公司将更好适应未来的潜在制裁。<sup>[4]</sup> 此外，近年来全球“缺芯”挑战有利于中国芯片企业加速进入国际市场，或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的影响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tt）联合撰文称，美国正在输掉芯片竞争，如果中国在芯片供应链上形成持久优势，其将在基础技术方面取得美国难以匹敌的突破。<sup>[5]</sup>

## 五、结语

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技术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核心。美国推进

---

[1] Jeong-Ho Lee and Sohee Kim, “South Korea Passes Its ‘Chips Act’ Amid US-China Friction,” Bloomberg, March 30,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3-29/south-korea-to-pass-its-own-chips-act-amid-us-china-friction#xj4y7vzkg>.

[2] Sarah Bauerle Danzman and Emily Kilcrease, “The Illusion of Controls: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ontain China’s Technology Ambitions Will Fail,”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illusion-controls>.

[3] Peter Clarke, “SMIC Process Is 7nm, Says Tech Insights,” August 30, 2022, <https://www.eenewseurope.com/en/smic-process-is-7nm-says-tech-insights>.

[4] Karen Hao and Raffaele Huang, “U.S. Sanctions Drive Chinese Firms to Advance AI Without Latest Chip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7, 2023.

[5] Graham Allison and Eric Schmitt, “Semiconductor Dependency Imperils American Secur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0, 2022.

对华芯片遏压的深层次目标是实现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停滞乃至退化，进而削弱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高度依赖芯片的科技领域的实力。中国既要认识到美国在芯片领域不断强化压制的严峻性，也要看到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面临的诸多局限。一方面，中国要坚持底线思维，对美国在芯片领域升级遏华举措的动向做好前瞻预判、及时防范，大力探索我国芯片技术和产业体系的自强自立之路，完善我国芯片创新生态系统，为维护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和军事安全营造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须全面、准确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刻内涵，用好中国市场广阔、技术人才众多等优势，继续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融入芯片领域的全球创新网络，实现自主与开放双轮驱动，努力破解美国构建的“芯片联盟”，引导各方在发展与安全利益之间实现良性平衡。

【责任编辑：吴劭杰】

# 美日在东南亚的联手拓展： 战略协同与影响限度

□ 项昊宇 鲍志鹏

〔提 要〕随着美日同盟的全球化转型，美日正联手加大对东南亚的投入，表现出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战略手段的互补性和战略措施的协同性。在“竞赢”中国的目标驱动下，美日对东南亚外交从过去各自为战，到有意识地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强化联动配合，呈现出自上至下的战略引领、政策对接、资源共享、协同行动的特点。美日把对东南亚的合作纳入“印太”战略的框架中，通过对接《东盟印太展望》，扩大同东盟的战略契合点，手法上聚焦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吸引东南亚国家“入局”，注重通过功能性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并重点诱拉海上东盟国家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面临诸多掣肘，包括美国、日本、东盟三方利益诉求不同，美日与东盟地区秩序观差异，以及美日排他性、对抗性政策措施引发地区安全困境和分裂风险。

〔关键词〕美日同盟、中国—东盟关系、联盟政治、印太战略

〔作者简介〕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鲍志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5 期 0098-19

随着美国加快推动遏华指向的“印太战略”，美日同盟正由双边防御性同盟转向外向型的攻守同盟。美日聚焦“印太”，推动双边同盟与美国全球盟伴体系、集体安全架构和地区合作平台对接融合，正全面加大对地处“两



洋交汇”要冲的东南亚的战略投入。美日对东南亚外交突出服务于“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目标，重视协同配合，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发挥相乘效应，一方面加大对东盟主导的制度性网络的影响渗透，另一方面诱拉东盟国家加入美日主导的“印太”架构，东南亚日益成为美日同盟对外拓展的核心场域。美日相关动向对中国—东盟关系构成竞争和分化压力。本文聚焦美日联手经略东南亚的主要动向，通过对其协同手法、合作机制、影响限度的分析，力图揭示美日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向及影响限度，以期为中国运筹对东南亚外交提供参考。

## 一、战略协同：美日在东南亚的联手拓展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加大对日本的拉拢和借重，日本对外战略全面向美国靠拢，美日同盟呈现全方位拉紧，愈发突出争夺“印太”地区秩序主导权的战略取向。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处的战略要冲，早在奥巴马时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美日战略界就出现了主张联手拓展东南亚的讨论和政策建议。<sup>[1]</sup> 东南亚日益成为美日“印太”战略的主攻方向，美日官方层面也启动了相关的正式对话机制。<sup>[2]</sup> 随着美日在“印太”地区战略协同不断增强，两国在东南亚联手拓展亦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 （一）目标一致性

二战后美国依托美日同盟等亚太同盟体系，长期维持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美日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契合点在于联手维护两国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从美日各自的“印太”战略中可见，两国联手推进对东南亚外交主要有三方面考量：维护地缘政治影响、拓展经济利益、对华竞争遏制。

---

[1] 2015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报告《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中心性与美日同盟》中就提出，美日应积极支持东盟巩固其作为地区合作架构中心的目标，并积极适应东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加大对东盟投入。

[2] 2022年6月1日，美日举行首次外交部门东盟事务负责人战略对话，日方宣称“东南亚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目标的关键”，可视为美日对东南亚政策行动走向战略协同的标志性事件。

2016年发布的一份美日联合报告《美日关系与东南亚》提出，美日联手与东南亚合作有五个驱动力：共同的经济商业利益、东南亚的地缘价值、多边框架下东南亚与北美和东北亚的产业贸易联系、拓展美日双边合作的东南亚外延，以及合作应对中国挑战。<sup>[1]</sup>在2021年和2022年美日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提及“支持东盟在印太的中心地位及《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确认东盟的一体化和中心地位的重要性”，<sup>[2]</sup>表现出对东盟重要性的一致认可。

从美日在东南亚的一系列政策表态及行动看，两国对东南亚的协同拓展表现出三大战略目标：一是开辟第三方合作的新平台，联手拓展东南亚市场，服务各自经济利益；二是推动对华竞争的主阵地，同中国争夺影响力；三是打造主导地区秩序的新支点，重塑美日的优势地位。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对手、中国对东盟影响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上述三大诉求可归结为一点：“竞赢中国”。<sup>[3]</sup>

## （二）资源工具互补性

从美日各自的外交布局看，源于地缘远近、经贸权重等因素，日本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更高、投入更大，美国倾向于将东南亚作为其亚太布局的一环，总体关注度和战略投入有限。尽管近年来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提升了对东盟的关注，但仍表现出政策缺乏连贯一致性、实际投入不足等短板。从美日对东盟的实际影响看，美国作为东南亚尤其是海上东盟国家安全资产的主要提供者，对东南亚安全事务的影响更大；日本则基于长期以来对东南亚的政府开发援助和投资布局，在经济、社会和民生领域影响较为突出。美日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一定优势互补，构成双方联手拓展的重要驱动力。

---

[1] “US-Japan Relations and Southeast Asia: Meeting Regional Demands,” East-West Center & The Sasagawa Peace Foundation, 2016, [https://www.spf.org/en/global-data/user19/US-Japan\\_and\\_SEA.pdf](https://www.spf.org/en/global-data/user19/US-Japan_and_SEA.pdf).

[2] 「日米首脳共同声明」，外務省，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02832.pdf>；「日米首脳共同声明」，外務省，2022年5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254.pdf>。

[3] 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多次提及“竞赢”一词，将“赢得名同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

一是在对东盟合作的机制方面，美国可以借用日本相对完备成熟的机制平台。日本与东盟“10+1”合作机制运作多年，从首脑峰会到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较为密切。此外，日本早在1981年就已成立旨在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和观光的“日本东盟中心”，2006年设立“日本东盟统合基金”（JAIF），<sup>[1]</sup>用于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2008年与东盟缔结“全面经济伙伴协议”（AJCEP）。相较之下，美国专门针对东盟的机制化安排较少，虽然设有美国—东盟峰会机制及驻东盟代表团，但缺乏常设性合作机构平台和专项基金支持，美国与东盟迄今亦未签署自贸协定。

二是安全上日本需要倚重美国影响“借船出海”。美国依托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盟友伙伴，在地区保持军力存在，以“保障重要航道安全”等名义为东南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对海上东盟国家形成较强安全影响。在中国全面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东盟从“大国平衡”立场出发，需要美国从安全上平衡对冲中国的地缘影响。新加坡外交部前常务秘书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就称，在中美对立的背景下，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美军的存在对于地区稳定不可或缺。<sup>[2]</sup>日本强化同东南亚的安全合作，包括介入南海等热点问题，主要依托美国既有的安全架构和军事存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日对东南亚的合作呈现互补性。如日本为维护海上贸易通道安全，20世纪末以来多渠道、多层次介入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与海峡三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建立密切的合作机制，为美日联手强化地区的安全影响提供新平台。再如在网络安全领域，美国向日本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东盟网络安全能力构筑中心”提供培训教材，成为双方互补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

三是美日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发展程度有别，美国对日本有所借重。日本与东盟各国关系发展较为均衡，东南亚民众普遍对日抱有好感。而美国与东

---

[1] 「日・ASEAN 統合基金」，外務省，2023年4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j\\_asean/jaif.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j_asean/jaif.html)。日本通过“日本东盟统合基金”（JAIF）已对东盟国家提供8.6亿美元，实施了560多个项目。

[2] 「ピラハリ・カウシカン：対中外交の基盤となる米軍プレゼンス」，『外交』，2022年11—12月。

盟国家的关系呈现等级化特点，亲疏有别：第一层级为条约盟友即菲律宾和泰国，以及安全合作伙伴新加坡；第二层级为重点拉拢和特别关注的国家，包括印尼、越南和马来西亚；第三层级是关注较少或关系相对疏远的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文莱和缅甸。近年来，美国有意借重日本在东南亚深耕多年形成的政治人脉、经济基础和社会人文纽带，来补齐影响力短板。如 2022 年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 (Danny Fenster) 在缅甸被拘捕后，日本通过人脉渠道帮助美方斡旋，促使缅甸军方释放了该名记者。<sup>[1]</sup>

四是美日对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侧重点不同。东南亚聚集了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美日官方发展援助和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在对外援助方面，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东南亚一直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ODA) 的主要目的地。2021 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前十位对象国中，东南亚国家占了 5 席，<sup>[2]</sup> 受援金额超过 36 亿美元。<sup>[3]</sup> 美国对东南亚的援助规模总体较小，菲律宾、越南、印尼、柬埔寨、老挝位列 2021 年美国对东南亚援助的前五位，总金额仅为 4.8 亿美元。<sup>[4]</sup> 对比美日对东南亚的官方援助，日本援助集中在社会民生领域，重视扎根基层和能力培养；美国援助则有较重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色彩，除人道主义援助外，倾向用于推动“民主化”和“良治”。投资方面，截至 2019 年，美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累计达 3290 亿美元，高于美国在中日韩和印度的投资总和。2021 年，美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达到 400 亿美元。<sup>[5]</sup> 美国对东南亚投资呈现跨国公司主导、金融保险业等非制造业占比高的特点。2021 年，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 58%，达到 3.1

---

[1] “U.S. Government Sought Help of Sasakawa in Fenster Release,” November 19, 2021, Mizzima, <https://mizzima.com/article/us-government-sought-help-sasakawa-fenster-release>.

[2] 位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前十位的东南亚国家为菲律宾、印尼、柬埔寨、越南、缅甸，分列第 3、4、5、7、8 位。

[3] 「OECD/DAC における ODA 実績」，外務省，2023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html>。

[4] “Aid (ODA) Disbursements to Countries and Regions,”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ABLE2A>.

[5] ASEAN Stats Data Portal, July 31, 2023, <https://data.aseanstats.org/fdi-by-hosts-and-sources>.

万亿日元，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达到 19.1%。<sup>[1]</sup> 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中制造业占比较高，主要集中于汽车、电子、纺织等领域。

### （三）手段协同性

在推进“印太”战略这一共同目标驱动下，美日对东南亚外交正从各自为战转向有意识地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强化联动配合。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由上到下的战略引领、政策对接、资源共享、协同行动的特点。

在战略层面，美日把对东盟的合作纳入“印太”框架中，通过与《东盟印太展望》形成对接，以扩大同东盟的战略契合点。2021年1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解密版“印太战略框架”文件明确指出，东盟中心地位是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目标的核心要件。美国应积极提升东南亚国家和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地位，深化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同时鼓励日本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sup>[2]</sup> 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称，美国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将同东盟深化长期合作，并将“加强同东盟关系”置于十项重点工作中的第四项。日本自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构想时，就将东盟置于联通“两个大陆、两个大洋”的关键位置，提出重视东盟的中心地位，提升东盟的互联互通水平，推进高质量基建、贸易投资、完善营商环境和人才培养。<sup>[3]</sup> 2023年3月岸田文雄内阁发表“自由开放的印太”新方案，提出扩充“自由开放的印太”合作的四大支柱，其中与东盟的合作被重点提及，并重申双方将以2020年日本—东盟峰会联合声明为指引，围绕《东盟印太展望》框架下的行动计划推进务实合作。<sup>[4]</sup>

---

[1] 「2021年の日本の対ASEAN直接投資、前年比58%増の3兆1,000億円」，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2年2月10日，<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2/02/59fd96f21af8e4fc.html>。

[2]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p.9, <https://sgp.fas.org/news/2021/01/indopac-framework.pdf>。

[3]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外務省，2023年6月1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30631.pdf>。

[4]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ための新たなプラン」，外務省，2023年6月1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77659.pdf>。

在政策层面，美日通过首脑会晤、外长防长“2+2”磋商、经济版“2+2”等机制，强化双边对外合作的政治引领，凝聚合作共识，明确各领域的合作指针。美日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及“美日竞争力和韧性（CoRe）伙伴关系”文件明确了新时期美日合作的重点领域和目标方向，构成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的政策指引。在实务层面，美日通过2022年6月启动的东南亚战略对话机制，加强了对东南亚的专项政策协调对表。

在行动层面，美日利用两国共同参与的各种多边倡议和对话合作平台，运用对外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等资源手段，相互策应配合，努力扩大对东盟的政治安全影响，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机制平台包括美日主导的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区域多边架构，以及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等机制。

## 二、“印太”对接：合作机制与重点领域

美日联手介入东南亚，注重在“印太”概念下与东盟的对接，从机制安排到功能性合作，都凸显出将东盟纳入美日“印太”布局的考量。

### （一）机制安排

美日联手介入东南亚主要依托美日主导的“印太”合作平台和美国亚太同盟架构，有关机制性安排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印太”战略框架下对东南亚合作。美日依托其主导的“四边机制”和“印太经济框架”两大机制，着力围绕海上安全、经贸、供应链、基础设施等议题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互动。

“四边机制”既是美日协调推进“印太”战略的核心抓手，也是美日联手推动对东南亚合作的重要平台。随着美日“印太”战略不断加速推进，“四边机制”不断走深走实，这一度引发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忧。东南亚国家担心



该机制会加剧大国竞争，冲击东盟中心地位。<sup>[1]</sup> 新冠疫情暴发后，疫苗援助为美日拓展与东盟国家合作，降低东盟对“四边机制”的戒心提供了机会。2021年3月，“四边机制”峰会宣布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的“疫苗伙伴关系计划”，其中美日两国负责最为关键的疫苗产能。<sup>[2]</sup> 东盟逐渐将“四边机制”视作巩固美国与东盟地区合作承诺的纽带。<sup>[3]</sup>

以疫苗生产供应为起点，美日在“四边机制”框架下不断拓展功能性合作抓手，积极开展与东南亚国家在人道主义救助与减灾、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2021年3月，美日印澳宣布启动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组。同年5月，日本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救灾技术培训和价值110万美元的救灾工具。“四边机制”在上述领域合作的展开逐渐得到东南亚国家正面响应。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2022年发布的《东南亚地区态势》民调结果显示，58.5%的受访者支持“四边机制”在疫苗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合作。<sup>[4]</sup> 2022年5月17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发布联合愿景声明，强调欢迎东盟伙伴国家通过“四边机制”疫苗伙伴关系等机制支持东盟。<sup>[5]</sup> “四边机制”还将对东盟合作扩大到海上安全领域。2022年5月，美日印澳在东京峰会上正式宣布“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计划，明确四方将通过实施五年行动计划，以打击“非法捕捞”等名义协助东南亚伙伴强化海域感知能力，提升地区国家对“暗船”等海上活动的监测水平，应对气候和人道主义极端事件，保护渔业资源，并提及加强对新加坡信息融合中心建

---

[1] “Southeast Asians’ View of Quad and AUKUS: Some Thaw, But Not Yet Warm,” Fulcrum, February 23, 2023, <https://fulcrum.sg/southeast-asians-view-of-Quad-and-aucus-some-thaw-but-not-yet-warm/>.

[2] 《四方安全对话，美日澳印各有盘算》，《联合早报》2021年3月16日，<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210316-1131674>。

[3] “The Quad and ASEAN — Where to Next?,” East Asia Forum, June 25, 2022, <https://www.castasiaforum.org/2022/06/25/the-Quad-and-asean-where-to-next/>.

[4]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2 Survey Report,”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February 2022,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2/The-State-of-SEA-2022\\_FA\\_Digital\\_FINAL.pdf](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2/The-State-of-SEA-2022_FA_Digital_FINAL.pdf).

[5] The White House, “ASEAN-U.S. Special Summit 202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May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3/asean-u-s-special-summit-2022-joint-vision-statement/>.

设的支持。<sup>[1]</sup>

经济领域，美国在日本积极协助下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力图补齐在东南亚的经济短板。美国东南亚战略一直存在“重安全、轻经济”的问题。<sup>[2]</sup>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拾“多边主义”旗号，但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牵扯，美国难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弥补这一缺陷，拜登政府酝酿出台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并把东盟国家作为重要争取对象，日本则为此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印太经济框架”酝酿之初，由于对美国战略意图和兑现承诺能力心存疑虑，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参与“印太经济框架”持观望态度。<sup>[3]</sup>为鼓励东盟国家参与“印太经济框架”，日本积极居中协调，一面劝说美国淡化“针对中国”的色彩，降低加入门槛，一面着力推动东盟国家和印度加入。<sup>[4]</sup>2022年5月，美国出台包含“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韧性供应链、绿色能源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的“印太经济框架”，最终有7个东盟国家加入框架，并参加全部4个支柱的谈判。

二是“美日+X”形式的小多边合作。拜登政府以美日同盟为支撑，加速推动美国亚太盟伴体系向网络化、圈层嵌套方向转型，东南亚成为美日拓展“小多边”同盟网络的重要方向。首先，美日积极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协调推动与湄公河国家功能性合作向纵深发展。2019年，美日与湄公河国家启动“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UMPP）。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与有关方围绕促进湄公河国家电力行业发展、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区域电力贸易机制建设等议题举行了四次会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称，JUMPP启动之后，美日两国扩大了与湄公河国家的伙伴关系，支持建设更具竞争力、更加紧密

---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

[2] “Lack of an Economic Strategy Is Hurting US in Southeast Asia,” Nikkei Asia, August 5, 2021,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Lack-of-an-economic-strategy-is-hurting-US-in-Southeast-Asia>.

[3] 《考虑到与中国经济关系，不少东南亚国家对加入 IPEF 观望》，联合早报网，2022年5月17日，<https://www.zaobao.com.sg/news/sea/story20220517-1273370>。

[4] 「IPEFは何を指すの?」，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2月6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68215320W3A200C2EAC000/>。

联系的电力市场与基础设施。拜登政府承诺将请求美国国会拨款 2000 万美元，支持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输送、清洁能源一体化、脱碳及能源韧性建设。<sup>[1]</sup>2023 年 4 月，美日发布“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行动计划”。<sup>[2]</sup>根据该计划，美日将围绕清洁能源整合、市场开发与投资和地区电力交易三大支柱，通过组织培训项目、圆桌会联合研究等形式在浮动光伏发电、电力池开发、妇女参与等领域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sup>[3]</sup>

其次，随着美菲同盟关系重新拉紧和日本参与其中，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机制逐步成型。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上台后与美日互动频繁。2022 年 5 月，美菲军方签署海上安全框架协议，意在提升美菲海上力量互操作性。同年 9 月，美日菲首次三边防务政策对话会举行。三方确定了包括海上安全、海域感知、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人道主义救援与灾害响应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并建立定期会晤机制。<sup>[4]</sup>同年 12 月，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降落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属二战后首次。2023 年 2 月，马科斯访问日本期间，日菲就尽早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共识。此外，美日菲还拟建立三边部长级对话框架，提高三边合作机制化程度。<sup>[5]</sup>2023 年 5 月，马科斯访问美国期间，美菲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建立美日菲、美澳菲三边合作模式。<sup>[6]</sup>除构筑三边合作框架，借

---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nounces New U.S. Support for Clean Energy in the Mekong Region,” November 1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9/fact-sheet-vice-president-harris-announces-new-u-s-support-for-clean-energy-in-the-mekong-region/>.

[2] 「日米メコン電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JUMPP）アクションプランの公表」，外務省，2023 年 4 月 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1408.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1408.html)。

[3] “Japan-US-Mekong Power Partnership(JUMPP) Action Plan, Mekong-US Partnership,” April 2023, <https://mekonguspartner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JUMPP-Action-Plan-Final-April-2023-Web-3.pdf>.

[4]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Japan-Philippines-U.S. Trilateral Defense Policy Dialogue (TDPD),”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mod.go.jp/en/images/20220915a.pdf>.

[5] “Japan, Philippines and U.S. to Set Up Three-Way Security Framework,” The Japan Times, March 28, 2023,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3/03/28/national/philippines-japan-us-security-framework/>.

[6]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May 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01/joint-statement-of-the-leaders-of-the-united-states-and-the-philippines/>.

重启南海联合巡航之机，美日菲还谋求拉拢澳大利亚加入，将三边合作向四边扩展。

三是美日在东南亚的第三方合作。美日将“美日+1”合作模式作为深化同盟关系、联手拓展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鼓励日本强化与东南亚防务安全合作，将现有“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2+2”机制）向东南亚方向进行复制拓展，从而与美国在东南亚既有的双边安全合作架构形成融合互补。继与印尼建立“2+2”磋商机制后，2022年4月，日本与菲律宾举行首次外长防长“2+2”磋商。2023年4月，美菲时隔7年重启“2+2”对话机制。具体合作上，随着美日同盟进攻性的提升，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开展防务合作的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日本谋求实现对东南亚防卫装备出口和防务技术转移。2021至2022年，日本相继与印尼、越南和泰国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与日本签署该协议的东南亚国家增加至5个。2023年1月，美日“2+2”磋商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将通过开展联合训练、能力建设、防卫装备转移等方式，继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sup>[1]</sup>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基于日本提出的“人的安全保障”理念，美日联手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在打击泰国人口贩卖、菲律宾棉兰老岛和平进程、台风灾害救援中发挥了作用。<sup>[2]</sup>在经济领域，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接连冲击、美国加速推动对华“脱钩断链”背景下，2022年7月，美日启动“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即“经济版2+2”，着力布局关键产供应链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双方以“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为基本框架，通过“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议”“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等机制，针对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的需求，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合作。

---

[1]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Japan, January 11, 2023, <https://jp.usembassy.gov/joint-statement-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plus2/>.

[2] 信田智人：『日米同盟と東南アジア — 伝統的安全保障を超えて』，千倉書房，2018年5月。

## （二）合作重点

在具体合作领域上，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注重契合东盟的政策方向，并发挥自身所长，其合作布局呈现出以下两条路径。

一是围绕《东盟印太展望》四大领域的合作。除了借助两国共同主导的机制，美日还加快“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对接融合。首先，美日积极提升与东盟关系水平。日本与东盟拟于2023年12月纪念合作关系50周年之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sup>[1]</sup>美日将与东盟开展功能性合作视为强化与地区盟友伙伴协调，推动落实“印太”战略的契机。借助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平台，美日积极强化与东盟国家政策沟通。2022年11月柬埔寨主办东盟系列峰会期间，美日与韩国等地区盟友伙伴国家密集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议。美日韩三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在“印太”地区共同加强威慑能力，捍卫“航行与飞越自由”，同时承诺将与地区伙伴加强合作，支持落实《东盟印太展望》。<sup>[2]</sup>

其次，美日积极谋求融入东盟制度平台，参与围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功能性合作。美日围绕《东盟印太展望》中的四大支柱——海上合作、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经济与其他领域，分别与东盟制定相应合作计划，在缩小发展差距、互联互通、智慧城市、贸易便利化等方面，支持东盟共同体2025年愿景目标的实现。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美国与东盟通过联合合作委员会等定期机制，继续推动落实“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目前日本与东盟围绕《东盟印太展望》的合作走在了美国前面，已有89个合作项目正在推进之中，涵盖互联互通、海洋环境治理、人文交往等广泛领域。在2023年3月公布的“为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的新方案”中，岸田政府提出要继续顺应《东盟印太展望》中提出的优先领域，与东盟

---

[1] “Japan, ASEAN to Upgrade Ties in December amid Growing China, US Clout,” Kyodo News, March 7, 2023, <http://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3/03/7e259ed12b8b-japan-asean-to-upgrade-ties-in-dec-amid-growing-china-us-clout.html>.

[2] The White House,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U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Pacific,”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phnom-penh-statement-on-trilateral-partnership-for-the-indo-pacific/>.

各国本着共创精神推进合作。

二是安全合作。美日依托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上东盟国家，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推动多层次、复合型的海上安全合作。具体行动上，以南海问题和非传统安全议题为抓手，联手提升与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互操作性。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解除了日本自卫队的地理活动范围限制，首次正式提出“保障南海航行安全”。2016年，美日在南海地区启动联合巡航。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日对南海地区军事安全介入力度进一步加大。2021和2022年美国与域外国家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开展演习数量分别多达75和69场，其中日本两年中各参演61场，参演次数在域外国家中均列第一。<sup>[1]</sup>2021年11月，由日本主导、美日海上力量为主角的“年度演习-2021”（ANNUALEX 2021）在菲律宾海海域举行。美日两国派出了“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等主力舰艇参加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开展了首次联合反潜训练。<sup>[2]</sup>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日将打击海盗、非法捕捞等合作作为加强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抓手。日本发挥其在马六甲海峡安全机制中的影响，通过其主导的《亚洲地区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合作协定》等多边机制，以信息共享、联合研究、能力建设等方式对海上东盟国家施加影响，未来可能拉美国入局，联手强化对地区重要航道的掌控力。

### 三、影响限度：利益分歧、制度冲突与安全困境

随着美日在对东南亚外交中的协调增多，其联手拓展正由松散自发行动

---

[1] 《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2022年3月，第21页，[http://www.scsp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21nian\\_mei\\_jun\\_nan\\_hai\\_jun\\_shi\\_xing\\_dong\\_bu\\_wan\\_quan\\_bao\\_gao.pdf](http://www.scsp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21nian_mei_jun_nan_hai_jun_shi_xing_dong_bu_wan_quan_bao_gao.pdf)；《2022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2023年3月，[http://www.scsp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22nian\\_mei\\_jun\\_nan\\_hai\\_jun\\_shi\\_xing\\_dong\\_bu\\_wan\\_quan\\_bao\\_gao.pdf](http://www.scsp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22nian_mei_jun_nan_hai_jun_shi_xing_dong_bu_wan_quan_bao_gao.pdf)。

[2] Commander of U.S. 7th Fleet,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Japan and the U.S. Join for ANNUALEX 2021,” November 21, 2021, <https://www.c7f.navy.mil/Media/News/Display/Article/2849963/australia-canada-germany-japan-and-the-us-join-for-annualex-2021/>.



走向加速协同推进，未来将加强自上至下的战略引领、政策对接、资源共享、协同行动，谋求达到“竞赢中国”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面临诸多掣肘，包括美国、日本、东盟三方利益诉求不同，美日与东盟地区秩序观差异，以及美日排他性、对抗性政策措施引发地区安全困境和分裂风险，这些因素将影响其联手拓展的成效。

### （一）战略缺失与投入不足

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的成效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投入，但当前美国受制于国内矛盾以及全球其他方向的精力牵扯，对东盟的实质性投入有限。尽管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提升了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但依然缺乏对东南亚专门战略谋划和全方位布局。有日本学者指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东南亚的政策信号是混乱的，在价值观、对华态度、多边主义等诸多方面的态度自相矛盾。<sup>[1]</sup> 2022年5月，美国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到华盛顿参加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最终仅宣布向东盟投资1.5亿美元，用于加强东南亚清洁能源、海上安全和抗击新冠疫情等领域，此举令东盟国家感到失望。<sup>[2]</sup>

从执行层面看，美日对东南亚投入依然缺乏战略层面的统筹协调。古贺庆(Kei Koga)认为，美国和日本在其“印太”框架内都缺乏对东盟战略定位的清晰愿景。尽管美日在外交姿态上表达了对东盟的支持，但两国间缺乏一套明确的协同战略，难以有效赋能东盟。<sup>[3]</sup> 从美日与东南亚的官方合作清单来看，合作项目多侧重于人员培训等能力建设、技术标准制定等领域，虚大于实。在互联互通等基建领域缺乏大手笔项目，突出体现了美日想“花小钱办大事”的功利取向。美国通过七国集团(G7)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及后续“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倡议旨在抗衡中国“一

---

[1] 庄司智孝，「東南アジアとバイデン政権のアメリカ期待から困惑へ」，笹川平和財団，2022年7月28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shoji\\_19.html](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shoji_19.html)。

[2] 《美国承诺投资1.5亿美元，但东盟不会“选边站”》，观察者网，2022年5月13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2\\_05\\_13\\_639594.shtml](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2_05_13_639594.shtml)。

[3] Kei Koga, “Recalibrating U.S.-Japan Indo-Pacific Strategies Towards ASEAN,” October 202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2022-10-Recalibrating-ASEAN\\_Koga.pdf](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2022-10-Recalibrating-ASEAN_Koga.pdf)。

带一路”倡议，目前看“雷声大雨点小”，落实前景并不被看好。日本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QI）在东南亚同中国展开激烈基建竞争，但仍远逊于中国，尤其是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竞争中落败对其打击较大。

在安全领域，美日联手强化地区军事安全影响亦受制于美国军力全球部署和日本“战后体制”的束缚。美国在菲律宾虽有9处军事基地，但尚无永久驻军，其向菲派驻海军陆战队濒海战斗团的计划引发强烈争议。日本岸田内阁2022年底通过“安保三文件”后，谋求通过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新设对外军事援助制度，强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影响，但受到“和平宪法”及内外民意等制约，有关动向仍将是长期渐进过程。

## （二）利益分歧和目标错位

美日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涉及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不可避免存在立场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的分歧：一是美日双方对东盟的利益诉求有差异。首先是美日“印太”战略本身存在微妙差异。新加坡学者陈思诚（See Seng Tan）指出，日本倾向于将印太视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帮助日本拓展自身影响力的平台，而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排他性更为明显。双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太”的理解仍存有一定偏差。<sup>[1]</sup>其次，美日对东南亚的政策取向存在微妙温差。美国对东盟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更重，日本则更看重现实利益。如2021年2月缅甸政局突变后，美国对缅甸军方强化制裁并积极扶持反对派，而日本则为了维持在缅传统经济利益与影响力，并未与缅军方断绝联系。随着缅甸政治僵局长期化，日本对缅政策恐面临美方压力，日在缅利益因此受损可能引发美日嫌隙。

二是东盟内部对美日态度存在温差。如前所述，美国对东盟国家亲疏有别，陆上东盟和海上东盟国家对美心态和政策取向存在明显温差。在涉华议题上，东盟内部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菲律宾、越南等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出于借重美日平衡中国影响的考虑，欢迎美日介入地区

---

[1] See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pp.131-148.

事务；另一方面，多数国家主张东盟应避免成为中美对抗的棋子，对美日的迎合要保持适当距离，在中美间努力把握平衡。在美日和中国之间，东盟各国立场的最大公约数依然是奉行“大国平衡”政策，在欢迎美日参与地区事务的同时，对美日在地区推动遏华排华指向的大国竞争亦保持警惕。尤其是随着台海局势趋于紧张，美日推行“以台制华”战略，谋求通过美日菲防务合作为介入台海做准备，引发东南亚国家对台海冲突殃及自身的普遍担忧。未来如台海局势外溢冲击地区稳定，可能引发东盟内部分歧及对美日的不满情绪。

三是美日同盟与东盟之间的目标错位。美日同盟推动“印太”战略本质上谋求的是对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以“抗衡中国”为导向，而东盟的目标则在于维持其中心地位，基本立场是在大国竞争中不选边站队。一旦美日对东盟的合作交往过于突出遏华指向和争夺地区主导权，都会引发东盟不适，进而制约美日与东盟合作成效。2021年以来，随着中美围绕涉台问题及高科技领域的矛盾对立加剧，日本积极配合美国遏华导致中日对立，东盟对中美、中日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日渐担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多次就中美关系公开发出警告，呼吁两国防止冲突。在2023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公开表示，日本能为亚洲稳定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sup>[1]</sup>

### （三）观念差异和制度冲突

美日同盟与东盟分别代表着联盟模式和共同体模式这两种东亚多边合作方式和秩序形态，<sup>[2]</sup>制度属性不同。前者通过对行为体的区别与选择实现，后者通过对不同行为体的联结与统合实现。美日同盟的排异性和东盟的多元包容性使两者间存在天然矛盾。

---

[1] 《黄永宏：为亚细安稳定 日本首要与最大任务是改善与中国关系》，联合早报网，2023年6月4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230604-1401144>。

[2] 苗吉、李福建：《美日同盟与东盟：亚太秩序大较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2期，第40页。

在价值观层面，美日同盟与东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美日宣扬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东亚推崇的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之别。尤其对美国而言，对东南亚外交始终夹杂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冲动。马凯硕指出，东盟帮助建立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和包容文化的合作性地区秩序。这一秩序弥合了本地区重大政治分歧，使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专注于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美国不应对各国的政治体制指手画脚。拜登决定将世界政治框定为“民主国家对抗专制国家”是一个错误。<sup>[1]</sup>

在制度层面，美日“印太”战略本质上是谋求地区秩序主导权，其表面宣称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实质上是将东盟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工具，在价值观导向、机制建构、议程设置上难以真正将东盟置于中心位置，与东盟的地区合作制度存在天然矛盾。美日在地区推动的“四边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等架构实际上都是“非东盟化”安排，与其“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表态自相矛盾。<sup>[2]</sup>

在区域一体化架构层面，美日与东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美日主导的菜单式、模块化的“印太经济框架”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等为基础的秩序之争。一方面，“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前景不明，短期内难成亚太地区主导性经济合作架构。而随着中国和韩国申请加入日本和东盟国家为主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来区域经贸合作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两轮驱动的态势将更趋明确，美国置身其外将持续制约其对东盟的经济影响。另一方面，美日出于“去风险化”目标推出的区域合作方案排华指向突出，与东盟所倡导的包容开放的合作方式形

---

[1] Kishore Mahbubani, "Asia's Third Way, How ASEAN Survives—and Thrives—Ami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southeast-asia/asias-third-way-asean-amid-great-power-competition>.

[2] Kei Koga, "Recalibrating U.S.-Japan Indo-Pacific Strategies Towards ASEAN," October 202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2022-10\\_Recalibrating-ASEAN\\_Koga.pdf](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2022-10_Recalibrating-ASEAN_Koga.pdf).

成冲突。且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利益深度融合，美日对东盟合作中如一味寻求“挤出”中国，恐难获东盟国家积极配合。

#### （四）安全困境和分裂风险

尽管美日同盟在对东南亚合作中淡化军事色彩，但美日联手介入南海的动作以及美国同盟体系在东南亚周边的布局，事实上正在催生地区安全困境，增大对抗分裂风险。东盟缺乏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各成员国难以依靠集体防御谋求共同安全，现实中各成员国的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不同，通过奉行大国平衡政策，扮演大国对抗缓冲地带角色，成为东盟各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包容性安全对话机制的初衷所在。从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背后的地缘战略意图看，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至少面临三方面风险挑战。

一是美国整合“印太”同盟体系带来的阵营对抗和地区分裂风险。美日主导的“四边机制”及美日菲、美日澳等小多边安全机制均在东南亚周边重点布局，突出遏华指向和阵营对抗色彩。美日同东南亚国家的高层交往和交流合作中贯穿着牵制中俄的全球战略考量，竭力宣介“民主对威权”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叙事，诱压东盟国家就“维护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国际秩序”“反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等论调与其达成共识，不仅增大了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客观上会对东盟中心地位和大国平衡战略构成挑战。

二是美日挑动南海和台海矛盾加剧地区分裂风险。美日着眼军事介入南海甚至台海，着力强化同海上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积极协助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争端中对抗中国，在涉台问题上煽动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焦虑，借机与菲律宾重新拉紧军事同盟，事实上将东盟裹挟进地缘矛盾之中，增大地区对抗冲突风险。美日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对海上东盟和陆上东盟分而治之的做法，是对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消解，会对东盟内部团结造成干扰。

三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带来的核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AUKUS围绕核动力潜艇的合作，业已引发一些东盟国家的警惕和反对。一方面，AUKUS 因其排他性小多边合作性质，与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形成多边

主义规范竞争，冲击东盟国家维护自身及集体生存的重要规范保障。<sup>[1]</sup> 另一方面，AUKUS 主打的核潜艇技术转让恐将打破地区的军力平衡，在亚太地区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进而可能阻断东盟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sup>[2]</sup> 在美国推动 AUKUS 扩员背景下，未来如果日菲参与 AUKUS 框架下的合作，东盟内部团结或将受到一定冲击。

#### 四、结语

美日联手拓展东南亚正从无计划的配合联动向有意识的战略协同转变，以增强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经、安全和人文影响。美国借重日本在东南亚长期深耕积累形成的经济、人文优势，加强对地区全方位介入和基层渗透；日本则借助美国军事影响，补齐对东南亚外交的安全短板。虽然美日联手在东南亚的拓展取得了一些实效，但由于彼此在价值观念、制度安排、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东盟实施“大国平衡”策略不会全面倒向美日，美日对东南亚的影响程度仍将严重受制于其投入力度和政策指向的局限性。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邻近，经贸和人文联系紧密，具有美日同盟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加大资源投入，着力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战略自主，与东盟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责任编辑：姜志达】

---

[1] 薛亮、郑先武：《东盟国家对 AUKUS 的认知与反应》，《国际展望》2023 年第 2 期，第 64-65 页。

[2] 《驻东盟大使邓锡军：AUKUS 将给本地区带来五大危害》，澎湃新闻号，2021 年 11 月 25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5266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52663)；陈相秒：《AUKUS 联盟对东盟的三大考验》，中国日报网，2021 年 9 月 27 日，<https://column.chinadaily.com.cn/a/202109/27/WS61516b7fa3107be4979f002e.html>。



#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sup>\*</sup>

□ 朱海燕

〔提 要〕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关键词〕日本、北约、战略协调、亚太安全

〔作者简介〕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5 期 0117-21

2023年7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北约峰会，与北约签署升级版的合

<sup>\*</sup> 本文为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俄罗斯的中亚政策”（项目号：22FGJB024）、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大项目”（项目号：2022ZYRZ05）、2023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及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号：23ZYB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文件，即《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the 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me: 2023-2026, 以下简称 ITPP)，标志着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提质升级。在世界大变局深度演进背景下，北约不断推进“亚太化”进程，而日本则积极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这促使双方安全战略协调与互动日趋活跃。日本与北约的战略互动是大变局深度演进的产物，将对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演进产生深远影响，双方以中国为指向的安全战略互动也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深入分析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一、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

日本与北约同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盟伴体系的重要构件，双方在冷战期间即有所接触，但并未形成规律性、实质性互动，双方的对话仅停留在就个别事件进行临时性、偶发性沟通层面。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追求“大国化”的日本与不断“亚太化”的北约取得战略关系的突破性进展，逐渐在高级别政治安全层面建立起规范性、制度化的关系互动框架，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进程不断深化。

### (一) 政治关系升级至最高级别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接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中导 (INF) 问题的讨论，但冷战期间双方的政治接触仅限于偶发性、临时性安排。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日本与北约的政治安全关系有所提升，外交往来密度不断加大。2006 年，麻生太郎作为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北约总部，称“日本重新发现了北约的重要性……日本将探讨在宪法框架内与北约合作的最合适方法”<sup>[1]</sup>。2007 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约理事会并发表演讲，称“日

---

[1] 「麻生大臣の NATO 訪問」、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2006 年 5 月 4 日、<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exdfam/20060504.S1J.html>。

本和北约应该向合作新阶段过渡”<sup>[1]</sup>，这是日本政府首脑首次出席北约决策机构的会议。2013年4月，日本与北约签署《联合政治宣言》，称“日本和北约间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和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sup>[2]</sup>，双方将推进在反恐、网络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这使日本—北约政治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成为可能。2018年7月，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运行，这是日本在北约总部设立的首个官方机构，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将提升与北约政治安全关系的强烈政治信号，该机构进一步推动双方政治关系升级。

乌克兰危机升级成为驱动日本—北约关系突进的重要契机，日本与北约以维护所谓“以规则（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借口，构建起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关系。2022年4月和6月，日本外相林芳正与首相岸田文雄先后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和北约首脑峰会。岸田表示，日本将大幅提升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并以“欧洲的安全与亚洲安全密不可分”为噱头，期待北约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sup>[3]</sup>2022年5月，山崎幸二统合幕僚长作为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北约参谋长会议。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应邀访日，宣称“由于难以预测的乌克兰及‘印太’地区局势，为进一步维护与强化‘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一致确认将提升合作层级”<sup>[4]</sup>，并探讨了日本定期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的可能性等。为彰显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日本航空自卫队入间军事基地，并进入作为主力机型的F-2战斗机驾驶舱。2023年4月和7月，林芳正与岸田再次先后受邀参加北约外长与首脑会议，岸田作为日本首相首

---

[1] 安倍晋三、「日本とNATO: 更なる協力に向けて」（仮訳）、外務省、2007年1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112.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112.html)。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oint Political Decla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pril 13, 201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99562.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99562.htm)。

[3] 「岸田総理大臣のNATO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2年6月2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

[4] 「岸田総理とストルテンベルグ NATO事務総長との会談」、外務省、2023年1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6\\_000806.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6_000806.html)。

次在北约首脑峰会发言，进一步彰显了“没有任何其他伙伴比日本更接近北约”<sup>[1]</sup>的定位，对外宣示日本与北约密切的政治关系，也预示着基本形成日本“常态化”参加北约外长、首脑会议的新关系框架。

## （二）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对话关系始于1990年6月在比利时举行的第一次“日本—北约安全会议”，同时启动的对话机制还包括“日本—北约高级别磋商”及“日本—北约安全研讨会”，基于此，北约将日本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以外“与北约接触的最资深的国家”。<sup>[2]</sup>

在不断扩大的合作实践及深化合作的需求推动下，2004年北约将日本纳入“接触国”行列，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正式开启制度化合作进程。2010年，日本与北约签署《情报保护协定》，这是继2007年日美《情报保护协定》后日本签署的第二个此类协定。2014年，双方签署《日本—北约国别伙伴合作计划》（Individua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 between Japan and NATO，以下简称IPCP），为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具体内容、方式等规划了行动路线图，引导日本逐渐融入北约主导的军事安全行动。至此，日本与北约间的安全合作摆脱了事务性、临时性合作模式，步入机制化运行轨道，也标志着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由“具体事务”合作进入以应对“假想威胁”为目标的合作框架，打通了双方未来继续拓展合作领域的通道。同年，日本向北约总部派遣女性自卫官，这是日本首次向北约派遣自卫官，开启了双方在安全领域进行“人的合作”进程。其后，2018年、2020年双方对“合作计划”进行了修订。2022年4月，双方提出将IPCP提升为ITPP。2023年7月，日本与北约正式签署ITPP（2023~2026）。文件规定，双方将提升军事安全力量间的互操作性与互适用性、提高联合演

---

[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mark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Fumio Kishida,” July 12,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7083.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7083.htm).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Opening Statement by Secretary General Jaap de Scheffer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with H. E. Mr Taro As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y 4, 2006, <https://www.nato.int/docu/speech/2006/s060504a.htm>.

练频率、强化情报信息与经验合作、加强在无人机武器研发和使用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这为双方未来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与政治法律保障。2023年1月，日本与北约探讨在东京设立联络办事处的可能性及相应程序。根据规划，该办事处将作为北约在亚洲的联络机构，日本负责收集亚太地区的军事信息等与北约共享。此外，日本2023财年还制定了向北约派驻专门的外交使团、常态化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等计划，以拓展和充实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关系。

### （三）非传统安全合作由虚向实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与北约间的安全关系停留在口头交换意见的“务虚”层面。“9·11”事件开启了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由虚到实的转变。此后，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关系又以网络及新兴技术等领域为重点，获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1月，日本提出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以下简称CCDCOE）的设想。2019年3月起，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员以研究员等身份参加CCDCOE的活动。同年10月，日本与北约建立“网络防御相关职员会谈”机制，围绕网络安全议题进行情报共享和意见交换，探讨“基于共享的价值观的网络防御通用方法”。<sup>[1]</sup>2021年，日本防卫省、内阁网络安全中心、警察厅、民间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等网络安全相关部门组队参加北约“锁盾”演习，并成为演习的正式成员。2022年11月，日本正式加入CCDCOE，成为继韩国之后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2023年4月，日本作为成员国，派出防卫省内部部局、联合参谋部、陆上自卫队系统通信团、海上自卫队系统通信队群、航空自卫队作战系统运用队、航空自卫队航空系统通信队、自卫队网络防御队、内阁网络安全中心、总务省、警察厅、信息处理推进机构、日本计算机应急小组协调中心、重要基础设施运营商等网络安全相关部门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全程、全域参加CCDCOE网络安全联合防卫演习，展示了日本积极推进与北

---

[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and Japan Intensify Dialogue on Cyber Defence,” October 9,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69493.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69493.htm).

约在网络安全领域深度合作的政治意愿。在国内体制建设方面，日本将加速构筑主动网络防御（Active Cyber Defence）体制，推进与北约网络安全领域的共通性建设进程。

#### （四）传统安全合作从无到有

日本与北约的传统安全合作主要限于联合军事演习层面。2014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首次在亚丁湾举行联合演习。2018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2022 年 6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常设海上第二大队再次在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8 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格鲁吉亚参加北约“高贵伙伴 2022”军事演习。2023 年 6 月，日本作为除瑞典外唯一非北约成员国，参加了北约“空中卫士 2023”演习，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北约的空中军演。该演习被称为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军演，演习内容包括空中支援地面部队、空对空作战、拦截中程导弹以及机场疏散等课目，目的是加强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强化北约应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日本通过在演习中与北约军事力量进行实兵对接、实现军事赋能，<sup>[1]</sup>提升应对高强度军事冲突的能力，强化双方军事安全合作。

此外，日本还参与了北约科学技术组织（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即 STO）及北约和平与安全科学计划（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即 SPS）等相关项目，为日本与北约就军民通用技术的联合研究提供了平台，也有利于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操作性与共通性能力建设。

## 二、驱动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因素

日本与北约在战略对视中不断接近，并逐渐提升战略协调关系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1] 安峥：《北约最大规模空演登场，“秀”给谁看？》，《解放日报》2023 年 6 月 13 日，第 8 版。



## （一）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组织性动力源

美国既是北约的“灵魂国家”<sup>[1]</sup>，也是日美同盟的主导国，在北约与日美同盟战略走向问题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认为，“欧洲盟国在‘印太’地区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高度符合美国利益；同时，我们希望‘印太’地区盟国与欧洲盟国展开密切合作，携手塑造共同期望的国际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与中国的竞争。”<sup>[2]</sup>为打造盟伴间的“共同战略愿景”，美通过接连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印太战略》等战略文件、领导人公开讲话、召开主题性国际会议等方式强化美国对“大国竞争”的叙事方式，以此敦促、诱使各国（国际组织）“选边站队”。在战术层面，为施压盟伴聚焦“印太”，美国通过一系列话语操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具有冷战意涵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将中国崛起描述为“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将中美在个别领域的矛盾与分歧升级为“战略竞争”，将中美矛盾置换成“中西矛盾”。实践中，美国以共同的战略认知为牵引，积极在盟伴间推动供应链整合与重构，并致力于打造集体军事优势，构筑国防工业的共同基础，实现相互间的互操作性安排，以此构筑美国与盟伴间共同战略物质基础。在美国促动下，日本与北约在战略愿景、威胁认知、务实合作等领域的互动都呈现出明显的突进性，逐渐构建起以美国为中心、具有敏捷性与互操作性的“战略三角”。<sup>[3]</sup>

## （二）战略需求是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内驱动力

日本的“大国追求”驱动其向北约靠拢。日本的“大国追求”以修宪强军为核心手段不断拓展，国际权益诉求也从确保安全转向追求权力。2022年底，日本根本性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的颠覆性举措是构筑“对敌基地反击能力”，试图以武力确保日本界定的安全利益，这决定了日本与

---

[1] 李海东：《北约维护西方安全的原则和行动探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期，第59页。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3] Mikayla Easley, “Japan Seeks Deeper Defense Ties with NATO,” National Defense,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2/12/6/japan-seeks-deeper-defense-ties-with-nato>.

世界最大军事组织——北约的“亲近感”。日本试图“借船出海”，提升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存在感，扩大在国际秩序调整中的权力配额，同时，借口“盟友、伙伴国”需求，推动国内修宪强军的政治议程，使防卫力成为“大国追求”的强有力后盾与政策工具。2023年1月，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北约支持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向。乌克兰也“赞扬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包括从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和外交努力”。<sup>[1]</sup>由此，日本试图借助北约及其支持乌克兰的行动，逐渐塑造美西方主要国家（国际组织）接受其安保战略质变的共识，以造成既成事实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手段，推动军事力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比的大幅提升。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佐证了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不稳定性，使日本认识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社会已由美国处于压倒性地位……转化为以中美为代表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时代”<sup>[2]</sup>。为确保自身既得利益，日本与北约加强战略协调，意在推动安全合作伙伴多元化，牵制美国的战略波动行为，防止陷入“被抛弃”的同盟困境。

北约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是其与日本战略关系突进的内驱力之一。北约是扩张性军事同盟组织，不断扩张是北约彰显其存在合法性的内在需求。冷战期间，北约由最初12国扩大至1990年的16国，2023年4月芬兰的加入使北约成员国扩大到31个。北约不断扩员、扩边为其他国家“入约”或以其他方式与北约构建安全关系提供了操作空间与政治可能性。在“印太”地区战略价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北约积极转向并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将确保“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繁荣纳入北约任务范畴，这成为北约追求生存合法性的新手段。

北约任务扩容为其与日本的安全合作提供了链接点。冷战后，北约以任

---

[1] 岸田文雄、「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グ（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調講演」、首相官邸、2022年6月11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2] 『令和四年版外交青書』、外務省、2022年4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

务驱动战略转型与身份重构，逐渐从具有固定承载形态的区域性军事同盟组织，转向超越地理边界依托的安全应对型军事同盟，这促其活动范围与领域突破边界限制向全球拓展，伙伴国的选择也以战略价值及客观能力作为准则之一。2010年版北约《战略概念》文件突出强调危机管理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提出应“由军事行动的具体任务来决定联盟（coalition），而非由联盟决定军事行动的具体任务”<sup>[1]</sup>。2022年版北约《战略概念》文件称，“北约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相互关联的”，需“加强与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具有相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伙伴的联系”，尤其应“加强与‘印太’地区新老合作伙伴的对话与合作”。<sup>[2]</sup> 北约认为，“没有其他伙伴国家像日本那样与北约关系如此密切，也没有其他伙伴国家具备如此能力”。<sup>[3]</sup>

### （三）携手应对“中国挑战”

日本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并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借口，强化与“同志国”的安全协调与合作。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将中国从“潜在对手”升级为现实对手，对中国的认知与定位不断趋向消极负面，对华政策由“对话+对抗”走向“对抗”前提下的“接触”。2021年10月，岸田就任首相之初尚认为，“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我国将与共同秉持普世价值观的各国携手，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强烈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要保持对话，围绕共通的诸多课题开展合作”。<sup>[4]</sup> 至2022年1月，岸田施政演说中的对华政策已调整为，“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通过认真

---

[1] David Hastings Dunn, “Innovation and Precedent in the Kosovo War: The Impact of Operation Allied Force on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3, 2009, p.543.

[2] 2022年版北约《战略概念》，[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chi.pdf](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chi.pdf)。

[3]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oint statement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with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Yoshimasa Hayashi,” April 4,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3469.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3469.htm).

[4] 岸田文雄、「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21年10月8日、[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http://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

对话，围绕共通的课题开展合作”。<sup>[1]</sup> 同年 12 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的认知下调为，“对确保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及以法治为基础的國際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sup>[2]</sup>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以“复读机”模式向国际社会不间断地输出“乌克兰的今天可能成为东亚国家的明天”<sup>[3]</sup>。在日本的叙事攻势下，“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广泛认可了这一点”<sup>[4]</sup>。

北约将中国视为挑战，驱动其与日本靠近。北约的中国认知呈逐渐负面化趋向。冷战后，转型中的北约“寻求与其他国际机构和关键国家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方式”<sup>[5]</sup>，中国一度被视为合作者。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北约的中国认知更强调价值观的异质性及力量的竞争性。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北约对中国的定位由竞争—合作转向“挑战”。2019 年 12 月，北约伦敦峰会宣言称，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国际政策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sup>[6]</sup> 2022 年 6 月，马德里峰会宣言的中国定位取消了“机遇”，突出强调“挑战”。2023 年 7 月，维尔纽斯峰会宣言更放大了“中国挑战”的内容及程度，宣称中国正“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sup>[7]</sup>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尽管“北约仍将是北美与欧洲的联盟”，“但在北美和欧洲，我们面临着全球威胁和

---

[1] 岸田文雄、「第 208 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2]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2022」。

[3] 「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外務省、2022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

[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oreign Minister Hayashi Attends the Meeting of NATO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5, 2023, [https://www.mofa.go.jp/erp/ep/page4e\\_001264.html](https://www.mofa.go.jp/erp/ep/page4e_001264.html)。

[5]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Christopher Bennett, Building Effective Partnerships,” July 1, 200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606.htm?selectedLocale=en](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606.htm?selectedLocale=en)。

[6]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NATO Engages: Innovating the Alliance’ Conference,” December 3,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1550.htm?selectedLocale=en](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1550.htm?selectedLocale=en)。

[7]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Vilnius Summit Communiqué,” July 11,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17320.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17320.htm)。

挑战……中国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安全和利益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决定进一步加强与‘印太’伙伴关系的原因”。<sup>[1]</sup>

#### （四）“俄罗斯威胁”成为现实、直接的动力

和平条约缺位导致日俄相互信任关系极度脆弱乃至缺失，日本视俄罗斯为战略不稳定因素。2022年2月，俄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对国际秩序变动保持超强敏感度的日本将此视为进一步摆脱“战后体制”的“天佑”。同时，为确保美国继续落实“印太战略”，日本需协助北约牵制俄罗斯。日本迅速放弃2014年以来在俄罗斯与G7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角色定位，宣称“日本和乌克兰有着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无理和无端侵略”，认为“维持和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于限制俄罗斯进一步的战争行动是必不可少的”。<sup>[2]</sup>作为回应，俄加大在亚太方向的军事部署及调动力度，特别是强化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军事存在，调整日俄间相关合作协议，更加重了日本的不安全感，这反推日本进一步强化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关系，形成了日俄关系的螺旋式恶化态势。

应对“俄罗斯威胁”驱使北约寻求与日本合作，以缩小对俄战略“包围圈”。北约不断东扩使其与俄罗斯间的互不信任逐渐累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自冷战后首次称俄“严重影响北约东部和南部的安全与稳定”。<sup>[3]</sup>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称俄是“对盟国安全及欧洲一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sup>[4]</sup>。实践中，北约对俄进行了政治、经济、认知等全方位围剿，军事上则以支持乌克兰的方式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北约2022年版《战略概念》文件强调，北约将继续谋求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具

---

[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Pre-Ministerial 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June 14,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5673.htm?selectedLocale=en](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5673.htm?selectedLocale=en).

[2] 岸田文雄、「シャンクリラ・ダイアログ（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調講演」、首相官邸、2022年6月11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3]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Wales Declaration on the Transatlantic Bond,” September 5, 20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85.htm?selectedLocale=en](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85.htm?selectedLocale=en).

[4] 2022年版北约《战略概念》。

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有意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合作伙伴”。<sup>[1]</sup>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北约拉拢日本，展示美西方国家团结的同时，亦可分散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并防止日俄进行战略交易。

此外，乌克兰危机中呈现出的新安全形态，完全超越传统地理边界，具有鲜明的跨域性、全球性特征，促使相关国家（国际组织）联手应对更为多元、复杂的新型安全问题，这既是日本与北约深化安全合作的动因，也是日本—北约 ITPP（2023~2026）的重要合作方向之一。

### 三、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面临的制约

虽然日本与北约的安全战略关系呈突进性发展态势，并在未来有望继续强化，但受制于诸多要素，双方短期内形成传统军事同盟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 （一）机制性约束

北约运行机制的牵制。北约虽称继续秉持“门户开放政策”，但其面向的范围仍限于“认同北约联盟价值观、有意愿、有能力承担成员责任和义务，以及加入后有助于促进我们共同安全的欧洲民主国家”<sup>[2]</sup>。在决策方面，北大西洋理事会是北约最重要的政治决策机构，在重大问题决策上，采取共同协商与一致同意原则。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不能与其他国家存在领土纠纷，而日本与邻国存在多项领土纠纷，这基本扼杀了日本“入约”的可能。此外，北约是由31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各成员国的战略偏好各异，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均同等程度地关注亚太地区事务。虽然部分国家加大了在亚太地区战略投资，但北约“在印太战略方面的方针是不与任何人结盟……北约要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威胁”<sup>[3]</sup>。日本“拖欧入亚”<sup>[4]</sup>

[1] 2022年版北约《战略概念》。

[2] 同上。

[3] 王锴：《北约介入印太事务的前景分析》，《军事文摘》2022年第8期，第14页。

[4] 《日本“拖欧入亚”历史是否又来到十字路口？》，《环球时报》2023年1月16日，第7版。



的战略企图难以获得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是日本极力试图将其与中国不稳定的安全关系带入北约，将招致北约部分成员国的反对。法国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即是典型例证。当然，法国的反对在将来也可能出现变化，但北约并非是无懈可击的整体却是事实。

日本国内机制限制其对外结盟能力与意愿。日本宪法规定放弃战争权、不保有军事力量，这长期束缚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防卫能力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它建构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心理惰性及行动惰性。虽然日本以“小步子、不停步”的策略逐渐摆脱宪法的限制，但在防卫力的现实使用问题上，与美西方国家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日本防卫力建设水平也面临着国内政治法律制度、政权结构、国内外舆论等客观限制。日本积极突破以宪法为核心的“战后体制”束缚，但相关举动均为伺机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传统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思维催生的产物，只有在符合其国家利益时，日本才可能在谨慎评估后决策、实践。从战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中也可看出，目前为止，其任务均限于国际维和、打击海盗、担当教官、建立海外活动平台、战后重建、医疗援助、人道主义救援、为美国等提供后勤补给、护航等低敏感度领域。即便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在参与美国相关安全行动时，也保持了极为谨慎的姿态。可以判断，在国际局势尚未发生根本性剧变的情况下，日本仍将继续主动地利用国际格局调整的档期，推进国内政治议程，短期内不会以“入约”路径深度卷入欧洲一大西洋的纷争。岸田也公开表示，“日本没有计划以成员或准成员的身份加入北约”。<sup>[1]</sup>

## （二）客观资源与能力的限制

长期以来，日本防卫力基本保持在“自卫”能力建设层面，尚未真正形成远距离、持续作战的实力。日本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处于常态化不稳定态势，极大牵制了防卫力的对外投送能力。此外，战后日本自卫队没有实战经验，

---

[1] 《岸田文雄：日本不计划加入北约》，《环球时报》2023年5月25日，第2版。

也没有直接处置高强度军事危机的实践，这对各自卫队之间及其对外军事合作中的配合、联动、保障等互操作性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加之前述政治机制的限制，使日本在国际安全问题处置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实际军事能力、战略抑制能力、危机处置能力等缺乏客观经验性认知与评估，在战争及高强度危机环境中，日本与外国间的战略协作能力与意志将受到质疑。此外，日本财政紧张下的有限国防开支、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自卫队的纵向式作战结构等因素也极大限制了其与北约形成有效威慑联动的能力。

北约虽然实力强大，但其防区边界不断扩大、安全任务范围不断拓展，在相当大程度上稀释了其在实际作战行动中可用于部署的战略资源。北约各国在联盟成本、安全投入、责任分担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不同成员国的军事参与能力存在极大差异，难以贯彻现代战争要求极高的互操作性及敏捷性，给军事行动的实际效力带来负面影响，弱化了成员国的安全供给能力，限制了北约向防区外进行军事部署的执行力。现实中，乌克兰危机将使俄罗斯与北约进入新的军事对抗轮回，<sup>[1]</sup> 北约的战略重心将从全球范围内应对不稳定事态回到欧洲—大西洋等核心防区，并在强化内部整合的同时，加大对俄的战略围堵和挤压力度，进一步扩张在欧洲大陆的战略空间，“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俄罗斯将牵制北约区域外力量的扩展”<sup>[2]</sup>。短期内，日本—北约的安全合作将继续按照“因国施策”或“一事一议”方式进行协调，难以构建起具有威慑力的安全合作机制，<sup>[3]</sup> 深化和提升安全合作的共识更多停留于政治表态及协议层面，安全合作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 （三）主观意愿的不足

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牵制北约“亚太化”进程。北约虽将中国界定为“挑

---

[1] 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外交评论》2022年第6期，第85页。

[2] 王媛媛：《北约战略新动向评析》，《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6期，第44页。

[3] 孙文竹：《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的动因与前景》，《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5期，第117页。

战”，但其 2022 年版《战略概念》文件仍称，将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sup>[1]</sup> 这为双方未来接触保留了一定的外交空间。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中国是重要的全球性力量……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重视同中国保持和加强接触，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北约将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希望同中方探讨军控、气候变化等各领域合作，以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期待中方为结束欧洲战事发挥重要作用”。<sup>[2]</sup> 北约的相关文件及领导人表态等均表明，北约在对华战略认知与定位上的复杂和矛盾性：既对中国快速崛起引发的国际权力格局变动抱有极强警惕性，试图进行前置性战略部署，以增强可预期性，又期待利用中国分担北约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压力。<sup>[3]</sup>

北约主要成员国追求战略自主的政治意愿将牵制北约的战略走向。欧洲主要国家在对美战略追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战略自主的可能路径，特别是以欧盟成员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时，更强调自身特色。北约 31 个成员国中有 22 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这些国家在“经济合作”与“安全竞争”、“阵营对抗”等问题上将对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形成一定程度的政治牵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明确表示，“欧盟与美国存在差异……欧盟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做出决定，这并不需要等待别人许可。”<sup>[4]</sup>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宣称，“欧方坚定致力于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sup>[5]</sup> 多数欧洲国家在对华关系上仍保持相对理性姿态，少数欧洲国家以欧盟或北约名义绑架欧洲的尝试并未达到政策预期，这表明平衡管理对华关系仍是欧洲国家的

---

[1] 2022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

[2] 《王毅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23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d/202209/t20220923\\_10770523.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zbzd/202209/t20220923_10770523.shtml)。

[3]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2 页。

[4] European Council,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1/20/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european-parliament-on-the-inauguration-of-the-new-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

[5] 《王毅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3 年 8 月 6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xgxw\\_679936/202308/t20230806\\_11122921.shtml](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xgxw_679936/202308/t20230806_11122921.shtml)。

主流政策基调。<sup>[1]</sup> 欧洲未使用“脱钩”的叙事方式即是其在对华政策上自主定位的表层体现。在美国继续加大对华科技政策施压力度、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背景下，德、法等国及欧盟领导人先后访华的外交行动更展示了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德国明确“欢迎中国实现发展繁荣，反对任何形式的脱钩”<sup>[2]</sup>，“愿做中国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阵营对抗”<sup>[3]</sup>。土耳其则公开称，“不认同中国经济、科技‘威胁论’，反对抹黑、遏制中国发展”<sup>[4]</sup>，“不支持北约在亚太地区加强活动”<sup>[5]</sup>。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释放出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外交信号，这都表明欧洲存在以合作超越对抗的政治意愿及现实需求。

此外，纾解全球治理困境需要各国（国际组织）通力合作，中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以和平发展实现经济崛起，已成为国际秩序拼图中的重要版块。在发展进程中，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全球气候变化、阿富汗重建、军备控制、网络安全、打击海盗及公共危机处置等具体现实挑战问题上，北约更难以与中国“脱钩”。北约也强调，“我们不会进入新冷战，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也不是我们的敌人”<sup>[6]</sup>，“我们对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持开放态度”<sup>[7]</sup>。

---

[1] 王朔：《中欧合作的历程、成果与展望》，《人民论坛》2022年第21期，第97页。

[2] 《李强同德国总理朔尔茨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并举行会谈》，外交部网站，2023年6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86/xgxw\\_679092/202306/t20230621\\_11101605.shtml](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86/xgxw_679092/202306/t20230621_11101605.shtml)。

[3] 《李强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外交部网站，2023年6月19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86/xgxw\\_679092/202306/t20230619\\_11100056.shtml](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86/xgxw_679092/202306/t20230619_11100056.shtml)。

[4] 《王毅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谈》，外交部网站，2023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7/t20230726\\_11118201.shtml](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7/t20230726_11118201.shtml)。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见王毅》，外交部网站，2023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07/t20230726\\_11118270.shtml](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07/t20230726_11118270.shtml)。

[6]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Door Step Statement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head of the Brussels Summit,” June 14, 2021,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84960.htm](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84960.htm)。

[7]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Vilnius Summit Communiqué.”

## 四、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影响

虽然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深度与进度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束缚，但在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俄罗斯为现实威胁的背景下，日本与北约的战略关系仍将有序提升，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及网络、太空、信息、产供应链、关键技术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内，双方将深化合作，并将尝试构建一种超越传统军事同盟关系的新型安全关系架构，其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 （一）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趋势

在世界大变局中，国际格局中的权力关系、权力内容、权力结构进入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的急速转型轨道，国际力量间的分化组合及国际体系转型呈加速效应，由此引发的国际及地区秩序更加动荡不安，这与大变局之间形成联动并相互激荡，加剧着国际及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北约“亚太化”发展，试图在动荡中攫取更大权力，而这也是北约生命力的源泉，即北约作为美国的战略工具，是以不断挑起争端、制造混乱来维系其存在的。日本也试图借由动荡期推进摆脱“战后体制”的既定政治目标。由此，作为现实性强大军事力量的北约与潜在性力量的日本之间以主观建构的“印太”区域为物理平台、以新技术造就的新兴领域作为安全合作内容，为各自私利而谋求战略关系突进，为国际秩序转型注入更多军事安全性力量要素，将在改变国际秩序转型方式的同时，提升其转型速度，并加大国际社会的震荡及割裂程度，“北约将触角伸向全球将制造一个分裂的世界”<sup>[1]</sup>。

### （二）北约“亚太化”将恶化地区安全局势、破坏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于欧洲而言，日本力量的介入更多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意义，在现实维度上短期内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但作为国际和平发展负资产的北约“亚太化”

---

[1] 钟声：《北约是全球安全稳定的“系统性挑战”》，《人民日报》2022年7月5日，第17版。

进程，其影响则可能是颠覆性的。21 世纪以来，亚太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地区国家在实践中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原则为指导，逐渐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形成了包容、开放、平等的合作框架，也建构起不同于美西方的新型合作理念与理论。相对而言，北约是冷战思维的物化存在，其生存动力与合法性基础来自不断扩张，这直接造成了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乃至质变，进一步确证了北约扩张将带来非北约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冲突乃至战争。北约试图利用阵营对抗和“中国威胁论”为政策工具和切入点，实现“亚太化”转向，再次将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导入亚洲地区，这将意味着意识形态、动荡、暴力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回归，破坏地区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合作模式，推动亚太地区滑向“集团化”的危险方向，甚至将地区各国推入“新冷战”困境，<sup>[1]</sup>这从根本上不符合地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利益与政治意愿，将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负面效应。此外，日本作为北约力量的亚太支点与桥接点，鼓动北约深度介入“印太”事务，<sup>[2]</sup>将使亚太地区及周边的力量存在更加多元、复杂，打破地区国家长期以来在互动中形成的、仍较为脆弱的政治平衡关系，不利于国家间相关矛盾与争端的解决，甚至恶化既有矛盾、催生新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的权力私欲，以邻国为假想对手与威胁，将北约力量大幅导入亚太地区事务，这违背区域内各国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政治意愿，将加大日本与亚太国家间的信任赤字，迫使相关国家采取对应性行动，驱动区域内国家间关系的内涵由包容性的经济合作转向对立性的安全竞争，降低各国对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额度，不利于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复苏，也将给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障碍。

### （三）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

日本将与北约的安全协调关系视为昭示“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契机。

---

[1]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

[2] 防衛省、「防衛白書 2022」、[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2/pdf/wp2022\\_JP\\_Full\\_01.pdf](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2/pdf/wp2022_JP_Full_01.pdf)、328 頁。



为彰显西方主要国家的统一立场、追随美国的“政治正确”、以“西方国家”为身份标签提升国际影响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在政策宣示、对俄制裁等方面都紧跟美欧国家步调，并经由 G7 实现了与北约主要国家间就乌克兰问题的桥接。为彰显影响力及政治站位，岸田打破外交惯例，于 2023 年 3 月继美国总统之后完成访问基辅的“外交打卡”，实现二战后日本首相对军事冲突国家的首次访问，日乌关系升级为“特殊的全球伙伴关系”，承诺继续向乌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并将主持召开乌克兰战后重建国际会议，利用日本的重建经验，塑造日本在战后乌克兰重建进程中的领导力。日本作为 2023 年 G7 会议轮值主席国，将乌克兰问题列为会议主题之一，实现了与北约 2023 年维尔纽斯峰会主题的对接，日本不断向国际社会输出“欧洲大西洋和‘印太’的安全保障是不可分割的，乌克兰被侵略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还是全球问题”<sup>[1]</sup>，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也表明日本外交操弄手段的有效性，将进一步刺激日本扩大“权力”的欲望。军事安全领域，借由与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行动，日本实现对外防卫装备转移的突破。2023 年 4 月，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即 OSA）制度，宣称“为深化与同志国在安全保障上的合作……提高同志国在安全保障上的能力和威慑力，将在 ODA 之外，新设 OSA，对同志国进行装备、物资和基础设施整备等援助，使其成为加强综合防御体系的措施之一”。<sup>[2]</sup> 据此，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军用车辆。在北约峰会公报中，各国重申对乌克兰入约的政治承诺，宣布向其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为展现日本与北约的协调行动，日本承诺将为乌克兰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财政支持、复兴支援、非杀伤性防卫装备等支持。2023 年 7 月，日本联合执政党会议基本就“主动提供防卫装备援助”达成共识。8 月，岸田与乌总统通话时进一步宣称将就日乌“安保协议”进行谈判，9 月，林芳正访乌再次

[1] 「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外務省、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2]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の実施方針」、外務省、2023 年 4 月 5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87363.pdf>。

提及两国“安保协议”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追随北约，加大对俄制裁将使日本陷入被反噬困境。日本借由“中国挑战”、朝鲜威胁、俄罗斯威胁及乌克兰危机，推动与北约安全战略关系的突进，对日本而言并非意味着更可预期的安全利益。日本不断煽动反俄舆论、采取反俄行动，特别是对乌克兰援助军用车辆等防卫装备，被俄视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将导致冲突升级。作为反制，俄加强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二战后首次在日俄争议岛屿及附近灯塔上升起国旗等，均为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副产品。此外，俄对日本采取的反制措施，尤其是在能源、渔业、海洋安全、人员往来等方面的措施将对日本经济发展形成反噬效应。

#### （四）给中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的外部借口之一是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给“以规则（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的“系统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北约安全关系突进本身即是试图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设计中的一环，必将加大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政治上，北约对华定位的改变将影响北约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束缚和限制欧洲国家发展与中国建设性关系的主动性，为中欧关系植入负面因素，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部分成员国尝试挑战中国政治安全底线，立陶宛、捷克等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背后显然都有北约的因素。<sup>[1]</sup> 北约与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将其纳入北约全球运作框架，也一定程度上给这些国家主动恶化与中国关系注入了刺激性力量。安全层面，日本携手北约将中国视为“挑战”，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围堵、军事部署、力量投入、话语霸凌、抹黑打压等操作，联手对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进行政治拉拢、提供安全产品与安全能力建设援助等，恶化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经贸科技领域，日本与北约成员国联手在尖端科技领域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强化经贸科技安全化发展势头，将破坏中国与

---

[1] 王媛媛：《北约战略新动向评析》，第41页。

相关国家正常的经贸科技合作。

## 五、结语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是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非传统安全领域变量迭出而传统安全因素仍未退场的背景下呈现出的发展新态势，是北约“亚太化”与日本调整国家安保战略之间同频共振的产物。虽然短期内日本与北约尚难以提升至传统军事同盟关系，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变量呈多元化发展，加之部分国家主观推动非安全领域的“泛安全化”，这必将进一步驱动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及合作更为密切、深入，且将在多层次、多领域、全频段、跨区域展开。未来双方将超越传统军事同盟关系模式，构建以议题应对为导向的合作关系模式，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新兴战略疆域、国际规则、“虚假信息”等领域的合作有可能不断加强。日本和北约以共同“威胁”和“挑战”作为国家（国际组织）间关系的黏合剂，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加大安全投入、构筑“威慑力”的政策选择将加重地区安全困境，迫使各国加大在安全领域的资源投入，这并不符合包括日本及北约成员国在内的各国根本利益。日本与北约应顺应亚太国家普遍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主动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贡献，而不是将军事竞争与动荡引入亚洲。

【责任编辑：肖子璇】

# Abstracts

##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YANG Jiemian

The pattern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is an issue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current evolving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major-country relations, and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relevant theories, thus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with a clear direction. In the face of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principle and intense struggles between the anti-hegemony forces and those aiming to preserve it in major-country relations, China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build an overall stable framework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has bee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in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he Chinese concepts and practices in planning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are provi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new thinking, directions and choices due to their advanced nature, feasibility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ZHU Zhongbo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more

than 5,000 year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combine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open up the prospects of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It demonstrates the Chinese leaders' feelings of embraci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ambition to strive for the common good, while embodying their mission of leading the trend of human advancement. With the core ideas of "joint advocacy" in four aspects, the Initiative reveals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human civilizations, recognizes the prominent obstacles in inter-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locates the momentum and underpin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s far from empty talk, but must be implemented in all aspect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hina's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wisdom, solutions and strength it contributes has provid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 powerful impetus to translate the Initiative into real practice.

##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the Transition of US Economic Strategy**

LI Wei

Liberalism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US economic thought. While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gave rise to rebellious forces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US, these forces did not develop into a systematic guide to action or an ultimate policy option because of the strong inertia of existing ideas. It was not unti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that the tremendous forces for change accumulated within the American society began to coalesce into a strong governing consensus and be transformed into realistic operational plans. The new consensus is summarized by the American decision-making

elite as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at its core calls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vigorously wield state power and comprehensively revive America's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ith domestic (industrial policy) and diplomatic (economic diplomacy) actions, in order to serve US interests i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of major powers. Thi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US economic strategy since the 1970s, from believing in market supremacy and promoting a free economy to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US readjustment of state-market relationship has not only dispelled the traditional myth about the country's liberal foundation, but also had a major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security, and even the evolution of the entir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 **US Chip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from a Geo-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ZHAO Minghao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led West and China, and the geo-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opolitics as well as major-power competition, has come to the forefront. Chip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merging and critical technologies. With the advent of a digital era of major-power competition, chip security has become a key underpinning of nation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military security. The US has been advancing its chip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with domestic and external balancing acts.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linkage of 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cies and combines short-term measures with long-term strategies, in order to widen the technological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chip field an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ip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hrough a Modern American Industrial Strategy, the US strives to improve its R&D an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of advanced chips and has stepped up its blockade of China's chip technology in terms of export controls and investment review. Besides, the US has taken the lead in building a multi-level and modular "chip alliance," trying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lli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protection, R&D of chip technology, and reshaping of chip ecosystem. It has also focused on giving play to the strengths of different force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Meanwhile, the US faces many constraints in promoting its chip suppression on China, for example the internal competition in the US chip industry,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chip compan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its allies.

## **US-Japan Strategic Synergy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Limitations**

XIANG Haoyu & BAO Zhipeng

As the US-Japan alliance becomes more global in natur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jointly stepped up their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demonstrating their consistency in strategic goals, complementarity in strategic approaches, and synergy in strategic measures. Driven by the goal of outcompeti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s diplomacy in the region, instead of going separate ways in the past, has conscious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linkage and cooperation in practice, featuring top-down strategic guidance, policy synergy, resource sharing, and coordinated actio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incorporated their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to the framework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are working to expand their strategic convergence with ASEAN by aligning with the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Specifically, they have focused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reas to solicit support from regional countries, providing public goods through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 particular encouraging maritime ASEAN countries to restrain Chin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Meanwhile, there are multiple constraints facing the US and Japan in their joint foray into Southeast Asia: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demands between the US, Japan, and ASEAN; the gap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s view on regional order and that of ASEAN; and the risk of triggering regional security dilemma and division because of exclusive and confrontational policies of the US and Japan.

## **Japan's Burgeo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NATO and Its Implications**

ZHU Haiyan

Japan'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NATO has made breakthroughs in regularizing their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alogues at the highest level, improving and diversifying the mechanisms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mak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more pragmatic.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rved as the bridge and external trigger in Japan's burgeoning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NATO, and will work to institutionaliz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hree sides. The respective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Japan and NATO ar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for their closer relations, while the shared perception of threat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upgrade of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However, the upgrading process will be constrained by a lack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resolve, which makes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 unlikely in the short term. Still, Japan's burgeon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NATO will further stimulate its major-power pursuit, exacerbate the polarization and antagon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tensify regional instability.